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二十世紀
重大軍事謀略

 **eBOOK**
內置資料 非商業

霞飞将军以退为进 马恩河畔大败德军

1914年6月28日，当奥匈帝国皇储、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斐迪南耀武扬威地到新吞并的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时，在萨拉热窝街头被等候多时的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死。“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以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战争之初，德国气势汹汹，想以闪电战迅速击败英、法，然而，德国的计划遇到了法军总司令霞飞将军的强烈挑战。

20世纪初，后起的帝国主义德国统治者正急于要发动战争，以便重新瓜分殖民地。同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相比，德国对战争的准备更早和更充分。早在1905年，德军总参谋长史里芬伯爵就拟定好了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主旨是速决战。它考虑到俄国由于距离远，铁路线不足，运送军队到边界约需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力求德军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军事行动。它计划只以1个军团监视俄国，而以7个军团对法作战。其中以8个师掩护德法边界，其主力约70个师的兵力则闪电式地通过防御薄弱的卢森堡、比利时，直插法国边境，歼灭法军于德法边境，并占领多佛尔海峡沿岸，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在6个星期内灭亡法国，然后全力对付已无盟国援助的俄国。

所以，当“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立即怂恿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以后，同盟国各国和协约国各国相继加入，战争从欧洲逐渐扩展到亚洲、非洲等地，演变为世界大战。但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欧洲一直是主要战场。

8月2日，德军按预定计划占领了卢森堡，于3日夜到达比利时边境。由于比利时的坚决抵抗，德军直到8月16日才以重大代价攻克比利时的列日要塞。德军在占领比利时后，兵分5路，迅速向法国北部推进。在这里，德国遇到了法军统帅霞飞将军。

霞飞是一位62岁的军人，此人性格倔强，脾气古怪，1912年被提升为法军参谋总长，后又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他所向往的战争场面是法军高做而一往无前地向着阿尔萨斯，向着洛林冲杀，德国溃败一泻千里。只可惜现代战争已经不是绅士风度十足，只靠一腔热血即可战而胜之的时代。据此，霞飞拟定了第17号计划，并于1914年8月8日发出第1号指令：命令法军第一、二集团军在法德边境迅速地进攻，解放被占领的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在阿登森林区，他的第三、四、五集团军正面攻击德军；英国远征军在莫伯日集中完毕，向蒙斯推进；4个本土师负责从侧面保卫法国。霞飞在前线投入了近70个师的步兵和7个半骑兵师。

霞飞总司令的命令一下达，第一、二集团军即于8月14日从东北部进入德国境内，很快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殊不知在此防御的德军第七、八两个集团军且战且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诱敌深入。正当法国人为长驱直入而兴奋不已，陷入盲目乐观之时，左路德军于18日开始在萨尔布尔一线猛烈反击，他们用大炮和榴弹炮杀伤法国军人，并以势如破竹之势实施反冲锋，法国人收复国土的好梦终于没有做长。

法军第三、四集团军居中分两路对德军进行攻击，第五集团军从左路策应。8月20日，以攻对攻的边境交战开始，法国与比利时交界的70公里地

带顿时炮火连天，弹痕遍地。22日，正面部队进入战斗。在阿登森林地带，德军以高度警惕和临战时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同法军对抗。他们在主力进入森林之前派出了侦探和哨兵，主力隐蔽而迅速地出现在法国集团军面前，令法军大惊失色。随后正面作战仅一天，德军从侧翼进攻，很快就打退了法军。在左侧，法国第五集团军在马斯河同德国第二集团军相遇，双方在桑布尔河交火，德军要强渡，法军极力反攻，德第三集团军又及时赶到，试图把法军包围，23日，法军于慌忙之中退出战场，大踏步后撤。

在英国远征军方面，德国第二集团军向南进发，绕开比利时进击的作战部队。战斗于22日晚上爆发，3万英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在给德国第一军团以沉重打击后于23日晚撤出战斗，向南退去。

这样，在广阔的法国北部大地上，300万士兵相互厮杀，数以万计的士兵丧生。仅法国从8月20日至23日就伤亡了30万人。

霞飞将军终于认识到他的“一号”指令计划的全部失败。

霞飞将军是这样一种人：他对德国人有一种本能的藐视和仇视，在整个战争中，他从未有过惊慌失措，他的镇定表现在每天准时吃两顿晚餐和每晚10时一定上床就寝的习惯上。他的毅力和耐力是相当惊人的，这当然是一个统帅应当具备的素质。他相信自己，认准了要去干什么事情，谁也别想阻挡住他。但是，当他碰了壁之后，他也能深刻地反省自己，进而否定自己的错误。1914年初期法德战场的形势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一号”指令的实施结果，霞飞非常失望。他看到他的军队铺天盖地往南方逃窜，而且互相之间行动离心，会同友邻部队配合的意识、通信联络都很差，各作战单位经常各自为战，相互推诿，连军队首长们都不敢掌握决定性行动；士兵警戒很松，实际作战力与训练成绩相差很远，炮兵阵地选择不当，战术训练不适应新改进的武器，炮兵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精神很糟糕，经常是不等炮火准备的轰击完成，士兵就开始发起正面攻击，伤亡当然就严重了。霞飞认识到法军不宜再发动进攻战，他迅速地调整计划，作出了有计划地大步后撤的行动方案。

1914年8月25日，霞飞将军发出了第2号指令。这一指令的总细则改掉了不少不适于部队作战的地方，体现的是“以退为进”的谋略。霞飞的思路是：由强调单片进攻改为与防御相配合，法军在进攻失败时，应该有目标地有计划地从平坦的北部撤出，在坎纳河和马恩河一线抵抗敌人；在这一带先行修筑工事，准备对德军进行拼命的抵抗，以限制他们进入南部，反抗他们希冀挤压法军主力从侧翼打击法国人的如意算盘。此次行动的战略部署是“避免被包围，并尽可能重新占领包围的位置”。为此，霞飞命令由英国集团军和法国西部的第四、五集团军组建一个集团军——从正面地段再抽调兵力在亚眠地域组建新的第六集团军。霞飞要求他的军队在撤退中也要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指令下达后，部队从思想上及素质上都为迅速转入反攻，在马恩河上同敌人正面殊死作战并取得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心理基础。

后来的战场形势及其发展证明霞飞将军的这一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德军在整个南下追击法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德军第一、二集团军相继尾随法军主力部队进入了巴黎以东的地域。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对于法军正在巴黎东部集结大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还以为胜券在握。在俄国从东线不断施加压力时，毛奇又抽调了2个军1个师的兵力去支援，还抽了4个军到侧翼，这样，德国在右路的进攻兵力就由16个军减到11个

军。

当法军撤退至索姆河一线时，霞飞认为在此集结后仍不足以对德军形成攻势，便于9月1日再次要求他的军队向南撤退到马恩河。

此时，毛奇终于明白法军并非是散兵游勇式的大溃退，而是计划比较周密战略性撤退，法军的重新部署已使冒进到马恩河北岸的德军第一、二集团军被法军强大的5个军团所包围。毛奇赶快下令一、二集团军就地待命，并组织第三、四、五集团军对法军作牵制性进攻，以破坏法军的包围圈。但是，德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克鲁克却对毛奇的命令非常愤慨，他认为这是剥夺他即将到手的“功劳”，因而独自带队继续盲目冒进。

9月5日，当克鲁克仍一意孤行，单独追击南下法军时，即给法国军队留下了一个大空档，造成了法军反攻的有利时机。此时，对德军的包围业已形成，重新部署兵力的工作已基本结束，霞飞遂决定开始反攻。他以法军第六集团军从马恩河北岸推进，其余主力则从各自所在的方向向德军发动进攻。

9月6日，霞飞宣读了向部队发出的命令，同时号召法军士兵：“正值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之际，必须提醒大家不得瞻前顾后，应当全力以赴，进攻并打退敌人；部队倘若不能再前进，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已经占领的区域，宁肯就地战死而决不后退，当前情况下，任何怯懦都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双方参战兵力达150万的一场旷世罕见的世纪大战就此爆发了。

法军的炮兵首先“发言”，勇敢的炮兵连士兵在反击的第一天就教训了狂妄的对手，刚刚组建的第九集团军的炮兵把德国近卫军的进攻死死地压住了。法军第五、六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从左路强行反攻，作突击进发。远征军从库洛米埃。夏日尔一带对德军第一集团军迎头痛击，克鲁克终于尝到了孤军深入的苦果。法第六集团军在蒂埃里堡总方向上向克鲁克部队的后方穿插；第五集团军从塞赞、库尔塔孔方向出至德第二集团军的右翼后方；第三集团军从厄勒杜克以北地域向西部攻击德军的两肋部分；第四、九集团军则从旁边牵制克鲁克。这样，德国的两个集团军开始被分割，他们中间的距离有15公里。

战斗是残酷的。当法军第六集团军对德军阵地发起令人心悸的攻势时，遭遇到了德军3个军的反攻击。霞飞急调法军第七师从马恩河方向紧急增援，巴黎最高长官加里埃尼组织了一支摩托纵队，他动员全巴黎的出租车和所有的机动车运输第七师增援前线。巴黎路口的警察强行阻挡正在行驶的1200辆汽车连续穿插运行在前线与巴黎的路上。强大而及时赶到的后援七师迅速投入战斗，使正面的克鲁克3个军顿时感到了压力，为摆脱法军的分割包围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战斗。

英、法军队在马恩河沿着狭长的200英里战线对德军所进行的无数次凶猛而短促的进击，彻底摧毁了德国人的自信心。到9月8日，战斗已进入非常混乱然而又非常壮烈的场面，法军第九集团军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残酷的散兵作战到处可见，整个马恩河一线兵刃相接，枪炮相加。法军的炮火相当密集，德国人的尸体在战场上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德军统帅毛奇被残酷的屠杀惊得目瞪口呆，他害怕他的两个集团军被英、法军队吃掉，遂下令德军停止进攻，全面撤出战场。德国军队的撤退也是有计划的，他们在后方早已布置好了防线。在正面他们迫使法国第四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后退到乌尔克河一带，双方都没有明显的战果，马恩河战役陷

入僵局。

9月9日，德军第一、二集团军开始撤退。英法联军似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他们从无线电中截获德国人已开始撤退的消息时，竟都不敢贸然向德国人发动全线追击。10日一整天，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阵地战。就在当天，法国集团军接到了法统帅部发来的追击命令，法军在18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德国人发起攻击。可惜因德国人的撤退是有计划的，所以掩护工作进行得很好，于是又酿成了另外一次遭遇战。

9月15日，以霞飞为首的法国统帅部决定停止进攻行动，在已经占领的马恩河一带设防固守。

马恩河之役，双方投入兵力150万，德军伤亡20多万。德军5个集团军在马恩河一带终于未能如愿以偿，只能在坚持了一个星期后转向防守。此后，交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到12月，整个西线呈胶着状态。马恩河大战的结果，宣告欲以闪电方式击溃法国的“史里芬计划”的破产，德军的疯狂进攻被遏制住了，并迫使德军从此在东西两个战场上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毛奇因指挥无方导致“形势大坏”，马恩河之战使绝望的惊恐笼罩德国全军。9月14日，毛奇将军“因病”被解除指挥权。

古代兵法是非常强调“攻守”原则的，主张力量不足就防守，力量有余就进攻。在马恩河之战中，法军统帅霞飞将军的用兵之法即是如此。当进攻未取得成效时，他果断地撤兵，把拳头收回来以便能更有力地再打出去，从而增强了法军的力量。正是因为马恩河肉搏战中坚持了对军队的高度挟制和攻守相配的原则，才使得法军的6个集团军在战场上相得益彰，互相配合，把整个西部战场的进攻、防守指挥得有疏有密。法国炮兵在马恩河上大显神威，那威慑无比的轰炸和没有丝毫偏差的炮点，把德军紧紧压制在军亭掩体中不能大幅度活动，被称为“战场之王”，它既可为进攻所用，又可为防守所用。新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立体攻势略见端倪。

凡尔登德法两军拼消耗 索姆河新开战局定乾坤

马恩河之战遏制了德军在西线的进攻。德国改变战略，1915年企图把主力集中在东线以求先打败俄国，迫使俄国单独与其签订和约，但这一计划又未得逞。德国被迫在东西两个战场上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而德国的人力、物力都不允许它长期作战下去。德国要寻求新的“速决战”。1915年底，德军法尔根汉参谋长起草了致德皇的备忘录，力主痛击法国的某一重要城市以便发起一场大规模战役，吸引所有法国军事力量参加，从而从根本上打垮法军，给西线战场注入一剂兴奋剂，达到打击英法联军的目的。这个重要城市，法尔根汉选择了凡尔登。

凡尔登是离法国首都巴黎西北135英里的一个小镇，有人口1.4万人。德军之所以选择了凡尔登这个巴黎要塞作为攻击目标，是以为受到攻击的法国人民不会允许德军轻易地进入巴黎，势必派遣大量军队去保卫。德军准备无情而严厉地打击凡尔登但并不夺取它，仅靠它不断吸引法国主力部队投入到凡尔登战场，双方就此进行一场大火并，以决定西线战场的胜败，给法国军民的意志与力量以沉重的打击，把几百万法军碾碎在凡尔登这个大型魔盘上。

为了在凡尔登地区与法军一决高下，德国统帅部在此投入了德军精锐部队——第五集团军。这支军队由德国皇太子威廉亲自指挥，所辖6个军10个师共27万装备最好、久经沙场的德军；配备有420毫米的攻城榴弹炮，可以发射装有100多磅高爆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榴霰弹，以及130毫米的“小口径高射炮”——可以用步枪子弹的速度发射5.2英寸的榴霰弹，还有喷火器、化学武器。

德军统帅部选择凡尔登决战是有道理的。凡尔登是当时法国修筑的最大要塞，它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法德边境；有16条铁路和公路经过，因而是法国前线最大的交通枢纽；它不仅是通向巴黎的要冲，也是法军全线的支住。法军早就将凡尔登视为必守之处，守备兵力不断增加，配置了600多门火炮，其中有重型火炮244门。法军在这里构筑了4道防御阵地，纵深达15-18公里。前3道防御工事是野战防御阵地，第4道防御阵地由凡尔登要塞的永久工事和两个堡垒地带组成。法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突破的据点。

1916年2月21日早晨，气温-15℃，天气出奇的寒冷，法国人的阵地上空寂一片，他们没有想到，德军的进攻就选择在这一天。

7点15分，隐蔽在阿沃摩尔至埃但40公里宽的德军炮兵群向正前方同时开火，以每小时10万发的速度对凡尔登附近仅20公里左右的三角地带进行猛烈轰击。训练有素的德国炮兵在轰击法军的第一阵地、第二阵地上的单个独立支撑的攻击点和由掩体、堑壕及工事地段构成的目标群的同时，对凡尔登地区的防御区域由近至远的路段、村庄、部队营地、阵地、炮兵阵地、指挥设施、通讯设施进行了长达12个小时的准确射击，共发射了200万发以上的炮弹，凡尔登地区弹痕累累，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摧毁，整个阵地成为一个地狱般的杀人场。

德军对凡尔登的轰击惊呆了法国人。但是，法军统帅霞飞将军没有被惊呆了。

在强大的炮火轰击后，德军步兵开始冲击。他们以为强大的炮火已经消

灭了所有法军工事上的活人，没料到还有法军在坚守着阵地并加以反击。但当天，德军还是占领了第一道阵地。22日到25日这4天中，德军又攻占了两道阵地和杜奥蒙炮台。法军阵线被切成数段。凡尔登的形势十分危急！

在这紧急的时刻，法军统帅霞飞将军于2月25日命令第二集团军司令贝当投入交战。贝当给他的部队划出了一条督战线，要求他的30万军队不能退过这条防御线，用一切手段死守阵地，直至阵亡在沙场。在此作战基础上，贝当把野战部队变更部署，并补充预备队分成4个集团群，一左一右，各负其责。这样，整个法军在凡尔登地区的防御就显得更有层次，纵深的保护就更有保障。贝当还组织了庞大的筑路队和运输队，沿着已勒杜克城到凡尔登的唯一的一条公路，调集大量援军和物资。仅2月27日至3月6日，就平均每24小时有6000辆卡车通过这条公路，有19万部队和17万头供拖曳之用的牲畜送到了前线，从而开创了大规模汽车运送人力物力的先例。防区的划分及后援的保障使凡尔登外围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砸不烂的坚固防卫线。

法、德两军都在不断地为凡尔登战场增加兵力、拼命反复冲杀，从而形成了拉锯战。

从3月5日起，德军将原来15公里进攻正面扩大到20公里，把主要攻击矛头转向马斯河左岸，并由急促的冲击改为稳步的进攻。此时，一个偶然的偏弹对法军逐渐赢得优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4月初的一次双方混战中，法军的一发偏弹，无意中击中了隐藏在斯潘库尔森林里的德军秘密弹药补充基地，引起这次大战中的最大一次爆炸，一下子把德军已装上信管的45万发大口径炮弹全部销毁。德军无数大炮无弹可发，瘫痪在阵地上。法军抓住这一时机，逐个炮击德军的炮兵阵地，粉碎了德军采用的“炮兵摧毁，步兵占领”的作战方案。从2月下旬到4月这70个昼夜里，德军总共只推进了六、七公里。

此时，德军已经知道法军统帅霞飞将军在组织凡尔登战役时，一直在致力于索姆河上的反击，为此法军的机动部队始终没有全部投入凡尔登。5月底，当双方在凡尔登僵持不下的时候，霞飞正在索姆河上准备对德军开辟“第二战场”。德国人知道这样他们就输完了。于是，为了赶在英法联军之前解决凡尔登战役，德皇专门发布命令，要求在6月15日之前占领凡尔登。

6月2日，德军第十军向法军的沃炮台倾泻了大量炸弹后，冒着法军的枪林弹雨包围了沃炮台。6月7日，强击队进入战斗，迫使法军投降。6月21日，德军使用光室窒息弹，试图消灭法军炮队。6月23日，德军以20个师的强大兵力进攻弗勒里村庄的杜奥蒙筑垒和苏维尔炮台，他们在79个重炮连和空军的支援下，在4公里宽的正面向法军阵地发射了11万发窒息性毒气弹和催泪性毒气弹，但苏维尔炮台岿然不动，仍掌握在法军手中。德军对凡尔登中心炮台的轰击和对法军的大量杀伤都没能帮助他们在凡尔登占得一点便宜，法兰西的勇敢、智慧以及无畏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

凡尔登战役打得十分残酷和激烈。由于双方都广泛使用了迫击炮、轻机枪、掷弹筒和喷火器，因此伤亡人数都很大。史称这场恶战为“凡尔登绞肉机”。直到8月，德军仍未能摧毁法军的防御。德军作战6个半月，仅楔入法军防御纵深数公里。

这年6月，俄国人在西南加里西亚对德军发起进攻，德军迫于无奈只得分兵抗击；7月初，法军又在索姆河流域汇同英军对德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德国人只得从凡尔登战场抽出兵力三面作战；8月底，罗马尼亚又加入英法

多国部队对德作战，德军失败已成定局。8月29日，德军统帅法尔根汉被撤职，由兴登堡继任参谋长。10月24日，法军用17万人的军队，配以700多门火炮和150架飞机，对凡尔登德军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击，夺回了杜奥蒙炮台，将德军一米一米地赶了回去。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此战中，双方共发射了4000多万发炮弹，还有难以计数的子弹，战场上竟有炸成10层楼深的大坑。德军共投入了50个师的兵力，损失近60万人；法军投入交战的兵力为69个师，损失约36万人。此战的结果标志着德国的军事进攻能力已从顶峰走向下坡路。

霞飞将军是位杰出的统帅，在凡尔登战役最艰巨的时候，霞飞就在考虑如何才能牵制大量德军，减轻凡尔登所受到的压力，以便扭转战局。他与英国领导人进行协商后，决定在索姆河畔开辟另一战场，并计划于1916年6月下旬即发动军事行动。当时由于法军被大量牵制在凡尔登，能调动到索姆河地区的法军总共只有16个师，而且在开战的那一天实际只到达了5个师。这样，进攻的担子就主要是由英军来承担的了。英军开始投入此战的即有21个师。

6月24日，英法协约国军队的庞大炮群开始向索姆河畔的德军进行狂轰。炮击持续到一个星期，至6月30日达到高潮，无数的炮弹飞向德军阵地，泥土、石块被抛到了半空中，滚滚的浓烟腾空而起。7天时间，英法军共发射了150万发炮弹，平均每平方米的阵地就投掷了近1吨的炮弹。

7月1日清晨，英、法军队停止炮击并吹响进军的号角。英、法军队的士兵开始冲向德军阵地，但他们进展很慢，在德军强有力的火力扫射下，成千上万名的英、法士兵倒下了。到日落时，阵前已躺下6万多死伤的英法军。经过两个星期的血战，到7月14日，虽然英法军的进展只有3英里，但却达到了牵制德军以确保凡尔登的目的。

9月15日，英军在战场上第一次使用他们研制的秘密武器——坦克。此后坦克成了这次大战中最厉害的武器。它的发明比攻城榴弹炮或毒气的意义要大得多。当10多辆坦克隆隆地向德军阵地驶去时，德军的机枪对这庞然大物奈何不得，只得狼狈逃窜，而坦克却夷平了德军铁丝网，压扁了小炮，跨过了壕沟。不过坦克的参战也并未改变索姆河战役的僵持局面。

索姆河大战从7月到11月，时断时续，双方损失都很惨重，无力再打下去。这次战役的伤亡人数为120多万人，其中61万是英法军，65万是德军。索姆河战役成了近代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它是德国经济、军事力量耗尽的第一个标志。这次战役后，英法军事技术开始超过德国。

经过凡尔登。索姆河两大战役，德国企图迅速取胜的希望成了泡影。以后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协约国，德国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到1918年，同盟国终于“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向了最后的“崩溃”。11月11日凌晨5时，德国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德国宣布投降。

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战役，双方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最后以法国取胜而告终。法军之所以取胜，一是在于英、法、俄三方配合默契，迫使德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在三处同时作战。这样，德军所苦心设计的以凡尔登这里为突破口的计划就实际上被英法俄所共同组成的多层次的防守所抵销。二是法军后方有打不垮的运输线，兵源和军备就能源源不断地进入凡尔登，这就为堵住突破口并伺机反击创造了

绝好的条件。三是在凡尔登战役最激烈的时候，法军居然能腾出手来，在另一条战线上组织索姆河战役，牵制了德军兵力并使它后援不足。这些都证明法军统帅霞飞将军的用兵是明智而有余地的。

孙中山“联甲打乙”难成功 改策略“黄埔建军”奠基业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国民党失去了新建立的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未能实现。孙中山继续奋斗，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袁世凯被打倒了，但北洋军阀的各派系仍然交替着统治中国，造成“满清季世，俗靡风颓，不肖官僚，励精图乱……洎乎民国，绵绵延延，滋蔓日广，举世所奉之伟人政客，多与官僚相通，或者变本加厉，每况愈下”的局面。这对于一手缔造中华民国，把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国会、约法等成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孙中山，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京政府采取建议、谴责等和平手段均无效的情况下，为挽救共和事业，只能依靠武力手段了。

1917年6月，孙中山庄严宣布：“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孙中山从此致力于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事业。

要北伐，需要北伐基地，更需要北伐军队，可是此时的孙中山，既没有基地，更没有军队。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时期，孙中山已经吃够了手里没有武装力量的苦头，所以他决心要掌握一定的军队。而此时，西南诸省的一些军阀，特别是广东的军阀，表示欢迎孙中山南下。孙中山考虑再三，他认为西南诸省是他早年革命时着重经营之地，广东更是他最熟悉的民主革命策略地，也是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的重要活动地区，应当是有革命基础的，西南军阀的武装力量也是可以倚重的，孙中山决定回到广东去。

1917年7月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等人会商，决定通电全国，南下护法，讨伐叛逆。之后，又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同时致电广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6省督军及各界，希望“火速协商，建立临时政府”。17日，孙中山率领受革命影响、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应瑞”、“海琛”两艘军舰，到了广州，竖起了拥护约法的旗帜。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军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军政府的武装力量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孙中山对唐继尧和陆荣廷等南方军阀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因为这些人几乎曾经参加或者附义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在孙中山心目中曾留下过好印象，其中的一些人还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些人的特殊的阅历和地位，使孙中山认为完全可以加以依靠以“倚南讨北”。但是，孙中山并不明白，在当时，西南6省固然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有护法的基础，可是由于社会基础仍为地主军阀所盘据，在这非“民国干净土”上所滋生出来的军阀势力并非真心实意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

西南军阀虽然发表过堂哉皇哉的讨逆护法宣言，但他们终究是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集团。他们具有扩大权力和地盘的无餍野心，而这种野心又和他们拥有的军事、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差距，所以他们只能掬兵自固，保住现占地盆，其较强者则在附近省份实行弱肉强食，互争雄长。他们和窃取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固然有矛盾，有争斗，但也有联络和勾结。他们之所以“拥护”孙中山护法，不过是想借孙中山的影响和“借护法之虚名”，收“蚕食鹰攫”邻省之实效。

陆荣廷占据两广，以广东为其霸业的中心。他的野心是求得“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领副总统”。他既为南方一霸，因而极力排斥这一地区的异己势力，更不愿有一个护法军政府置于他的头上，故迟迟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只是因为他拥护冯国璋而反对段祺瑞，加之除桂系之外的其他多数驻粤军队对孙中山南下持欢迎态度，他才觉得也可以借用孙中山的力量与段祺瑞抗衡，实现武力统一南方的目的，才对孙中山南下护法暂取容忍态度。

唐继尧也迟迟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唐继尧本为滇系军阀头子，志在囊括滇、黔两省，并垂涎四川，欲做“西南王”。他和北洋军阀有矛盾，所以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表示了赞成之态，并通电拥护护法。唐继尧对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政权虽无直接的地盘之争，但他不愿自己的驻粤滇军被纳入护法轨道，更不愿因此得罪桂系，所以暗地里也对孙中山南下护法进行阻挠。当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通电揭露桂系与直系军阀勾结，要求拥护孙中山护法时，唐继尧大为恼火，斥为“乱说”，电责张开儒“言大激烈，有损无益，今后应特别注意”。

这样，孙中山拟进行的北伐事业可以侍仗的陆军势力，实际上只有驻粤滇军张开儒第三师、方声涛第四师和林虎一旅。但林虎又远驻雷州，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其他如魏邦平之警察兵、仅只凑数。张开儒等虽拥护孙中山护法，但他们寄人篱下，不断遭到桂系军阀的横暴排斥和压迫。军政府刚刚成立，北伐正在筹划之际，桂系就釜底抽薪，通知张开儒、方声涛，“如滇军离穗，即付给六十万元”，想藉此支使滇军脱离孙中山的领导。驻粤滇军还要受到唐继尧的遥控。当桂系军阀对坚持护法最力的将领张开儒捍卫军政府的行动横加污蔑攻击之时，唐继尧即下令撤掉张开儒的滇军师长之职，改组驻粤滇军，从而使孙中山讨伐北洋军阀时无兵可派。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能把护法运动继续下去，不得不以更大的精力去争取陆荣廷、唐继尧本人对军政府的支持。

陆荣廷是不愿承认军政府的合法地位的，他不仅以各种借口不就军政府元帅职，还与陈炳焜、莫新荣一道，散布攻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言论，拒绝为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提供经费，甚至连对孙中山在广州找一个设立大元帅府的地点都多方刁难阻挠。孙中山为顾全护法大局，一再委曲求全，除多次促请陆荣廷宣布就元帅职外，还派张继专程到广西向陆荣廷表示，只要陆赞同护法，孙中山可以“降心相从，即退让亦无不可”，甚至表示愿亲自到广西和陆荣廷面商护法大计，但陆均不答应。

陆荣廷难以争取，孙中山不得不对唐继尧寄予更大的希望，甚至希望能够“联唐以制陆”。为了“联唐”，孙中山派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专程赴滇游说，对唐继尧所提要求，也作了某些迁就和让步。当时，川、黔和川、滇以及川军各派之间混战不已，唐继尧的图川野心受到各方牵制和遏抑。孙中山为能争取唐继尧迅速图川成功，进而出师武汉，实行北伐，竟满足唐继尧要当靖国军总司令的要求，通电号召统一川、滇、黔的军事行动，设立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由唐继尧担任。

然而，孙中山对陆荣廷、唐继尧的一再退让，并未因此获得支持，反而视孙中山为无能，开始公开拆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台。

到了1918年2月间，当孙中山还在为北伐而竭尽全力时，桂、滇系军阀、政学系政客，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已公开合流，加快了反对孙中山的步伐。他们频频密议，要求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合议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

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领导，通过军阀、政客的“合议”，以南北妥协（实即以南方屈从于北京政府）来消除护法运动。

孙中山虽然坚决反对军政府改组，可是他已无法改变局势。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将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之后又选举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懌、陆荣廷、岑春煊及孙中山等7人为军政府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完全被排挤了，其护法旗帜已被砍倒了。

孙中山终于明白，西南军阀之所以当时“欢迎”他南下，完全是为了利用他的影响以增加与北洋军阀谈判的筹码，而一旦议和成功，则就不需要他了。唐继尧、陆荣廷和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护法运动的大敌，“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1日，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离开了广州，他决定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而不再走联络某一军阀打击另一军阀的老路。

在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将他经过反复力争才取得的20营省防军交予了他颇为信任的护法将领陈炯明。孙中山辞职时，把这支军队组成“援闽粤军”，又集合惠州等12营，先后出发东江，准备援闽。后来，孙中山又抽调革命党人中的一些军事骨干，分任这支军队的各级领导，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这支军队给予了不断的关怀和指导。他派朱执信、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前去陈炯明处予以协助；又两次抵押上海住宅，以在经济上接济陈炯明。

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大战于粤北。孙中山乘机向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湖南的张敬尧、谭延闿等加强联系，敦促他们分头从云、贵、湘三方面围攻两广，又令陈炯明率军回师广州。陈炯明经过苦战，攻克惠州，进占广州，驱走桂军。孙中山对陈炯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委他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将广东军政大权交予了他。11月底，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等人，从上海重回广州，重新组织了军政府，继续高举起护法的旗帜，筹组北伐事宜。

尽管护法的军政府是重新建立起来了，但是，孙中山和他的这届军政府一开始就面临着较上届军政府更为严峻的情势。在外交上，帝国主义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完全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财政上，外交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以军政府的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原定的将关税余额的13%划拨军政府。而更严重的则是陈炯明对孙中山的背叛。

虽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为其组建并一直寄予厚望和鼎力资助的。但是，羽翼已经丰满的陈炯明，早已蜕变为军阀，此时已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由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已经形成，武力中心主义已发生动摇，无力问鼎中原，希图偏安一隅的南方地方军阀，企图利用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心理，以保境安民为口实，割据一方。陈炯明就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之所以率军回广东，并不是为了欢迎孙中山来建立军政府，而是为了据有广东这块富庶地盘。拥有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军队，他挂起“粤人治粤”的旗号，标榜联省自治，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在广东乃至两广的军阀统治。

孙中山因为自己没有军队，所以对陈炯明寄予厚望并一再迁就；而陈炯明为独霸广东，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决心与孙中山分道扬镳。1922年3月21日，正当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北伐事宜时，陈炯明派人行刺了留守广州、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邓铿；6月16日，当孙中山回广州时，陈炯明下令炮轰

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导致了孙中山第二次护法的失败，这次失败，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没有想到将枪口对准他的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

两次在广东组织军政府的失败，根本原因都是军事谋略的失败。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不仅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是革命的死敌，难以倚重和依靠，而且革命队伍内部也可能产生新军阀。因此，要继续革命，必须寻求新的同盟者。经过痛苦的反思和总结，孙中山终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创办了黄埔军校。于是，形势才真正为之一变，一支不同于旧式建军方法的，像苏俄红军似的，具有真正革命精神的革命军队建立起来了，并随即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显示出了无坚不摧的强大战斗力。

在孙中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军事斗争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而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一直苦于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他不得不将斗争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当时的军阀的支持，因而在军事谋略上一直采取依靠或利用一派军阀去打击另一派军阀的方式。虽然孙中山在这里面有幻想，也有策略的运用，甚至也获得过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策略最后都导致了孙中山的失败。在两次护法斗争中，孙中山曾幻想依靠西南唐继尧、陆荣廷去打击北洋军阀，又想联络唐继尧以制约陆荣廷，后又对陈炯明寄予厚望，但结果都只获得了失败。孙中山毕竟是一代伟人，他最终认识到了这种谋略的不足，从而决心学习苏俄，联合中国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这种谋略的调整，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效果，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化的国民武装，终于成为继承并完成孙中山遗志，铲除军阀的基本队伍。

国共合作誓师北伐 叶挺“铁军”名扬天下

北伐战争是民国历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是孙中山先生自民国初年离职后，他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为捍卫共和制度，而同继清政府之后继续坚持反动统治的北洋军阀所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中最有影响的斗争，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中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孙中山在世时，曾亲自领导过1917年、1922年、1924年的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孙中山却从中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联俄、联工、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他去世后的1926年至1927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而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是叶挺将军和他的独立团。

担任北伐先遣部队的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独立团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培养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以共产党所领导的铁甲车队、黄埔军校部分学生、滇军干部学校部分学生为骨干，在广东肇庆建立起了第四军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吴季严任政治指导员。独立团成立后，设立了一个共产党支部，其营、连干部多数是共产党员。独立团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而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还协助开展广东西江的农民运动，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

1925年底，湖南人民发动了驱逐赵恒惕和讨伐吴佩孚的运动，点燃了北伐战争的导火线。广东国民政府决定继承孙中山遗志，再次举行北伐，并以叶挺的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此时，独立团有官兵2100余人，步枪1300余支，水机关枪3挺及手枪40余支。

在独立团离粤赴湘之际，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特地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叶挺的住处召开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对独立团首次参加北伐及其以后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独立团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地与友军团结；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吃苦耐劳，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周恩来还指出现在广东有的军队不愿意打头阵，但是，只要独立团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周恩来最后勉励大家：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1926年5月20日下午，独立团乘火车抵达韶关；26日，独立团全体官兵从韶关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当他们翻越山峦叠嶂的南岭时，连日滂沱大雨，部队冒雨而行，日行山路达60余里；27日，独立团到达湖南郴州；31日，进抵永兴。立即配合已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保卫湘南的战斗。

当时，唐生智正集中主力在衡山方面作战，而粤军陈炯明旧部谢文炳及赣军唐福山见唐生智在湘东南一带防守薄弱，遂集中4个团的兵力，相机进占攸县、长岭。唐生智在此的防守兵力只有不足两个营，而且有一半是缺乏训练的新兵，难以抵挡谢文炳的进攻。可是如果湘东南的阵线被攻破，安仁弃守，敌即可直扑来阳或郴州，抄唐生智军后路，切断湘粤交通。因此，保

卫安仁，巩固湘东南防线极为重要。

5月31日晚，唐生智急电叶挺，说敌人“即日必行总攻击，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叶挺接电，次日即率独立团（缺第一营）从永兴出发，冒着大雨兼程前进。6月2日11时抵达安仁；第一营押解国民政府送给唐生智军的子弹在郴州交接后，也于3日下午赶到安仁。叶挺了解敌情后，决定3日晨以第二营开赴涑田，以第三营开赴龙家湾，由第三营派一个连驻距龙家湾4里远的黄茅铺，主力将从黄茅铺方面出击。独立团连夜冒雨强行，疲劳殆甚，全体官兵顾不上休整，立即投入火线对敌作战。

6月3日午后1时30分，敌谢文炳部进犯涑田，少数搜索部队开始与唐生智军警戒部队接触。叶挺闻讯，当即传令三营长杨宁，如涑田有敌来犯，可相敌援助。下午5时，杨宁由龙家湾向叶挺报告，该营奉派第八连赴黄茅铺警戒，第八连到达时，敌千余人来犯，现已占领阵地，与敌人作死力抵抗。杨宁已亲率第七、第九两连赴援，同时，二营长许继慎报告，敌千余人向原田阵地进攻猛烈，该营已全军进入友军三十九团阵地。

叶挺得悉军情紧急，在团部召开了简短的党支部会议。他指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赢。”会议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保证战斗的胜利。

叶挺决定亲率第一营两个连、机枪连和武装通信队赴援龙家湾，令团参谋长周士第率第一营第三连、侦察连、武装担架队赴援涑田。当时寒雨霏霏，夜黑如漆，泥深路滑，路径生疏，行军极为艰苦，幸而得到许多当地熟悉道路的农民指引，叶挺、周士第两支援军才减少了夜行军的困难，于深夜11时，各自到达预定地点。

在赴援前线途中，独立团官兵不时碰到唐生智部三十九团退下火线的官兵，这不但未影响独立团官兵的情绪，反而更加激起了杀敌的勇气，都互相勉励说：“友军已退下来了，我们快些上去！”叶挺为避免影响与友军的团结，下令对友军退回后方者一律不准阻挠。

当独立团二营刚到达距涑田阵地尚有2公里的涑田墟时，敌谢文炳的两团人已向涑田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独立团立即仓促加入友军阵地，与友军颇多混杂。为阻止敌军从左翼进攻，许继慎将所部第四连布置在涑田左侧数里处，由第五、第六两连担任正面抵抗。三十九团第六连不敌敌军数次猛攻，先行退走，致使阵地多半被敌占领；接着，三十九团二营率先转移，退至距敌1公里处的左翼高地。只有刚刚赶到的独立团二营在许继慎营长的指挥下，继续坚守阵地。正面抵抗的第五连第一排冲退敌一部后，死守阵地至7时，被众多敌人包围，敌人又抄出我军阵地右侧背，第一排迫不得已，将阵地移动至距涑田400米处一带的小高地，继续与敌相持。周士第率援军赶到火线，即派武装担架队接应独立团二营右翼，阻止敌军包抄，巩固现有阵地，以待反攻。此处居民稀少，独立团官兵连晚餐都吃不上，“竟夜在风雨之下，饥寒交作，困苦异常”，但士兵斗志不减，“多要求即刻冲锋”。

与涑田阵地激战的同时，敌唐福山两团1000余人向黄茅铺阵地发起猛攻，独立团三营与唐生智部三十九团第十二连协同抵敌。由于第十二连退却，致使三营第八连被敌军包围，战斗中，3名排长负伤，士兵死伤甚众。叶挺率部队赶到龙家湾时，只见枪声四起，流弹横飞，黑夜之中分不出敌我之所在。叶挺判定本团第三营必已与敌成混战状态，当即派第一连搜索前进，探

寻第三营所在地。

三十九团团团长张辅继周士第之后由安仁赶到淅田。周士第与张辅及坚守淅田阵地的独立团二营长许继慎、三十九团三营长王东原一起商议，拟于翌日凌晨发起反攻。叶挺同意这一作战计划，令周士第率本团在淅田部队协同友军准予翌晨4时发起攻击，务须击破该敌；并令曹渊率独立团第一营携带苏制机枪2挺，亦于同时向黄茅铺正面之敌发起攻击，并与淅田部队联络；第三营携粤造机枪1挺，于翌晨4时40分向黄茅铺右侧高地之敌攻击；叶挺本人则率侦察队。特务队亲临前线指挥。

6月4日拂晓，独立团与三十九团在淅田和黄茅埔同时发起反攻。敌人已知广东援军抵达安仁，且数次进攻均未得手，故于晨2时即以半数兵力作掩护，先行陆续退却。周士第以一部向淅田正面之敌进攻，以主力从淅田以东插入敌军侧后向铁丝坳攻击。战至上午7时，淅田守敌全线溃退，向攸县方向败走。叶挺以一部攻击黄茅铺正面之敌，亲自率主力从黄茅铺以西绕至敌人侧后攻击。黄茅铺右侧高地上，有赣军百余人，受独立团三营包围，被迫翻越高山向茶陵方面溃退，独立团第七连穷追20余里。各部队分头追敌20余里，叶挺见敌已退远，料定必退回攸县，而独立团无法临时渡过洣水，即令收队。但攸县之敌已成惊弓之鸟，当日即陆续向攸县北面的黄土岭撤退。6月5日下午2时，独立团进占攸县。

攸县的收复及衡山的巩固，挫败了敌军攻战衡山、控制湘南的阴谋，肃清了北洋军阀在湘南的军事力量，巩固了北伐战争的前进阵地，实现了敌我双方的战略转换。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发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勇于打头阵，极大地鼓舞了久战疲惫的唐军士气。特别是在驰援淅田、龙家湾之战中，在友军怯战退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人在阵地在，与友军协同作战，最终以一个半团的兵力，取得击溃敌军4个团进攻的胜利。是役共毙敌数百人，俘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创造了一个以寡敌众的战例。唐生智特电叶挺：“这次战役，不仅巩固了湘东，而且稳定了战局，此皆兄之功也。”

叶挺独立团在进入湖南的初战告捷后，军民振奋。接着在工人、农民、学生的配合下，一举拿下长沙，军阀叶开鑫弃城奔命。吴佩孚的部队退至平江，守敌陆泛自吹自擂，妄说什么平江城“固若金汤”，部队精良。可在英勇的叶挺独立团面前，却怎么也“固若”不起来。叶挺独立团与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合作，轻取平江，陆泛无奈，被迫自杀。

8月19日，北伐军逼近湖北边界，吴佩孚急调在湖北的驻军南下沿铁路线扼守交通要道，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

8月27日，叶挺独立团向吴佩孚部队着力布防、工事最为坚固的一个据点汀泗桥发动猛攻。许继慎率第二营从右翼出击，首先冲乱了汀泗桥守军的防御整体。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以密集的火力的封锁独立团的进攻。然而，在独立团一次又一次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而发起的冲锋面前，敌人终于惊慌失措了，全线崩溃。独立团威震神州。

独立团接着又进攻号称鄂南第二门户的贺胜桥，这也是一个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进攻确定在8月30日凌晨，在29日晚，独立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就趁夜摸到距离敌人只有百余米的地方，隐蔽待机。敌人的炮火彻夜不断，探袭的炮弹、子弹掠空呼啸而过，有的炮弹在官兵们中间爆开，登时炸得血肉横飞。但是战士们哼都不哼一声，有的默默牺牲在原地。有的战士被

子弹击伤，只能忍着巨痛，任由血液从伤处冒出，别的战友无法实施救护，而他们自始至终动都不动一下，只是狠命咬着嘴唇，直至咬出血来，最后终于默默地流尽最后一滴血液，牺牲在攻击前的隐蔽工事上。30日凌晨5时，在凄厉的军号声中，二、三营官兵突然群起冲锋，完成了中央突破，随即攻占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大门。

决定敌人命运的武昌之役，独立团又担任了主攻任务。为了战胜敌人，叶挺亲自摸到城边侦察地形。吴佩孚在武昌城郊鲇鱼 设立司令部，在武昌城头安置炮位，在蛇山、黄鹤楼等高地构筑炮兵阵地，城周围战壕纵横，大刀督战队乱砍乱杀，吴佩孚决心同北伐军在武昌作殊死战。攻克武昌的战斗从9月1日开始，十分激烈，独立团的许多指战员都事先写好了绝命书。发起总攻的那天，独立团用云梯爬上城墙，首先攻占蛇山。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一营营长曹渊发扬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的精神，奋勇率队作战，直到悲壮殉身。武昌一战，独立团官兵牺牲了191人，终于攻克了武昌。独立团又大建奇勋。

由于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功显赫，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处处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独立团威名远扬，被人民誉为“铁军”，而叶挺也以他的忠于人民，英勇善战，荣获“北伐名将”的声誉。

武装对抗反革命 南昌起义创红军

1926年由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在工农运动的支持下，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反动军阀纷纷溃败，上海、湖南等广大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面对着这种情况，帝国主义一方面亲自出马，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方面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的办法，积极策划蒋介石叛变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由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逮捕、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筹划召集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湘鄂赣粤4省发动狄收起义；在南昌发动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指挥这次起义。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后来，又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两项紧急指示，要求立即武装工农，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两湖地区5万工农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学生来充任指挥人员，反击右派的进攻；实行土地革命以及严惩反革命等。共产国际的这一“五月指示”，本已指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道路，可陈独秀竟扣押了这些指示，不让党内干部知道，却先送给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的汪精卫看。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要求陈独秀公开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竟遭陈独秀拒绝，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作出的拥护国际“五月指示”的决议。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而陈独秀又放弃武装斗争手段，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7月上旬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方针。7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后，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部分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并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

南昌起义的决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那种异常严峻的时刻作出的伟大谋略，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之所以选择南昌为起义地点，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统率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这3个军和一些其他部队，而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叶挺担任着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贺龙担任着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虽然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坚决表示跟党走。同时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在他的军中任党代表，他的部队中还收留了300多名从两湖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这些部队在7月间的“东征讨蒋”口号下，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朱德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个教导团是朱德根据党的

指示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关系办起来的，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军官学校，当时在校的有 300 多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朱德还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掌握着两个警察大队。一时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已达 3 万人以上。

7 月 15 日武汉政府公开宣布“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等部队对这个地区取包围之势。张发奎也已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 C.P. 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 C.P.” 的表示。局势已到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被完全断送。

关于南昌起义的大体设想是确定了，但这只是初步的，因为决定此事的时间非常匆忙，有关怎样发动起义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还有待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商定。当时，中共中央不少负责人因武汉形势紧张，已先后转移到九江，周恩来即安排聂荣臻速去九江，通知在九江的中共党员，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7 月 20 日，在九江的部分中共中央负责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举行了谈话会。会上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对九江谈话会提出的这些意见，因为形势已更加紧急，中共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立刻表示同意。7 月 24 日。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

南昌起义计划以贺龙的二十军为主要力量。虽然贺龙那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的 6 月间在武昌时曾明确地对周恩来表示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7 月 23 日，当贺龙从鄂东到九江时，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贺龙立刻作了完全同意的表示。

而此时，另一个针对贺龙、叶挺的阴谋也正在酝酿。7 月 22 日，汪精卫到庐山，和孙科、朱培德、张发奎密谋策划，企图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扣押，以解除他们的兵权，并命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待命，以便反动派队伍将其包围，强迫缴械。这个阴谋为在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他立即赶往九江，将此消息告诉了贺龙和叶挺，他们在一只小船上商量了对策，决定不理睬张发奎要他们去庐山开会和部队到德安集结的命令，而将部队直接开往南昌。

7 月 26 日，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赶往九江，立即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开会，周恩来向会议报告了中央关于立即发动南昌起义的意见，明确指出在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会后，周恩来又交待聂荣臻：到九江、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将第四军的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 月 27 日，周恩来从九江秘密来到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通过抢修恢复的铁桥，先后开

到南昌。也是这一天，周恩来在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了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到会的除周恩来外，还有朱德、恽代英、彭湃、叶挺、李立三、聂荣臻、刘伯承等人，还吸收了江西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参加，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根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中共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负责这次起义的组织领导。这次会议分析研究了敌我力量对比：敌军只有1万人左右，而我军有3万多人，又是先发制人，敌人没有准备，估计可以成功。会议决定7月30日晚举行起义，起义的代总指挥为贺龙，前敌代总指挥为叶挺。

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没有参加前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即于第二天亲自到第二十军的指挥部去，郑重而又诚挚地把武装起义的计划通知贺龙，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毫不迟疑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并派刘伯承到他的指挥部协助制订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于7月30日晨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来阻止起义，要求起义征得“张发奎同意”后再进行。周恩来和其他前委坚决反对，认为暴动断不能拖延，更不能停止：对于暴动，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切不可依赖张发奎。由于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一直辩论到7月31日早晨，张国焘才表示服从多数同志的意见。这样，起义不得不推迟，前委于是决定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拂晓4时。

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前委以军、师为单位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分别在会上传达党中央和前委的决定，宣布起义的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有关规定。晚上9点以后，起义部队进行动员，秘密进入指定的战斗岗位。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情况：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但在他跑去向敌人告密时，被该营战士发现，立即报告了贺龙；贺龙赶紧告诉了周恩来，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两小时进行。

根据前委的部署，朱德的任务是设法在起义前拖住驻南昌的第三军两个主力团的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7月31日下午，朱德部署好军官教育团和公安局的起义准备工作，便来到城西大士院街口的嘉宾楼，他在这里设宴请客，请的就是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军团团长肖日文。宴后又请他们打麻将直到起义快要爆发。使这两个团陷于群龙无首的状况丧失了战斗力，迅速被我起义部队缴械。

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南昌城油外到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尽管驻守南昌的部队进行了顽强地抵抗，却终于不能抵挡起义军的猛烈攻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到清晨6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了！

起义者按照中央事先的决定，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接着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革命宣言》、《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有委员25人，其中少数人不在南昌，如宋庆龄、邓演达和何香凝；

周恩来、朱德、谭平山、贺龙、叶挺、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等均为委员。革命委员会以吴玉章为秘书长，下设党务、宣传、财务、工农运动4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处、参谋团等机构。

前委还将参加起义的部队3万多人整编为3个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贺龙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第十一军代军长。

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3000人赶到南昌。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周恩来见到他们十分高兴，说：“行动很成功！我没有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撤离南昌，挥师南下。两个月中，下瑞金，夺会昌，占汀州，解放潮州、汕头。在赣、闽、粤三省点燃了革命烈火，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最后终因在三河坝分兵，寡不敌众，在汤坑遭到失败。除了一部分队伍奔向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外，剩下的2000多人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湘南，于1928年4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八一南昌起义，在军事上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的大旗，揭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开始。没有这个时期创造的人民军队，便没有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退中求进”黄陂歼敌 “斩头去尾”东陂大捷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工农红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朱德又率南昌起义之后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给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他们开始感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是原先估计的“癣疥之疾”，而是威胁他们反动统治的“心腹之患”了。从1930年到1932年，蒋介石分别组织人马，连续三次对中央苏区（即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却以出色的战略战术，连续三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蒋介石气急败坏，又于1933年2月，调集50万大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以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而此时，红军主力只有4万多人。更重要的是，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共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被免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粉碎敌人“围剿”的重任，落在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身上。

蒋介石太想一举歼灭在井冈山周围的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了，所以在第四次“围剿”中可真是下了大本钱。他采取“分进合击”，主力集中于中路的作战方针，企图包围和歼灭红一方面军于黎川附近地区。蒋介石的部署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蒋介石嫡系12个师为主力，在杭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1个旅，自东而西向连城、瑞金进攻；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共6个师又1个旅，由南而北进取兴国、雩都、会昌。左、右两路军主要担负就地“剿办”任务，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进攻。

得知蒋介石又调重兵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时，朱德和周恩来便一起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商议对策。那时，毛泽东虽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军事上没有“发言权”，但周恩来和朱德相信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能力，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毛泽东点燃一只香烟，对着作战地图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肯定地说：“敌人虽然有20多个师，近50万人马，分三路而来，其实只能当3个师，4万人马。”毛泽东具体分析说：“敌人三路军中，右路军余汉谋部，都是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都是十九路军班底，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都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去应付就行了。”

周恩来、朱德深为毛泽东的分析所折服。毛泽东继续分析说：“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华宗四十三师，后又改编川军五十二师。所以中路军12个师中，只有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等3个师，自成一个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军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的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5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50万军队，只能当4万人。”

朱德疑惑地说：“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敌50万大军中，就以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第十一师3个师战斗力最强，其中第十一师居冠。据说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本钱，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出色，为蒋介石屡屡嘉奖。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了吗？”

毛泽东回答说：“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十一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十一师，便摧毁了陈诚意志；摧毁了陈诚意志，敌军自然就会再无斗志了。”

听了毛泽东的一番分析，周恩来和朱德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心中有数了。

此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因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已无法再在大城市中立足，只能从上海搬到江西瑞金，“左”倾错误就在中央根据地内全面贯彻。对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博古以及共产国际从德国派来的“军事家”李德等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却在1933年2月4日制定了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的战略决策，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移军抚河西岸，攻占敌人重兵防守且有坚固工事的南丰城。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蒋介石每次进兵中央苏区，便以南丰为军事支撑点，屯积粮草弹药，作为大军补给地。对这样的据点进行进攻，必置红军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和朱德不同意博古、李德的战略部署。周恩来致电中央局，指出“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并说：“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应“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总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攻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兵力，攻坚不下正是敌人目前要求”。

周恩来的主张遭到中央拒绝。周恩来只得遵命率一方面军向南丰开进，拟围攻南丰。周恩来知道此仗难以获胜，故进军南丰同时向中央局提出在“敌情地形有变”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人增援三、四师由马路开进”的情况下，则放弃围攻南丰城的计划。

2月12日黄昏，红军乘夜幕降临之时进至南丰城下，四面包围后，便开始架炮攻城。一时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整个南丰城激烈地动摇起来，枪弹和炮声的凶猛、密集，恰似是疾雷狂雨卷带着暴风倾盖下来。子弹狂飞乱舞，烟雾连着烟雾，火焰接着火焰。地面上的万物，都在颠簸、颤抖。尽管红军攻势凶猛，但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强大，可据城固守待援。城外是一片开阔地，红军无法接近城墙，激战一昼夜，红军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歼敌不足一营，损失却不下300人。担任主攻任务的我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邀和2名团长壮烈牺牲。

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研究后认为，红一方面军被吸于坚城之下，敌增援部队已兵分3路而来，再相持下去有被夹击的危险。周恩来果断地一面致电中央局，再次强调红军的战略应是“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而强攻南丰，“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一面把中央“强攻南丰”的指示改为“佯攻南丰”，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一带，目的不在于打下南丰，而在于吸引敌人继续增援，以便查清敌人行军路线后，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法消灭敌人。此谋略亦即“围城打援”之计。

来援敌人正是陈诚倚为主力的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三个师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不易，更无法相

互救援。

周恩来弄清敌援军行进路线后，即与朱德、刘伯承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伏击敌人第五十二、第五十九这两个师。当即下令从南丰撤围，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为左翼，进到黄陂一线设伏；以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为右翼，负责阻击敌人和掩伏左翼红军。

黄陂地区山连岭，岭连山，绵延数十里，是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敌人行军于群山之中一条 15 公里长的狭谷地带，正逢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行动艰难，士气低落。又误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疏于戒备。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埋伏于狭谷南侧的高山，地形、天候、群众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有利。

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他将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 1000 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2 月 27 日上午 9 时，敌军第五十二师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红一军团的火力射程之内。当敌人全师 2 个旅 4 个团从红军指挥所前经过时，参谋请示林彪：“打不打？”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果然，敌人辎重部队随后就过来了。参谋再次请示：“打吧？！”林彪仍冷静地说：“等护卫团。”直到敌五十二师全部进入红军左翼部队设下的“口袋”时，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

“呼！呼！”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像蜿蜒 10 多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数万红军将其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 3 小时的激战，全歼敌五十二师，俘虏师长李明。

敌人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在进行实弹演习。下午 2 时，行到霍源以北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右翼部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到天黑。28 日清晨，红一方面军右翼部队已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 时发起总攻，激战 11 小时，歼敌 4 个团。陈时骥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一、三军团消灭，陈时骥也被活捉。

这次战役就是著名的黄陂战役。首战告捷，红军掌握了主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陈诚赶忙将 3 个纵队合编为两个纵队，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两个纵队以梯次形式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发动进攻，企图从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扭转战局，配合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到合围的目的。

周恩来得知情报后，即与朱德、刘伯承商议，认为如果能使陈诚的两个纵队拉大距离，红一方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攻歼其一部。为此，他命令红十一军进到广昌西北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陈诚部前纵队加快南进，以便伺机歼灭后纵队。陈诚不知是计，误认为红十一军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一个师加到前纵队。

3 月 19 日夜，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灯火通明，周恩来与朱德、刘伯承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凝神注视着铺在桌上的地图，根据敌情报告，分析判断敌军的进展位置，制定了围歼敌军的部署：以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岷一带之敌，以一部

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九师，并向新丰市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向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地区之敌，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以红二十二军为预备队。

20日夜，红一方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此时，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甘竹，后纵队的第九、第十一师刚抵草台岗、东陂之间的霹雳山，两队前后相距90里，首尾不能相顾，敌后纵队已陷入立无援、插翅难飞的绝境。

3月21日凌晨，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向进入包围圈的敌人发起攻击，红五军团首先突破南面霹雳山敌第六十六团阵地，敌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开了个缺口。接着，红三军团也将敌雷母山阵地突破。敌各团侧背受到威胁，遂全线动摇。激战一天，将敌十一师大部消灭，只剩下1个团，师长肖乾重伤毙命；第九师消灭小部；第五十九师残部消灭殆尽。这次战役就是有名的东陂战役。漏网敌人乘夜向黄陂方向溃退，先头纵队见后路空虚，无心恋战，只好向临川方向逃命。

黄陂、东陂二役，共歼敌3个师，俘敌万余人，并缴获300挺最新式机关枪，40门大炮。敌人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有法国造“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第十一师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精锐部队。这3个师的被歼，使蒋介石不得不发出“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的哀鸣。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遵义会议”万众齐盼毛泽东 “四渡赤水”巧妙摆脱围追堵

1933年春，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被排斥，致使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未能被粉碎，红军不得不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中，“左”倾错误领导者一改军事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出发前既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也不做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而且带上庞大的后方机关和大批东西。在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左右夹击下，行动迟缓的红军摆脱不了敌人。虽然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人员损失一大半，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这时，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点。大家一致认为，红军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如果再这样下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回到领导岗位上来，指挥红军，挽救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遵义会议召开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935年1月12日至18日，在红军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评和揭露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失利，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在党内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之后，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为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红军进行了整编，精简机构，充实基层，轻装前进。这样，红军就改变了过去行动迟缓的局面。而真正摆脱被动局面的，则是毛泽东“四渡赤水”的军事杰作。

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在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5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力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当国民党军队重点向遵义逼近时，毛泽东于遵义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即1月19日就指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按照北渡长江的预定计划，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准备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行军途中，毛泽东发现蒋介石已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毛泽东之命撤出战斗，从而减少了红军的损失。毛泽东采取紧急措施，决定暂时改变原拟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的军事计划，迅速西渡赤水，向四川古蔺南部进军，使部队免遭更大的损失。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3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游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蒋介石也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军二、六军团；嫡系薛岳兵团和滇、黔地方军阀部队组成

第二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全歼中央红军。

而此时，中央红军正待命在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今威信）一带，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边过农历年，一边进行整编。各军团（除一军团外）均取消师一级编制，3万多红军编成了16个团（大团）。红一军团由3个师9个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损失较大，由3个师编为4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为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也作了必要的精简，下放到连队去。这样，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2月10日，中央红军完成了在扎西地区的集结。毛泽东见敌军主力一、二纵队经黔西、大定西进，第三纵队到了镇雄、毕节，大军云集黔西，遵义地区只剩下黔军王家烈的“双枪兵”看家，便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回头东进，二渡赤水。

红三军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红十二团为前卫，于18日经大村、鱼洞沟，东进到赤水河附近。黔军闻讯，急调1个团的兵力前来堵截。为争取先机，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抢先赶到赤水河畔的二郎滩，一面组织工兵搭浮桥，一面用3条小船以最快速度运送先头部队过江背水迎战。红军抢在了敌人的前头，指战员们毫无畏惧地向敌人冲击，吓得敌人不停地往后撤。19日，红三军团顺利地渡过了赤水河；到21日，其他红军部队也渡过了赤水河。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的2个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而黔军王家烈又令其精锐扼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在向娄山关前进途中抓获了几名黔军俘虏，弄清楚了娄山关敌人的防备情况。中央军委即赋予彭、杨指挥全军作战之权，彭、杨立即命令红十三团从正面向娄山关之敌实施攻击，红十二团紧跟其后协助攻关；红十团、红十一团迂回板桥之敌，配合正面部队突击敌人；红一军团由长岗、大银厂出发，向石炭关进攻，攻占后，继续向黑神庙东南之敌侧后迂回，并以红五军团迟滞由桐梓方向来援之敌。

26日黎明，红十二团在接近关口处跑步前进，忽见一队黔军大摇大摆地从关口下来，红军迅速埋伏在公路两侧，当敌人离埋伏地50多米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大部敌人当场被击毙。红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攻占了娄山关两侧的制高点。红十三团从正面向娄山关以南之敌实施冲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红十团、红十一团和红一军团主力此时已迂回到敌人后方，向板桥和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娄山关守敌只得纷纷向后溃逃。

27日晚，红三军团向遵义老城发起猛攻，经过一晚上的激战，于28日晨再次占领了遵义城。蒋介石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急令薛岳部的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向遵义南门外老鸦山发动猛烈进攻，在红军的正面抗击和侧翼出击下，敌人全部被歼灭。

中央红军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歼灭“中央军”2个师，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支以上，这是中央红军“长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不仅开创了黔北的新局面，为创建云贵川新苏区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而且使红军指战员恢复了信心。

蒋介石接到遵义战报大发脾气，给薛岳发电报，说遵义之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下令说：“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他意犹未尽，3月2日即带上宋美龄、陈诚等人，飞在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已向东转进，其目的仍在乌江东岸，图与肖、贺合股”，于是制定了封锁乌江的计划，令各部在乌江沿岸分段“严密守备，坚固防堵”，以阻挡中央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达歼灭中央红军于乌江以西的巴黔大道地区的目的。5日，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围攻，毛泽东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红军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由（今长冈），寻歼敌第二纵队。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认为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敌军向遵义地区开进，要不顾一切地找红军决战，鼓励部下“残匪西窜是我军围歼唯一良机，如再不能剿灭，则再无革命军人之资格”。

3月14日，中央红军侦察敌人第二纵队3个师已到鲁班场、三元洞地带，其主力在鲁班场；第一纵队2个师15日有到枫香坝的可能；第四纵队可能固守岩孔、泮水、新场地域。据此，中央红军前敌指挥部决定于15日集中主力对鲁班场敌第二纵队发起进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转变整个局势。

15日拂晓，红军向敌第五师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10时许，红军向敌3个师的阵地全面进攻，均被敌重机枪的猛烈火力所压制，屡攻不克。双方激战到下午1时，敌人出动飞机，在敌步兵白色标志的指引下，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猛烈扫射，压得红军抬不起头，伤亡不断增加。后来，红军战士也脱下白衬衣摇晃，弄得敌机难以分辨，只好飞走。

是日黄昏，红三军团向敌阵地猛攻，敌依靠险要地势顽抗。红军以密集队形向敌实施连续突击，与敌反复争夺。战到天黑，因敌占据有利地势，加上红军前进方向遍布密林，部队运动受阻，只得停止攻击，与敌对峙。傍晚7时许，三元洞之敌向红军右侧迂回，黔军2个团由岩孔尾追红三军团的红十团、红十三团到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毛泽东为避免红军受敌夹击，下令撤出战斗。

毛泽东并不向蒋介石示弱。他见调动敌人重兵于遵义，其他地区防御已呈薄弱环节的目的已达，遂决定指挥红军跳出蒋介石的包围圈。3月16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红军三渡赤水，重新进入川南，毛泽东的目的是要给敌人造成错觉，从而更大规模地调动敌人。

蒋介石果然上当。他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各路部队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叙永地区。蒋介石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3月18日，蒋介石发布在叙永、赤水河镇以东及沿赤水河以西地区“聚歼”中央红军的命令。其部署是：第四纵队负责赤水河各渡口的防堵，各渡河点要星夜赶筑据点碉堡工事，并于两碉间构筑子碉，连点成线；川军一部

在江门、叙永、赤水河镇线上，切实筑碉防守；第三纵队向毕节以北集结，与川军取得联络，严密联防；第二纵队和第一纵队北移到鄢家渡、瓢儿井间，摸清中央红军动向后，再定行止；川军另一部向古蔺方向尾追。

就在蒋介石部署“聚歼”中央红军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已及时察觉了尾追中央红军之川敌将配合叙永、古蔺之川敌和毕节、赤水河镇之滇敌对红军再进行截击，此时红军再“西进”，必“不利”，遂于20日下午5时当机立断，决定中央红军“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定部队21日夜由二郎滩到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在东岸寻求机动。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红军于21日晚迅速而有秩序地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急进，直逼乌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受毛泽东之令，又在马鬃岭西北大路上摆露天标语，路两侧放烟火扮炊烟，伪装主力正在此地区活动，并向北出击。毛泽东还命令主力红军在南进途中，一闻飞机声，立即向后佯装北进，待敌机走后再转身南下。就这样，在蒋介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中央红军主力已于30日到达了乌江边。

乌江一带此时正连日阴雨绵绵，乌云密布，敌机无法临空侦察，因而不知红军去向，更料不到中央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抵达乌江。当时乌江南岸只有敌军一个营防守，红军先头部队乘夜暗，在风雨呼啸的掩护下，出敌不意地渡过了乌江。红三军团奉命由安底经长坝转天林寺到后山至对门寨地段架设浮桥。

3月31日，红三军团分由江口、大塘河、梯子崖三处浮桥渡江，于下午2时全部到达南岸。接着，经牛场转到黄岗、凤凰寺、苦草坪地区待命。

此时，中央红军除红九军团继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其余部队都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北。从此，红军转危为安，蒋介石纵有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也在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艺术方面不可能有所作为。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刚刚由遵义会议而重新掌握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后，指挥红军摆脱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四面夹击的危境的一次大胜仗，显示了其高超的军事艺术。在敌强我弱的险恶情势下，毛泽东灵活地掌握敌情变化，巧妙地制造烟幕、隐藏动向，指挥中央红军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避实就虚，创造和抓住战机，这种“出奇制胜”的谋略一再打乱蒋介石的部署，使敌人防不胜防，终于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是中央红军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的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是毛泽东平生军事谋略的一“得意之笔”。

小日本妄想“速战速决” 毛泽东规划“持久之策”

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旧的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创伤尚未医好，新的经济危机又即将发生。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武力霸占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法西斯国家，便加紧了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和行动。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长期扩军备战，片面发展军需工业，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使国内的经济、政治矛盾更加尖锐化。为缓和国内矛盾，逃脱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日本的地主集团和垄断资产阶级，都极力支持法西斯军人掌握政权，支持发动独占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抗日战争也全面展开。抗日战争应当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众说纷坛，而毛泽东宏论一出，为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

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部就制定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以少数精兵在短期内迅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结束对华战争。他们还计划：战争发动后，在华北，两周攻陷大同，一个月攻下山西全部；在东南，10日内占领上海，然后分兵直逼南京，胁迫国民党政府作“城下之盟”；如达不到目的，再用3周的时间攻下南京，1个月攻取武汉，然后乘势由武汉南下取湖南，由华南登陆占广州。他们梦想在3个月内全部结束对华军事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并未认真布防，使敌人有机可乘，但广大的爱国官兵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勇抵抗，打破了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虽然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的广大地区，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纷纷失陷。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这种情况下，除国民党中的少数亲日派大唱“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亡国论调外，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抗日。大敌当前，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主动提出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以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何种谋略？在抗日战争中，当如何才能战胜具有先进装备的日本帝国主义？针对这一切问题，毛泽东精辟地提出了他的见解并为其制定了正确的谋略。

为要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制定一条适合抗战新情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在建军原则上，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示全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在战略战术原则上，面对着敌强我弱，日本侵略军残酷进攻和国民党借刀杀人，即借日军之手消灭或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把正规军变成游击军，把

正规战变成游击战，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这样的战略转变方针一经洛川会议确定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就多次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发出指示，反复强调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的重要性；指出分散兵力，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是战胜敌人独一无二的办法；整个华北，都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

但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为了批驳这种错误观点，教育人们在历史的转变关头，适应和跟上形势，更好地实现战略转变，毛泽东在对形势和军事作了大量的研究的基础上，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需要有它自己一整套的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原则；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游击战争还要建立根据地，要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切就使抗日游击战争走出了战术的范围，上升到战略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根据实际情况，为由正规军改变为游击军，由正规战改变为游击战的八路军，提出了六项主要方针或原则，即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6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切盼抗战的胜利，但抗日战争究竟会如何发展？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间都没有解决，特别是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更加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影响人们对抗战的认识和动摇人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亡国论”主要来自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就公开制造舆论，到处散布“中国武装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所灭亡）等悲观论调。抗战开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里却仍然很多，尤其是随着国民党军队战场上的大溃败，“亡国论”又嚣张起来，他们公开宣扬“再战必亡”。汪精卫竭力散布战争恐怖论，说什么：如果战争再打下去，“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他们还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鼓吹“亡国论”。由于汪精卫一伙的叫嚣，再加上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长驱直入，这种“亡国论”在国民党统治区颇有影响，许多人对抗战丧失了信心。

“速胜论”来自两个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是“速胜论”的主要代表。他们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幻想依靠美、英等国的援助，迅速打败日本；或者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上；或者幻想日本国内

发生变化，从而迅速结束战争。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等人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当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更冲昏了蒋介石集团一些人的头脑，“速胜论”唱得更加起劲。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发表的一篇题为《这一战》的社评中，把台儿庄胜利后的徐州会战当作“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了。但是，没过多久，当徐州失陷，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时候，这种“速胜论”就宣告破灭，许多人又陷入了“亡国论”的悲观境地。

在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存在着轻敌主义的“速胜论”。他们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力量，只看到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反动腐败的一面；只看到国民党有 200 多万军队，就认为只要国民党同共产党一起有效地打击日本，日本就不值一打，不出 4 年，就可以打败日本，取得抗战胜利。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极端错误的，对抗日战争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它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瓦解着中国人民的斗志，影响着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中国共产党除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外，在抗战的最初几个月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许多领导人，都在报告或论著中，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他们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充分动员民众，依靠民众是坚持持久战的基本条件；并批判了恐日病者和急性病者散布的民族失败主义。

为了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揭示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全国人民指明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光明的前途，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重要讲演。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用客观全面的观点总结了 10 个月来抗日战争的经验，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一科学论断。

毛泽东从具体分析入手，首先指出了抗日战争总的特点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即是说：日本所进行的是反动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而中国则是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的年代。战争的性质及时代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根据中日战争的性质及时代特点这个总的判断，毛泽东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着的 4 个基本因素是：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据有关材料统计，当时日本年产钢 580 万吨，拥有作战飞机 4000 多架，海军舰艇 126.8 万吨；而中国钢的产量只有 9 万吨，作战飞机 305 架，海军舰艇 5.6 万吨。日本在军力、经济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

日本所进行的侵华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战争；而中国所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日本是小国，地小（领土面积只有 37 万多平方公里），物少（资源贫乏），人少（人口约 7000 多万），兵少（100 多万军队），因此，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是大国，地大（当时我国的领土面积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物博（资源丰富），人多（人口约 4.75 亿），兵多（300 多万军队），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日本是失道寡助，中国是得道多助。苏联政府从抗战爆发后陆续给了中国 4.5 亿美元的贷款，供给了大批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枪枝弹药，并派来航空志愿队 2000 多人。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来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印度派来以柯棣华为首的医疗队援助中国抗战。1938 年 2 月，国际反侵略总会在伦敦召开援助中国大会；英国反侵略分会则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日本侵略者却遭到世界人民和舆论的谴责和反对，处境十分孤立。

从以上 4 个因素可以得知，日本只有一个长处，即“强国”，其余三个即“退步”、“小国”、“寡助”，都是短处；中国则只有一个短处即“弱国”，而有三个长处，即“进步”、“大国”、“多助”。日本由于有一长，是帝国主义强国，这是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同时，在目前它的三个短处，暂时还没有发展到抵消它的长处，所以它还能嚣张一个时期，但是，那三个短处又毕竟限制了它的长处。所以，日本的强是相对的强，暂时的强，也就是强中有弱。而中国，短处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很弱，所遇到的敌人，又是帝国主义中的强国，所以暂时还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但是，它还有三个长处，其中进步性是主要的，因此，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

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中日战争中存在的这 4 个因素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日本是帝国主义，它的反动性、野蛮性将随着战争的发展日益暴露；中国的进步性，也将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日益发挥。“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强我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因此，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由以上 4 个因素就决定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这是一般的方针，不是具体的方针。具体的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进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则是战役的反攻战。在作战形式上，运动战在整个战争中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敌我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所决定，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出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我军的正确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准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从而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指明了争取胜利的道路，坚定和增强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无比正确。

杨成武伏击辻村大佐 聂荣臻歼灭“名将之花”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年10月30日晚上，正在冀西阜平参加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工作会议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杨成武将军，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紧急报告：坐镇张家口的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派出辻村大佐，率领1000多日伪军进驻涞源，分兵三路，有向第一军分区的银坊镇、走马驿、灰堡地区“扫荡”的迹象。其主力两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及一部伪军600余人，由辻村大佐亲自指挥，经龙虎村、白石口、鼻子岭向八路军所在的银坊镇地区逼近，企图消灭在银坊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杨成武将军接到这个报告后，立即请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拟定了一个伏击歼敌的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最后竟网住了日军的“名将之花”，令解放区的抗日军民拍手称快，而敌人却恐慌异常。

对于日军将进驻涞源，“扫荡”我晋（山西）察（察哈尔）冀（河北）军区的行动，早在八路军的意料之中。

地处太行山上的涞源地区是敌我必争之地。八路军可从涞源两侧经察南挥戈北上，直捣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老窝张家口。在敌人方面，则把张家口——涞源一线的据点，看成是插进我晋察冀军区的一把“尖刀”，企图用这把“尖刀”把我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割裂，以阻挡八路军向张家口进击，巩固其察南占领区，因而在涞源常驻有重兵，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扫荡”。在1939年9月底，敌人已从南线开始秋季“扫荡”的尝试，出动日、伪军共1500多人进犯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的陈庄，但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现在，敌人又在北线开始其报复性的大“扫荡”了。可是，敌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经过两年多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早已积累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战略战术。

对于粉碎敌人的秋季“扫荡”，晋察冀军区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部队已经过整训，特别是陈庄全歼敌人的胜利，强烈地鼓舞着我军各分区的部队，广大指战员纷纷提出：“向陈庄作战的兄弟部队学习，我们也要来个歼灭战”，“用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胜利庆祝晋察冀军区建立二周年”。

而在涞源一带作战，杨成武等人认为有许多有利条件：涞源是八路军进入敌后最先解放的第一个县城，有坚强的党组织，经受过1937年敌寇13路军的残酷“扫荡”和1938年秋季大进攻的考验。群众斗争情绪高涨，斗争经验丰富。虽然涞源县城在1938年秋末被敌人进占了，可周围的乡村政权仍完全在八路军的控制当中；就是在城里，也有隐蔽的组织及情报网，因此敌人一有动静，八路军便能立即掌握。再从地形上看，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道，一过内长城，是光秃陡立的石山。从白石口到雁宿岩一段，两面是高插入云的大山，中间是一条仅宽四、五十米的河套，这是一个天然的口袋。如果把部队埋伏在两边，再把白石口的口子堵住，管叫敌人进得来，出不去，插翅难逃，只有束手就擒。

根据八路军掌握的有利条件，杨成武等人早就研究并拟定了一个基本作战方案。即采用伏击的战术手段，集中兵力歼灭向白石口——银坊一线进犯之敌；伏击地点选择在雁宿岩附近。当杨成武得知敌人正向白石口——银坊一线行动时，立即向聂荣臻司令员作了报告和请示。聂司令员立即批准了杨

成武上报的作战方案，为了确有把握消灭敌人，聂司令员还决定以主力一、二、三团参战，并命令杨成武立即回军分区组织指挥这个战斗。

11月1日，杨成武从阜平赶回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管头。途中经银坊时，他与驻在银坊的三团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两人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并指示各团立即按作战计划的要求作好战斗准备。

11月2日，杨成武在军分区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具体研究怎样打击敌人。杨成武决定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以第二团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和第三团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分别率领本团，埋伏于雁宿岩东、西两面；以一部分游击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进至伏击圈后，第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的退路。会后，各团干部们立即分头察看地形，指挥部队进入战斗位置。

11月3日清晨，白石口之敌在解放区游击队的诱击下，疯狂地向三岔口前进。7时许，敌人进至雁宿岩八路军的伏击圈内，八路军打响了同敌人的战斗。二、三团突然从东、西两面漫山遍野地压下来，一团则从敌人前后杀出，200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向山下的敌人开火。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得山岳颤抖。敌人遭此粹然打击，显得惊慌失措，但仍占领河套附近的小高地顽固抵抗，并以机枪大炮掩护，向八路军三团阵地组织了5次反扑。三团的指战员们以手榴弹、刺刀奋勇迎击，一、二团从敌人侧后猛烈扫射，打得敌人纷纷滚落山坡。接着八路军展开了全面攻击，至下午4时，敌人已被杀伤大半，余下的被压缩在上、下庄子附近和雁宿岩西北的一个高地上。

黄昏前，上、下庄子的敌人又被八路军消灭干净，只剩下西北高地上的敌人。这时，八路军各路部队集结在高地下面，把敌人围得水泄不通。三团一营担任对这个山头的主攻。营长赖庆尧在最前沿进行指挥。冲锋号一响，三连的支部书记脱下棉衣棉裤，高举驳壳枪，呐喊一声，领着全连一股疾风似地刮上山头，把敌人压下去了。突然，一排六发炮弹飞来，山头成了火海，敌人反扑上来，三连的勇士们被压下山腰。不一会，山腰上又杀声冲天，三连又冲上去了，控制了整个山头。可是，垂死挣扎的敌人，再次倾全力反扑上来，山头上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支部书记身负数伤，浑身是血，仍挥动着染满鲜血的驳壳枪，指挥部队同敌人搏斗。因为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上予以支援，勇士们又被压下山来。

第三次冲击立即开始，绰号“病号排”的曹葆全排也投入了战斗。冲锋号震荡山谷，枪弹像骤雨一样浇落在敌人阵地上。神枪手孟宪荣的机枪指处，敌人纷纷倒下。站在他旁边指挥的纪亭榭团长大声喝彩：“好呀，神枪手狠狠地揍呀！”紧接着他振臂一呼：“同志们冲呀！”随着团长的喊声，曹葆全排长领着全排像猛虎一样地冲在队伍的头里，刹那间就冲上了山顶，大队如狂潮一样地涌上去了。敌人被压下沟底，手榴弹像冰雹似的倾泻在沟里，敌人被浓烟烈火吞噬了。600多名日伪军除13名缴械投降当了俘虏外，全部被消灭在河套里。

打扫战场时，在敌人的尸堆里找到了身负重伤的日军辻村大佐。他还要保持“皇军”的“体面”，不让八路军的医务人员为其包扎、急救。后来因伤势过重，死在雁宿岩上。

由于白石口之敌被歼灭，插箭岭、灰堡两路敌人，慑于八路军威力，仓皇溃退，缩回涞源城去了。

辻村大佐的部队在雁宿岩被八路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使得号称“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11月4日，他倾其张家口老巢的兵力1000余人，亲自率领，出动数百辆卡车急驰涞源，沿着辻村大佐走向覆灭的旧路，向解放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企图再让八路军在雁宿岩设伏，好让他以优势兵力反击八路军，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然后扑银坊，再西取走马驿或东进黄土岭、寨索一带实行“三光”，以挽回“皇军”的“体面”，巩固其察南占领区。

杨成武得知敌情后，立即用电话将这一情况向聂荣臻司令员作了报告。聂荣臻认为阿部规秀此时心急如焚，急于与八路军决战，挽回“面子”，忙中必然出错，正是对这个日军的有名将军进行打击的有利时机，故决心给这个“名战术家”一个下马威。聂荣臻指示杨成武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个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游击队一部在银坊北出击，诱其东进，待敌人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时，再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除以一、二、三、二十五团和炮兵营等参战外，并命令一二师特务团也从察南北上，归杨成武指挥，参加这次战斗。

部队立即进行了动员。“给阿部规秀中将一个下马威”，“再来一个歼灭战”的战斗口号，强烈地扣动着八路军指战员们的心弦。

11月5日，1000多敌人从龙虎村向白石口前进时，曾雍雅同志指挥的游击支队与敌人的先头部队打响了。游击支队忽而坚堵，忽而大踏步后退，以巧妙的战术紧紧缠住敌人，使敌人求战不能，追又追不上，气得暴跳如雷。敌人到达银坊后，却找不到八路军进行决战，只能以“三光”泄恨。当晚，银坊一带，熊熊大火，彻夜不熄。

阿部规秀越感脸上无光，越想挽回“面子”，就越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11月6日，又挥师东进。八路军则按聂荣臻的部署，放长线钓大鱼，丝毫不惊动他们，让他们“平安”地在黄土岭、司各庄一带宿营。这时，八路军一团和二十五团已在寨索、煤斗店一带集结，卡住了敌人的去路；三团、特务团从大安出动，占领了黄土岭及上庄子以南高山；二团则绕至黄土岭西北，尾随敌人后面前进，形成了对敌人的包围态势。而阿部规秀对此竟毫无察觉。

11月7日拂晓，敌人继续东进；中午12时进到上庄子，先头部队已到达寨索附近；下午3时，其尾巴才离开黄土岭。这时，八路军一团、二十五团兜头杀出；三团、特务团及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敌人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2公里长、仅几百米宽的山沟里。八路军数百挺轻、重机枪喷射出的子弹像暴风骤雨一样倾泻在敌人头上，炮兵部队也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沟底密集的敌人。只打得黄土岭上火光闪闪，硝烟蔽天。

敌人依仗着雄厚兵力，向八路军的寨索阵地冲击，企图跳出八路军的包围圈；遭到八路军坚决反击后，乃掉头向黄土岭突围，企图回窜涞源。八路军三团、特务团和二团把口袋口紧紧扎住，敌人无法逃窜，反被八路军逼得步步后撤。

战斗是艰苦的，当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之时，八路军部队因连日奋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伤员也逐渐增多。晋察冀军区的一、三军分区的群众自愿组织行动起来，协助八路军作战。民兵悉数出动，替我军放哨、警戒、侦察敌情；青壮年组成担架队，到火线抢运伤员；妇女们挑着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开水，送给前线作战部队。群众参战的热潮，大大鼓舞了八路军歼敌

的决心和信心。

部队在群众的热情支援鼓舞下，向敌人展开了全面的激烈攻击。经过反复冲杀，把敌人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这正是发挥八路军炮兵威力的大好时机，炮兵营长杨九秤立即命令炮群向沟里集中射击。只震得群山抖动，轰得沟底的敌人鬼哭狼嚎。

阿部规秀中将这朵日本的“名将之花”，就是在八路军神勇的迫击炮兵的排炮下“花落瓣碎”的。他的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质的指挥刀，也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敌人不得不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阿部规秀被我军击毙后，敌人恐慌异常。11月8日晨，飞来了5架日本飞机，向被围敌军投下几个指挥官，企图维持黄本岭的残局。八路军围攻至8日下午，消灭了900多敌人主力之后，正在围歼残敌之际，敌人以重兵从灵丘、涞源、唐县、完县、易县、满城分5路向黄土岭合击，均已进至距黄土岭30里左右的地方，企图围歼八路军，来个大规模的报复“扫荡”。聂荣臻司令员于是下令结束黄土岭战斗。围歼黄土岭之敌的部队在杨成武的率领下，主动撤离黄土岭，跃出外线，转入积极的反“扫荡”斗争，不断地从敌人侧背对他们予以打击。

到11月底，敌人的“扫荡”就被我军彻底地粉碎了。

敦刻尔克大撤退 英法联军巧突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1940 年 5 月，当德国希特勒突袭西欧时，英法军有 40 万军队被德军围困于插翅难飞的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然而，他们却在 9 天之内奇迹般地跳出了包围圈。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希特勒在柏林的指挥所中，看到装甲兵面对的地形俱是沼泽地，认为不便于坦克行动，遂下令装甲车停止进攻。又有人认为是德国 2 号人物戈林过于嫉妒陆军已取得的辉煌业绩，试图通过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在希特勒面前为空军抢功。还有人认为是希特勒对于英国本土有好感，不愿意同大英帝国发生大规律正面冲突，使他微妙的心理发生了倾斜。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一场奇怪的战役，但确实是一场成功的大撤退，它的具体组织者就是英国首相邱吉尔。

1939 年 9 月，欧洲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英、法帝国对希特勒采取妥协政策，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一步步分割、包围，进而吃掉波兰，就像在街头围观一场争斗：一个恶棍在追打一个孩子，而围观的人只是谴责，没有一个肯上前劝阻，而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自己最终也遭到了恶棍的追打。

希特勒吃掉了波兰并没有满足，他还要吃掉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1940 年春天，德军又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4 月，侵占丹麦和挪威；5 月 10 日，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下一个目标是谁？

当德军向比利时发起攻击时，英国远征军及法国的主力机动部队都赶去了。但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又一次受到了希特勒的愚弄。他们根本没有料到，德军对荷兰、比利时的突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减轻对西欧用兵的压力而采取的牵制攻势。真正的德军主力已经在德法边界整装待发了。

5 月 13 日，德军 A、B、C3 个集团军共 89 个师从正面、北面、南面攻入法国。

盟军的 135 个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攻防节奏，致使部队的战斗效力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更为严重的是，盟军错误地认为德军的主攻方向是北部，而忽视了正面地势复杂地区的防守。可是事实上，德军伦斯德将军的 A 集团 44 个师在正面的阿登纳山区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这才是德军的主攻方向。还在 5 月 10 日德军侵入卢森堡后，就集结了 5 个军的装甲部队排列在卢森堡边界线。装甲师在前面二层，摩托化步兵师在第三层。“坦克迷”古德里安将军出任前锋，克莱斯特将军全权指挥。50 个师的步兵随后快速前进。他们沿卢森堡和比利时东南领土前进了 100 多公里，竟然没有一架飞机来阻挡这股洪流。装甲师越过阿登纳山脉，不等步兵到达，就在飞机的协助下，打退了同盟国的空袭，强渡马斯河成功。

德军的装甲部队作战方案在此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前锋古德里安将军不顾克莱斯特的怀疑，抓住机会，充分展开他的 3 个师的装甲部队，急风暴雨地发起攻击并迅速地切断法国后方主要交通线。16 日，装甲部队抵达瓦兹河，然后全力以赴直扑英吉利海峡，切断驻比利时的盟军侧翼供给。20 日，到达阿布维尔附近的海边，然后沿海北上，进入运河附近的阵地，搜索河边登陆基地。

古德里安将军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率装甲部队绕过巴黎，把 40 万英法联军从南面来一个切割式的大包围，进而压到海边，全部歼灭。可这时，克莱

斯特将军传来了希特勒下达的死命令：停止进攻。古德里安将军以下官兵暴跳如雷，大惑不解。

这时，英国首相已不是愚钝的张伯伦，而是精力充沛，烟瘾极大的前海军大臣邱吉尔。英国远征军司令为戈特勋爵。5月15日，邱吉尔接到法国总统雷诺的电话，说通往巴黎的大门已经被打开，顿感出人意料，遂于次日飞往巴黎紧急磋商。会面的结果只是加剧了邱吉尔对40万远征军的忧虑。

德军的迅速推进此时已大见成效。法国第一、七、九集团军、英国远征军以及比利时等国的部队共40个师被德军四面包围，切断了他们与在索姆河以南主力的联系。

5月22日，德军占领加莱，克莱斯特的坦克离敦刻尔克只有16英里，英国远征军这时还在距敦刻尔克60公里外的里尔附近阻击。敦刻尔克此时已是被围地段中唯一一个掌握在盟军手中的港口，对面是依稀可见的英伦三岛。

40万远征军需要撤退。除了敦刻尔克外，还有其他路吗？

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指挥远征军在5月31日至22日对德国装甲部队曾进行了冲击，希望把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与步兵部队拦腰截断，实行会师，从而彻底粉碎德军的围歼，然后在运动中求生存。然而由于兵力太少，助攻部队也没有很好地配合，英法联军未能突破封锁线，遂只得放弃从陆路冲出重围的计划。

陆路不行，剩下的就只有海路了，即只有从敦刻尔克撤退了。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小城堡，它北临英吉利海峡，天边上下是一片蔚蓝色。法国人一直把它当作向海洋伸展的一个基地港口。当时，它已有4000年的历史，并成为整个法国仅次于马赛港口。港口有7个大型船渠，用以停泊大大小小的驶进港口的船只。

敦刻尔克虽是天然良港，但在1940年5月已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北面的比利时在德军入侵后已经投降，敦刻尔克事实上已成为一座孤岛；盟军在欧洲大陆的蔓延之势已被限制在这一方天地中间，从敦刻尔克的东面、南面、西面，德军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并不断地挤压着这数十万人；德国空军对敦刻尔克附近区域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港口设施也基本被炸得七零八落，码头、防波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是乱石、浊浪与污泥；敦刻尔克与直线相对的英国南部领土已经进入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盟军的任何行动都会成为德国大炮攻击的目标。

敦刻尔克港口外部有一条700多米宽的深水航道。沿海岸而行，连接着港口内的主航道。这条航道长而且开阔，很容易被德国空军追踪袭击，驶入这个航道的船只很难隐蔽前进，只能平行地沿港口海岸线进入港内。港内涨潮落潮之差有800米之多，坚硬的沙滩时隐时现，对进港船只的导航也发生了问题，稍有闪失，船只就会在惊涛骇浪中搁浅或沉没。港内可供救援盟军将士的船只只能停靠在只有1公里长的堤坝上，这条坝也并不是由水泥与坚固的钢架结构铸制而成，而是在基座上搭了些木板构成的建筑物。坝面上只能容8个人同时并排而行，狭窄而细长。暮色大海上，英法军人可以看到一座低矮的灯塔，矗立在坝面临海方向，给人一种天地玄黄之感，当然也不乏温暖与安慰。灯塔阴影之处，大小船只就系在一些木桩上，以靠岸登船。

德军对敦刻尔克的围困以及敦刻尔克港本身的原因，40万英法联军要靠此突围撤退到英国本土，确有一种插翅也难飞的感觉。然而，这又的确是当

时所剩下的唯一选择。

邱吉尔首相其实早就选择了从海路撤退的方案。还在5月20日凌晨，英内阁讨论戈特勋爵关于远征军的撤退计划，在不放弃陆路撤退的同时也同意从海上撤退，并制定了命名为“发电机”的撤退计划，作为预防措施，开始收集大小船只。5月20日之后，英国对所有港湾上的船只进行全面检查，准备实施“发电机”计划。

客观地说，正是因为邱吉尔已选择了从海路撤退的计划，所以戈特勋爵所率的英国远征军对陆路突围的努力是并不卖力的。当时，法国总统雷诺已撤换了法军总司令甘林，以魏刚代之。魏刚制定了南北呼应两面冲击的计划，即，英法军团把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与步兵部队拦腰截断，实行会师，从而彻底粉碎德军围歼，然后在运动中求生存。计划要求英法联军从北面对巴波姆·康布雷突击，杀出一条血路。向南方运动。当时，法军尚有100万部队，而南方的弗雷尔将军正率领法军第十八师、第二十师，还有从马其顿防线及法国中部。非洲北部集结的集团军群，正迅速地向法国中北部靠拢；救援北部集团军群；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一直是快速进攻，步兵难以跟上，因此中线非常薄弱，魏刚计划是有可能成功的。

但是，由于英国统帅部没有意识到德军坦克部队与地面部队的不协调，因此在制定计划时，虽然也希望远征军能从陆路杀出一条血路，但因为缺乏自信，所以更准备采纳的方案是从海上撤退。英国海军部为邱吉尔制定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的就是从海上大规模撤退计划。邱吉尔批准了这个计划，委派拉姆齐海军上将为渡海指挥官，下令所有半吨以上的船只都要登记在册，以便“调集大量小船准备开往法国沿海港口和港湾”。

正是因为英国统帅部已通过了从海上撤退的计划，所以戈特的远征军在执行。“魏刚计划”时并不十分卖力。英国远征军本是一支精锐之师。5月21日，戈特指挥远征军第五师、第五十步兵师率先从阿拉斯发起攻击，由65辆旧坦克组成的一个坦克旅向德军隆美尔的第七、八装甲师的400辆坦克群发起攻击，德国人感到了这次进攻的威胁。德国装甲兵被击溃，400多人成了俘虏，被迫将防线后移了40里。德军正是因此而唯恐英法军队将其坦克部队与步兵分割开吃掉，才下令坦克部队停止向前进军。

但是，戈特的这次突击，由于法军第一军团的两个增援师未能及时赶到，导致英军的两个坦克营被团团包围。戈特因而彻底放弃了从陆路突围的打算。当时，英国远征军有10个远征师、700辆坦克、2400门野炮。高射炮。反坦克炮，但弹药只够打1天，给养也只有4天。戈特不敢拿这40万英国人的生命去冒险，因而在尝试性地进攻一下后，不顾法国方面的严厉指责和愤怒抗议，下令部队星夜撤出战斗，冒着损失全部火炮和其他重型武器设备的危险，从海上实行总退却。

法国方面在得知英国方面对“魏刚计划”的背叛行为时，愤怒异常。魏刚在5月24日说：“正当我军北上，逐渐取得进展，要与盟军会合时，英军竟自动向港口退了25英里。”同一天，雷诺致电邱吉尔，指责英国粗暴地破坏了同盟国义务，直接破坏了“魏刚计划”。

英国内部也有争论。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就激烈地抨击戈特的作法，但邱吉尔却支持戈特。为使“发电机计划”迅速实施，邱吉尔还致电雷诺，“要求”立刻投入“魏刚计划”，以便转败为胜，并声称“时间就是生命”，他是希望用法国人的生命来掩护英国人的撤退。、但此时，戈特勋爵的远征

军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使撤退几乎不再可能，或者说是 40 万英军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撤出 15 哩宽 50 哩长的细长走廊地带，到达滨海港口敦刻尔克已无可能。德国坦克正从南面包抄而来，把他们围困在阿腊斯；B 集团军以大炮、步兵群从东面、东南面步步紧逼；德国空军频繁起飞施展威力配合这次歼击计划，准备完成重大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击；伦斯德将军的坦克前队在 5 月 24 日已经推进到离敦刻尔克只有 20 哩的地方。此时，敦刻尔克已岌岌可危，英国远征军将再从何处撤退呢？

德国坦克部队正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敦刻尔克进发，雄心勃勃地试图吃掉这已被包围的数十万英法军队，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可是，希特勒却在 24 日下达了一道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命令：指向敦刻尔克的克莱斯特和霍克的坦克停止前进，并禁止其越过运河一线。数千辆坦克坐以待命，眼看盟军成批地撤出阵地，退向敦刻尔克，指挥员急得嗷嗷直叫，不断询问停止进攻的原因，这种纵虎归山的“宽容”到底是什么意思？

5 月 25 日，撤退到敦刻尔克的戈特勋爵开始建立登陆场所，布鲁克将军、亚历山大将军、蒙哥马利将军都参与帮助英国远征军的撤退。5 月 26 日下午 6 时 57 分，海军中将拉姆齐开始实施“发电机计划”，第一艘救援船载回 1300 名基地部队士兵，大部分为后勤人员。

57 岁的拉姆齐将军和他的 16 人参谋班子在深嵌在多佛尔白岩峭壁之中的“发电机房”里运筹策划，组织这场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海上作业。沃克少将负责海峡及敦刻尔克水路，但甫特上校负责海滩及敦刻尔克城，克劳斯汤中校负责东堤登船事宜。但南特上校为了表明他是负责全部登船事宜的海军军官，用香烟盒剪成 S.N.O（海军高级军官）的字母贴在钢盔之上。他手下的 12 位皇家海军军官和 150 名水兵协助他安排 30 多万人的登轮工作。为了响应海军部的紧急号召，陆上机构和休假中的训练班及军官训练所的全体海军官兵从英国各地赶来，充实救援队伍。

拉姆齐舍弃了 Z 航线和调航线，而选择了没有布雷区，德军炮火不能攻击的 Y 航线，即从拉姆斯格特向正东航行，绕过奥斯但特北约 12 海里的克温特浮标，然后折向西南，在勃雷滩附近进入敦刻尔克航道，全长 87 海里，每次航行 5.5 小时。

英国的轻快艇队在敌人的 800 余架轰炸机、歼击机的夹击下，机敏而迅速地飞驶在河岸和大型船舰之间，把英国官兵送到停泊在大海上的大型船舰上。这些驱逐舰在 27 月第一次投入用以载人。他们克服机器老化的弱点，凭着奇迹般的航海技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作“之”字形航行，高速行驶在弹雨如注恶浪滔天的海面上。27 日这一天，英国方面共有 39 艘驱逐舰、36 艘扫雷舰、77 艘鱼船、40 艘纵帆船、25 艘快艇、45 艘运输船、8 艘医院船和一些汽船。拖船投入到拯救远征军将士生命的洪流中去，860 艘船次共救走了 7669 人。

5 月 28 日，登船士兵利用海滩相当成功。志愿人员把小船用绳索牵渡过海峡，把等候着的士兵渡送到停泊在海上的大船中。但南特上校和他手下的人将登船部队分成 50 人一组，每三人一排，每一组由一名军官和一名海员负责。士兵们井然有序，一行行向前移动，逐步进入海中，进而上船。

此时，英国有几万名渔夫、码头工人、汽车司机、快艇运动员以及其他一些有驾船经验的人都主动赶来增援海军，帮助组织英军大撤退。而在空中，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已同德军戈林元帅的施图卡机、亨克尔机、道

尼尔机展开了激战，以支援正在横渡的大队人马。

5月29日，横渡遇到了很大麻烦。德军猛烈的空袭不仅使留在岸上的远征军士兵遭到屠杀，而且使英方有3艘驱逐舰和21艘其他船只被击沉。东堤那里的潮汐落差又增加了部队登陆的困难。所幸的是在这一天增加了临时跳板，使登陆速度每小时达1000人。尽管河道上已有了数不清的障碍物，敦刻尔克水道却仍然畅通无阻。这一天共撤出47300人。

邱吉尔此时认定德军已必占法国，他致电雷诺，要求法军也撤出战斗。

5月30日，海风停息，海浪平静，低云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与熊熊燃烧的油库所腾起的黑色烟幕连成一片。浓密大雾从海上升起，四下弥散，吞没了英吉利海峡。海滩及海上通道。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完全隐没，一支几乎完全由平民志愿水手驾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船队开始出现在颠簸起伏的海峡上。这一天共渡海53800人。

5月31日，邱吉尔访法，企图说服雷诺撤退法军，以保存有生力量。亚历山大少将接替了戈特勋爵的远征军司令职务。2万名英国最精锐最骁勇的远征军士兵在拼死决战，以阻止德军向敦刻尔克的推进，掩护大部队的渡海。这一天共有68000名英法官兵在英国靠岸。但是，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的防御圈日见缩小，渡海撤退已更加困难。

6月1日，皇家空军装有灯塔的双座无畏式战斗机、赫德森轰炸机、双翼箭鱼式鱼雷轰炸机、安森侦察机纷纷从英国起飞，同德国空军的容克88机、亨克尔机在空中恶战。英国远征军威武不屈，配备有12门反坦克大炮、7门轻型高射炮的4000名英国士兵坚守在最后的阵地上阻击德军，当同伴从他们身旁撤出战斗时，4000名勇士始终面对着强大的德军，没有一个回顾一下自己的退路。午夜3时，亚历山大将军同阿布里亚尔将军从前线撤出最后一批英军，巴泰勒米将军率3000名视死如归的法国军人接管了远征军最后的阵地。当天，共有26000人渡河上岸。

6月2日至3日，英国舰只已不能在白天渡河，驱逐舰、客轮、小船多有损失，营救人员精疲力竭。利用夜间横渡，又有26000名法国人撤退到英国本土。3日晨，亚历山大将军借同坦南特上校在海滩上作最后巡视，在返航登船前，亚历山大将军冒着德寇机枪的扫射，愤怒地从敦刻尔克海滩上抓起一把石头，发誓一定要打回来。

6月4日，又有2万多名法国人在多佛登陆。后卫队4000余名勇士在射出他们最后一发仇恨的子弹，完成掩护任务后，被迫投降。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少人潸然泪下。

亚历山大将军宣布“发电机计划”结束。敦刻尔克连续9天的大撤退，共救出338000人，英法联军阵亡9200人。伤病4万人，同时把7万吨弹药，9万支步枪、2300门火炮、12万辆汽车全部留给了德国人。

敦刻尔克撤退是一场奇怪的战役，从前到后都充满了疑问，至今没有一个完满的解释。不过，英、法联军的大撤退实际上是大逃亡是可以肯定的，但这并不能说希特勒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因为40万大军有条不紊地撤回英国，就保存了大反攻所需要的有生力量。邱吉尔的决策是值得肯定的。在撤退计划制定后，如何实施，邱吉尔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表面上对“魏刚计划”的支持以及戈特勋爵陆路突围的试探，造成了德国人的错觉，为避免坦克部队与步兵部队被分割而延误了机械化部队的迅速推进，这一宝贵时间的赢得使远征军能从容退至敦刻尔克。英法联军在陆地上卓有成效地抵

抗，延缓了德军对敦刻尔克的包围。亚历山大将军指挥 4 个师的英军进行的里尔保卫战，甚至赢得了对手的祝贺。蒙哥马利将军连自己的头盔都被打飞了，但他却以出色的战略战术，牵制了北部的德军，保证了走廊的通畅。安德鲁斯和他的连队坚守阵地，当其侧翼受到攻击时，他率领 36 名士兵冲垮了 500 多名德军的攻势，其中仅 8 名士兵侥幸生存了下来，又随他潜回阵地，再度挥戈上阵，他为此获得了敦刻尔克战事中唯一的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此外，富有正义感的英国人在德军陆海空的大围剿中，冒着枪林弹雨支援英军渡海，渡海英军的秩序井然，指挥者从容指挥，都为 40 万大军在短短的 9 天时间里完成大撤退提供了条件。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根据地粉碎“囚笼政策”

1940年，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日本侵略者为了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在加紧对国民党诱降、逼降的同时，加紧了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和点（据点）线（交通线）分割的“囚笼”政策，打击投降派势力，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信心，八路军总部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华北敌后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从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在敌人后方碉堡密布的5000余里的战线上，在外无援助，装备很差。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发动115个团共40万兵力，向日寇作大规模的积极主动的战役进攻。这在当时全国十分沉闷的战局中，不但是艰苦卓绝的事，而且是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重大军事行动。

百团大战前的时局，正值国际国内风云险恶。日本侵略野心膨胀，急于在年内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结束战争”，以便放手南进。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加紧对蒋介石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8月即对重庆大肆轰炸，企图逼蒋投降；已经公开叛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此时也对蒋介石积极展开宣传攻势，胡说什么继续抗日就是“把国家奉送给共产党和第三国际”，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鼓吹“中日亲善”。“共同反共”；尚留在抗战阵营中的何应钦等亲日派，则“极力助蒋反共”，企图把蒋介石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而不得不降。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由于军事上的大崩溃，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也在积极酝酿对日妥协。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国民党统治区，致使中间势力的抗日信心发生动摇，进步势力的一部分人士对形势也产生了悲观情绪。

而此时，深入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却越战越强，仅一二九师就从一个半旅，发展为11个旅，严重地威胁着敌军的后方。因此，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囚笼政策”。按照刘伯承的解释，‘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为锁子，造成一个‘囚笼’，把抗日根据地军民分解开来，任其宰割”。

八路军总部为了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挽救投降危机，决定组织一次交通破击，并决定7月开始准备，8月13日前后青纱帐旺盛时期进行。7月初，左权副参谋长带着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初步设想，分别征求了一二九师和一二一师的意见。左权说：“破击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大路上，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八路军、决死队都要参加作战。”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八路军主要将领都认为：破击交通命脉，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因为只有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地痛击日军，才可能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阴谋，因而赞成彭德怀的方案。

7月22日，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三人签发预备命令，用电报发给晋察冀军区、一二一师、一二九师和所属各区，规定的战役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彻底破坏正大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该地区若干据点，较长时期截断该线交通，打击敌人“囚笼政策”，开展正大路沿线两侧工作，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二是打破日寇进犯西安

的企图、兴奋抗战的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击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看破坏正大路程度而定，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最中心的环节。

正太路即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全长249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重要封锁线之一。为了保住这条铁路线，日军派了重兵沿途守备，敌人自吹这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8月20日20时，八路军各部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共出动了115个团，约20余万人，另有30万民兵和群众参战，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了总破击战。故称“百团大战”。

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以19个团另5个游击支队和3个独立营等部队，组成左、中、右纵队，分别向正大铁路东段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八旅团各一部发动攻击。3个纵队的分工任务是：右纵队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大战果；中央纵队指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并垭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当日黄昏，部队冒雨穿过山间小路，隐蔽地运动到攻击出发阵地。由于战前准备充分，群众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日军始终未发觉八路军的行动。总攻击开始后，各路突击部队迅速向日军车站和据点展开攻击，整个正大铁路线顿时陷于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海之中。仅三天时间，就破坏了正太路东段的铁路，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陘等车站和据点，毙敌1000多人，缴枪1000余支，使敌人变得道路不通，电话不灵，到处挨打，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

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以38个团的兵力组成左、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路西段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各一部展开攻击。各破击部队乘夜暗绕过日军外围据点，对铁路线上守备之日军实施进攻。由于攻击部队行动隐蔽，战斗动作勇猛突然，使日军措手不及，经一昼夜激战，即攻克了芦家庄和尚足等车站，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破路和进一步扩大战果扫清了障碍。到8月25日，正太路西段，滁少数据点外，已基本为我军所控制。

由贺龙将军率领的一二师等，以22个团的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汾（阳）离（石）公路全线。重点在阳曲南北，任务是阻敌向正太路增援。8月21日夜，八路军三五八旅强袭忻（县）静（乐）公路的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其守敌，为群众破路创造了有力条件。

这样，到9月10日，八路军共歼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日军据点91座，破坏铁路300余公里，公路700多公里，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交通破击战”的任务。日军惊呼“共军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预料，损失重大，恢复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财”。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要求“继续破坏敌寇交通”，“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进一步扩大战果，并对八路军各部的具体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命令规定9月20日开始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迅速将主力由正太铁路北调，执行涞灵作战任务。涞源、灵丘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共约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涞源、灵丘地区的战略地位

极其重要，敌人同八路军争夺得相当激烈，它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边区内部。9月22日，杨成武部对涞源之敌发起攻击。在东团堡战斗中，由日军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顽强抵抗我军进攻，并不断施放毒气，八路军勇猛冲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终将敌人消灭。涞灵之战进行18天，攻克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据点，破坏公路150余公里，歼敌2600余人。

晋冀鲁豫军区于9月23日夜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对从正太路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榆（社）辽（县）公路沿线的敌伪军据点发起攻击。24日，辽县敌军出动西援，被狼牙山阻击部队击退。榆辽线各据点之敌，正被分别围歼中。同时，沿华、王景、小岭底、铺上等据点，被相继攻克。攻击榆社的部队，在克服高达30米的绝壁和层层铁刺等障碍之后；突入敌人碉堡群内。残敌退集榆社中学，在飞机掩护下负隅顽抗，并施放毒气。25日下午，突击部队利用坑道爆破发动强攻，突入榆社中学，经白刃格斗，全歼残敌。

一二师及冀中、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配合以上作战，在各地继续进行破击战。到9月31日，胜利结束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百团大战第一、二两个阶段的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华北敌人陷于大混乱局面，伪军、伪组织大力动摇，沦陷区人心振奋。敌人痛感：中共军之攻势，以破坏交通。通讯设备为目标，尤为严重的是在心理方面所受之损害。为了扭转局势，敌人在原有20万日军、15万伪军的基础上，又急忙拼凑、调遣兵力，集结了十几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坦克开路，于10月初开始向八路军的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的主力、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领导机关，摧毁抗日根据地，恢复其交通线。因此，以反击日军的报复“扫荡”为中心，即构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从10月6日起，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近万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榆社、辽县、武乡区进行连续“扫荡”，企图打击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为粉碎日军之企图，一二九师各部英勇地展齐反“扫荡”作战。10月14日，新编第十旅一部于和（顺）辽（县）公路之弓家沟设伏。歼灭日军一支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40余辆。26日，由武乡犯黄烟洞之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企图取道蟠龙以东之关家垴一带山地进犯；29日夜，第一二九师主力将该日军包围于关家垴高地，经过一场激战，共歼敌400余人。11月17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旅第九旅团各一部，共约7000余人，分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人所到之处，均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遂于12月上旬分途撤退。

10月13日，敌伪军万余人进攻晋察冀的平西、北岳等地区，抗日军民英勇作战，给敌伪以严重杀伤。此外，在晋西北，在大青山、冀中、冀南等地，敌我均有局部“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多起，抗日军民均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至1940年12月5日，敌人的报复“扫荡”被粉碎。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至此遂告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在这次长达三个半月的战役中，华北敌后战场的数十万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进攻，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在三个阶段的作战中，共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1845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车站、桥梁、

隧道 260 余处；缴获各种火炮 53 门、长短枪 56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认识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它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与作用，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谎言滥调。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粉碎了日寇紧缩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和“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百团大战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阻滞了敌人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因而，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了全中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

“百团大战”在军事谋略上，最主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时敌强我弱，但敌人因“囚笼政策”而导致兵力分散于交通沿线和各据点，我军则集中兵力分别攻击敌人，取得了局部的优势。此外，将攻击的重点放在敌后破袭交通线，摧毁据点，这就造成敌人以“点、线、锁”构成的“囚笼政策”难以运转，对我军的攻击防不胜防。“囚笼政策”被完全粉碎了。

德寇闪电战直取莫斯科 苏军大协同击溃侵略军

1939年，人类历史进入了灾难性的一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了称霸世界，挑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仅27天就占领了波兰。接着，它又相继征服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克里特岛，并迫使英国撤出西欧大陆。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西欧的广大领土已处在德寇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之下。希特勒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为了最终称霸欧洲和世界，他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把侵略的魔爪转向了东方即社会主义的苏联。“闪电战”是希特勒惯用的手法，他提出要“像漆黑的夜里突然闪电一样地去打击敌人”的理论，并把闪电战术首先应用于波兰，使波兰很快亡国。1941年，希特勒再次用闪电战进攻苏联，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1941年上半年，纳粹德国利用本国及其所占领的欧洲等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建立起了潜力巨大的军事机器，其武装力量的总兵力已高达730万人以上。此时的德国军队，不仅具备了两年的现代战争的经验，而且军事部署亦呈扩张性的全面展开。

在当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评论家，都没有想到希特勒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向苏联这样的欧洲大国发动进攻。但是，法西斯这种战争狂人的思维就是与正常的人不同，正当人们密切注视着德国的一举一动之际，德国军方已经完成了对苏战争的“巴巴罗萨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对苏战争初期，一举歼灭驻守在苏联西部地区的苏军主力，随后向苏联腹地迅速推进，进抵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妄图在战争初期便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德军在苏联边境部署了190个师，550万兵力，4300辆坦克，47200门火炮。迫击炮，4980架作战飞机。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希特勒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190个师的兵力，配备大量坦克、装甲车和飞机，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长达3000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6月22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苏军未作任何准备，在德军强劲武器及兵力的突然袭击下，遭受到重大损失。当天就有66个飞机场和1200架飞机被德机炸毁；苏军的通讯系统被破坏，以致使各部队之间失掉联系，无法进行正常指挥，部队陷于混乱状态。德军就在这天入侵苏联境内25—50公里。德国法西斯军队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兵分三路向苏联腹地推进：“北方”配置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由德军元帅冯·李教指挥，进攻目标是列宁格勒；“南方”配置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由德军元帅龙德施泰特指挥，进攻目标是基辅；“中央”配置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由德军元帅冯·包克指挥，进攻目标是苏联首都莫斯科。

为了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6月23日，苏联统帅部大本营成立。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给前方各州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下达指示，号召苏联人民以全部人力和物为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向苏联人民阐述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规定了苏联在战争期间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号召人民全面支援作战军队……

尽管苏联迅速掀起了反抗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但在战争初期，由于防御

措施薄弱，仍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德军在不到 3 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在北方推进了 500 公里，南方推进了 350 公里，中央推进了 600 公里。

莫斯科是苏维埃政权的首都和心脏，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否占领莫斯科，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希特勒把夺取莫斯科当作是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制定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进攻计划，集中近 75 个师的兵力，共计 180 万兵员，另有坦克 1700 辆。火炮和迫击炮 1.4 万余门、飞机 1390 架，向莫斯科猛扑而来。

当时苏联的处境异常困难，许多企业不得不向东部地区疏散，这就使得苏联的军事经济还不能完全满足作战部队对武器和技术兵器的需要，军队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至 9 月底，苏联已先后失去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等重要城市，列宁格勒也被封锁。10 月上旬，德军在占领卡卢加。加里宁和克林等城镇后，迅速向莫斯科进逼。

对莫斯科保卫战，苏军最高统帅部作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组建了由朱可夫大将负责的西部方面军，由布琼尼元帅负责的预备队方面军和由叶廖缅科上将负责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共有 95 个师、125 万人，坦克 990 辆，火炮和迫击炮 7600 门、飞机 677 架。相比之下，德军对苏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员多 40%，火炮和迫击炮多 80%，坦克多 70%，作战飞机多一倍。德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也占优势，因为当时苏军的坦克和飞机有一半以上是旧式的。莫斯科保卫战就在苏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

在这严重的关头，斯大林打电话给西部方面军司令朱可夫，以严肃、深重的口气问道：“您对我们保卫莫斯科有把握吗？我是在沉重地问您，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诚实地回答我。”朱可夫肯定地回答说：“莫斯科，没问题，能保住！”

朱可夫的保证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人民的支持。首都人民豪迈地说，我们要在红场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的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为了保卫莫斯科，10 多万莫斯科公民踊跃加入苏军与敌作战。至 1941 年 12 月，这批公民共编成 16 个民兵师，同时还有 50 多万人参与修筑莫斯科市周围的防御工事。他们在祖国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畏流血牺牲，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会战中，积极配合苏军对侵略者予以严惩。

9 月 30 日，希特勒下令德军对莫斯科发动第一次总攻击。虽然苏军在首都的外围防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具有明显军事优势的德军还是一举突破了苏军的一线防御。被迫后撤的苏军又立即在莫斯科以西 80 公里地区组织了新的防线。

希特勒被这一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德军必须在 10 月 12 日前攻下莫斯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已指示德国各报纸要在 10 月 12 日这天留下报纸头版地方，以便“刊登特别重要消息”。但是，由于在人民支持下的苏军顽强抵抗，到 10 月 12 日，莫斯科仍然在苏联人民手中。希特勒吹了大牛！

不过，莫斯科的形势未见好转，德寇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莫斯科；苏联政府的部分机构和外交使节撤退到距莫斯科 800 公里的古比雪夫。然而，联共（布）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撤退，斯大林没有撤退，他在亲自指挥莫斯科保卫战。10 月 19 日，国防委员会宣布了莫斯科戒严令，号召首都人民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莫斯科人民积极参军参战，仅修筑防御工事就动员了 45 万居民，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全国人民都支援莫斯科保卫战，

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到莫斯科。莫斯科军民奋力拼杀，德军的攻势全线受阻。而希特勒却还在吹牛。说他要 在 11 月 7 日在莫斯科红场检阅部队。

11 月 6 日，战斗在莫斯科郊区激烈地进行。这一天，莫斯科人民照例开会庆祝十月革命 24 周年，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的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总结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成果，指出了今后粉碎敌人的任务。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第二天即 11 月 7 日，在几十公里以外，苏德双方军队正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就在德军密集的火力攻势下，斯大林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数十万红军和民兵列队通过红场接受斯大林的检阅，然后直接奔赴前线，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斯大林在阅兵式上发表了演说，他坚定地指出，德国法西斯军队必然灭亡，他号召苏联军民奔赴前线英勇杀敌。这次阅兵是一大壮举，大大鼓舞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信心。

苏军战士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在各条通往莫斯科的要冲上与敌人搏斗。潘菲洛夫将军近卫师的 28 名战士，在政治指导员克契科夫的领导下，坚守重要防线，奋战 4 个多小时，连续击退了敌人 50 辆重型坦克的多次进攻。这些战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几乎全部牺牲。身负重伤的克契科夫，带了一束手榴弹冲向德军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近卫军战士的英勇行为，为增援部队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与德寇作战的不仅有主力苏军，还有莫斯科地区的游击队。莫斯科一位 10 年级的女中学生卓娅，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游击战。她在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德国兵抓住。在敌人骇人听闻的毒刑拷打下，姑娘毫不屈服。当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时，她仍然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号召被敌人赶到刑场来的农民群众起来消灭法西斯，并高呼：“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一定要来的！”英勇的姑娘为保卫莫斯科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无数的莫斯科军民像近卫军战士和卓娅那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构筑了一条坚不可摧的防线，使德军的第一次总攻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德军在第一次攻击受挫后，不甘心失败，重新调整部署，增加部队，从 11 月 15 日开始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仅在苏联西部方面军的正面就集中了 51 个师。德军把主力编为两个突击集团，企图在苏军西部方面军的两翼作深远的迂回突击，以求合围苏军主力于莫斯科以西地区。苏军对德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提出了保卫首都莫斯科的口号：“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

11 月 27 日，德军第 258 师的少数部队已进至距莫斯科仅 24 公里的地方。12 月 2 日，德军的一个侦察营一度突入莫斯科近郊的希姆基，并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尖顶。莫斯科已处在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然而德军已用尽了最后的力量，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把他的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也投了进去。包克在打给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电话中说，德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苏军一面顶住德军的猖狂进攻，一面发动反冲锋，大量地杀伤德军；工人们从工厂涌出来，用他们的生产工具和德军拼搏。尽管包克已经拼了老命，但德军依然被苏联军民一次次打了回去。德军在连续不断的两个多月的进攻作战中，兵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战场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苏军的方面转变。

莫斯科的严冬到了，阴雨连绵，风雪交加，道路泥泞。恶劣的天气大大加剧了德军的困境。靠闪电战起家的希特勒，原指望在一个半月内打败苏联，根本没有越冬的准备。由于严冬，德军的交通线完全埋在冰雪之中，汽车和火车，不能行驶；部队的补给断绝；坦克和装甲车要加温几个钟头以后才能发动，因为润滑油都冻结了；飞机不能起飞，因为瞄准器的镜头被冻坏了，不能使用；德军缺乏过冬棉衣，只得把妇女的花衣服也穿在身上御寒，可仍然无法抵御严寒。

而此时，尽管天寒地冻，积雪很深，士气高昂的苏军却从12月5日开始了反攻。希特勒不得不下令德军全线转入防御。苏军进行不停顿的追击，德军丢盔弃甲，狼狈溃逃。到1942年4月20日，德军被赶离莫斯科150—300公里。气急败坏的希特勒将包括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包克、烜赫一时的坦克司令霍普纳、号称“现代装甲之父”的古德里安以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内的德军高级将领都撤了职，但仍无法挽回可耻的失败。

在莫斯科会战中，横冲直撞的德国法西斯军队遭到了第一次惨败，苏军共击溃德军70个师，消灭德军50万人，其中击毙30余万人，击毁和缴获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万辆、飞机1392架及其他许多技术装备。从而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形势，夺得了战略主动权。

苏联人民在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莫斯科的任务的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及其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莫斯科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希特勒从他力量的顶峰开始走向下坡路，战略主动权逐渐转到苏军手中。苏军的胜利，关键在于人民的支持和苏军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役期间，根据战役进展情况和德军的部署而及时地、不断地调整苏军的部署。当察明德军的战略意图和主要突击方向后，立即把战斗力较强的西部方面军作为第一梯队，占领第一防御地带，在德军进攻莫斯科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预先构筑了大量和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构成德军前进的巨大障碍，针对德军以坦克装甲集团实施深远突破的战术，采取纵深多梯次配置，运用各种方法阻止和消灭德军坦克，苏军新组建的战略预备队，加强了西部战线的防御，给德军以意想不到的痛击。苏军还非常注意各军兵种的密切协同作战，炮兵、坦克兵、滑雪部队、骑兵、空降兵、游击队，使敌人防不胜防。迅速组织的后勤保障和军工生产保证了前线部队的需要。正因为有这些谋略，莫斯科会战才取得了大胜。

尼米兹破译日军电文 中途岛美军大败山本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不到两小时内用354架飞机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的大型海军基地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但是，就在日本偷袭时，碰巧美海军“企业”号、“列克星顿”号和“萨拉托加”号3艘大型航空母舰和11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出港执行任务去了；在港内，也有5艘巡洋舰和29艘驱逐舰没有遭到破坏，有着大型修船设备的造船厂和许多盛满了油的油罐也完好无损。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及时恢复了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日本决心继续打击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于是发动了中途岛战役。可是这次战役的结果并非是日本人所希望的，美军尼米兹上将使日本海军遭受惨重损失，从此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进攻能力。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于12月8日对日宣战，随即英国也对日宣战，日本的盟邦——德国和意大利也对美国宣战。这一新的形势，使美国海军从作战指挥与军事行政方面作了一些变动。12月中旬，精明干练的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受罗斯福总统和海军部长斯塔克亲自挑选为新的太平洋舰队司令。

尼米兹将军是得克萨斯州人，银灰色的头发，碧蓝的眼睛，毕业于海军学校。他谦虚谨慎，知人善任，多谋善断。事实证明，对他的起用是人尽其才的。他上任之初，就提出了4个目标：保护美国、夏威夷、中途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路安全；引诱日本人离开东印度群岛；制止日本人在太平洋中的进一步扩张；恢复太平洋舰队已经动摇的士气。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些。1942年4月，尼米兹又兼任太平洋战区司令。从此，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统辖的西南太平洋和比较平静的东南太平洋以外，尼米兹将军掌握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统兵作战大权。

当美、英相继对日宣战后，日本即派轰炸机空袭香港和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海、空军基地，派舰队入侵暹罗湾；击沉了英国派往东方援助美军的两艘大型舰船；并派军队在东南亚和南洋群岛登陆，先后占领了香港、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新加坡、泰国、缅甸等战略要地，从而占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财富。日本一心要成为一个大帝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这就必然与尼米兹统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生成争。

从珍珠港事件到1942年5月，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美、英和日本双方在太平洋上进行了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战斗，美方损失了“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也受到破坏。英国损失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两艘大型战列舰和其他一些船只。5月初，在新几内亚南面的一次美日海战中，日本两艘大型航空母舰“翔鹤”号、“瑞鹤”号和一艘小型航空母舰“祥凤”号均遭到重创。从战略上讲，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的第一次胜利，也是日本人自发动征服战争以来在太平洋上遭到的第一次挫败。

在美、日海战之前的4月18日，美军还派了一小批B25型轰炸机袭击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等城市。这次空袭对日本在物质损失方面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日本人的自尊心的挫伤却是无可估量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大将深怕有着巨大生产能力的美国、一旦完全纳入战争轨道，日本欲独霸太平洋的野心将难以实现。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之前，就把已经遭到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摧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山本五十六选中了中途岛作为进攻的目标。

中途岛位于珍珠港西北 1136 英里处，由沙岛和东岛组成。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就已把中途岛扩建为保卫珍珠港的海军巡逻机前进基地。中途岛是珍珠港的前哨和屏障，一旦受到日本攻击，美国势必力争。日本就拟用这一谋略来引诱美国舰队出战，进而将其歼灭，以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

日本从拟定的战略目的出发，集中了包括 8 艘航空母舰、600 多架飞机、11 艘战列舰、22 艘巡洋舰、65 艘驱逐舰和 21 艘潜艇在内共约 200 艘军舰的几乎全部日本海军的力量投入战斗。而此时的美国海军，只能凑集 76 艘舰只，其中还有三分之一属于北太平洋舰队，始终未能投入战斗。

5 月 30 日，日本海军已在柱岛内海起锚集结待命。山本五十六的部署是，以 6 月 7 日为进攻中途岛的决定性日子。届时日本舰队的一部将从海上向阿留申群岛发动佯攻，以牵制美军舰队；由南云指挥的主力舰队则从西北进攻中途岛；由近藤指挥的另一舰队在炮火掩护下，从西面向中途岛实施登陆；由山本亲自率火力强大的战列舰队泊在后面 300 英里的海面上，一俟美国舰队接近，即开入战区将其歼灭。为确保胜利，日军还在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布下两道潜艇警戒线，并派出一些潜艇袭击从澳大利亚的悉尼到马达加斯加一带的船舶和港口设施，以进一步遮人耳目。

可是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加紧部署进攻中途岛的过程中，美国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从而弄清了日军的部署，查明了日军的舰队、部队的数量和具体单位以及各舰长姓名，甚至对舰只的集结地域和航线也了如指掌。于是，尼米兹根据美军与日军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和所获悉的情报，将计就计，给日军设置陷阱，将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已经修复的“约克敦”号埋伏在中途岛东北 200 英里的海面上。同时，派遣两个 B17 型远程轰炸机中队，4 个改装后可作鱼雷攻击的 B25 型轰炸机中队和一批战斗机、俯冲轰炸机以及高射炮到中途岛，加固了防御工事，还在环礁湖内部部署 PT 鱼雷快艇。与此同时，又调集若干中队的 B17 型轰炸机进驻珍珠港，准备随时增援中途岛作战。

6 月 2 日拂晓，分成 8 支特遣舰队的日本庞大舰队在远离锚地的太平洋上进入指定位置。此时，日本方面截获了一份从美国远程潜艇上发往中途岛的紧急电报，但无法破译其电文。日本人根据情况判断，认为美军对中途岛可能遭受进攻已有所戒备，而且会派出舰队来作战，而这正是日本人所求之不得的。山本五十六于是下令提前 3 天发动中途岛战役。在 6 月 3 日清晨，庞大的日本舰队在雨幕掩护下，开始进入攻击位置，准备第二天凌晨发动进攻。

此时，清楚地掌握着日军情况的尼米兹上将利用日本急于取胜的心理和判断上的错误，将舰只分为两支独立的舰队：一支由斯普鲁恩斯指挥的第 16 特遣舰队，拥有“企业”号、“大黄蜂”号两艘航空母舰和 5 艘重型巡洋舰、1 艘轻型巡洋舰、9 艘驱逐舰；一支由弗莱彻指挥的第 17 特遣舰队，拥有“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和两艘重型巡洋舰、6 艘驱逐舰。他们分别于 5 月 28 日、30 日离开珍珠港，6 月 3 日同舰队油船会合加油后，埋伏在中途岛东北 200 英里的海面上，准备在那里伏击南云指挥的日本航空母舰舰队。

6 月 4 日黎明，中途岛之战的序幕拉开了。南云舰队首先从 4 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上同时起飞了 108 架飞机，向中途岛发起了第一次攻击。由于美军早有准备，在日本轰炸机到达

中途岛上空之前，所有的美国飞机都已飞入高空，日军所能找到的轰炸目标，只是几条空飞机跑道和空飞机库，他们想要摧毁岛上美国轰炸机的目的未能得逞。

就在日军第一批突击飞机起飞去轰炸中途岛时，美军曾派出 4 批共 44 架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去攻击南云的舰队。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美国飞机先后被日军击落 19 架，攻击没有成功。面对美国飞机的威胁和第一次轰炸中途岛未能成功，南云决心不借一切代价也要把中途岛上的美军轰炸机全部消灭干净。他于是命令第二批突击飞机装上高爆炸弹，把原来准备用于攻击美国舰队的鱼雷从飞机上卸下来，并从飞行甲板上急速降到下面的装备甲板装弹。这时，一架日本的远程侦察机发现在离日本舰队 200 英里的地方有 10 艘战舰正向东南前进。这一情况使南云大吃一惊，立即下令停止装弹，重新装上鱼雷，以对付美国舰队。一会儿，侦察机又报告说：“敌舰队是 5 艘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南云认为这样规模伪舰队对他构不成威胁，再次下令换装高爆炸弹准备攻击中途岛目标。于是，装备甲板再一次陷入一片混乱。过了 21 分钟，又接到侦察机关于美军舰队“后卫舰似乎是一艘航空母舰”的报告。南云只得暂时丢开中途岛不管了，下令准备对这些舰只发起攻击。但是，由于直接护航的飞机和第一批突击飞机需要回到舰上加油；第二批突击飞机又未能也难以起飞。南云只得决定舰队北撤，等做好一切准备后再向敌舰发起进攻。

正当日本南云舰队采取一系列变来变去的紧急行动时，美军第 16 特遣舰队不断获得跟踪监视日军活动的准确情报，一直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直到从中途岛返回的第一批日本飞机的最后一架在舰上降落后，斯普鲁恩斯立即捕捉到战机，派遣 131 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分批连续向日本舰队猛攻。第一批 15 架劫掠者鱼雷轰炸机在向日舰攻击时，被日军 50 架零式战斗机击落；第二批 26 架鱼雷轰炸机分别从左右两侧攻击。日本舰队，仍未能奏效，被击落 20 架，剩下 6 架返回美国舰队。日本飞机也都飞回舰上加油。就在此时，37 架俯冲轰炸机直朝着日本“赤城”号、“加贺”号呼啸而下，另外 17 架俯冲轰炸机对准“苍龙”号直冲下来，猛烈投弹，击中日本舰身和舰上飞机，立即发出一片爆炸声和烟雾。日本没有一架飞机来得及起飞迎击，高射炮在最后一分钟才仓促开火，炮弹在离美机很远处零星开花。在几分钟内，日本 3 艘大型航空母舰连同舰上飞机一起被比自己力量小得多的美军所炸毁。

直到上午 10 时半到 11 时，山本五十六才收到南云舰队惨败的不幸消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自己率领手下的全部舰艇向中途岛继续前进，并命令所有特遣舰队都与他的战列舰会合，准备对美军实施报复。

日本“飞龙”号航空母舰又回身投入战斗。正午，由 18 架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第一支突击队在 6 架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向美“约克敦”号发动了攻击。经与美军 12 架在高空护航的野猫式战斗机激战，日机损失了 16 架，美机被击落 6 架。“约克敦”号也中了 3 颗炸弹，在太平洋上旋转打圈。在驱逐舰的护卫下，船员们奋不顾身地抢修，使航速从 5 节恢复到 15 节。这时，日军 10 架鱼雷轰炸机和 6 架零式战斗机又第二次向“约克敦”号发起攻击。鱼雷击中了右舷和中部，破坏了舰上的全部动力和照明、通信设备，使该舰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在这之前不久，美国侦察机也发现了日本的“飞龙”号和其他舰只。这

一消息传到“企业”号航空母舰后，斯普鲁恩斯立即集结了所有能调集的飞机一齐向“飞龙”号出击；同时，从中途岛和夏威夷飞来的飞机也全部加入战斗，终把“飞龙”号炸毁。这样，日本的4艘大型航空母舰就都先后遭到了覆灭的命运。

山本五十六不甘心失败，他决心挺而走险，再作最后一次尝试，企图以其所长吸引美军同他进行夜战。但是，斯普鲁恩斯识破了他的诡计，率领其小小的舰队趁黑夜向东驶去，埋伏在战场外围，等待天明。

而此时，被山本派往炮击中途岛的舰队因害怕白天遇上中途岛海岸基地的轰炸机的攻击，不能及时到达，有两艘重型巡洋舰在黑暗中相撞，受到严重损伤。

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山本五十六于6月5日凌晨2时55分下令“取消中途岛的占领行动”，中途岛战役遂以美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一战役美军损失了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作战飞机，而日军却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1艘重型巡洋舰和332架作战飞机。中途岛之战使日本海军遭受惨重损失，从而遏制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节节胜利，使日本从此在太平洋上失去了进攻力量。

在中途岛之战中，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插曲。当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码后，正在将计就计地部署自己的行动时，不知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芝加哥的一家报纸竟把这一机密作为独家新闻捅了出去。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可能马上引起日本人的警觉，使美军情报机关重新陷入扑朔迷离的苦境，而尼米兹将军所准备的一切也将完全废弃，使本已处于劣势的美军会更加陷入困境。这起严重泄露国家战时情报的事情立即汇报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心中为之一惊，然而他不露声色，对此事采取了置若罔闻之态，既没有要求对这家报纸进行什么起诉，也没有责成保安机构追查泄密者，这件事便无声无息了。日本人虽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然而却根据罗斯福及美国情报机关的平静表现，认定那不过是新闻记者的哗众取宠，有意扰乱日军的心理而已。因此，日本人也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一样，一直到进攻开始时都没有想到应当更换密码。从而导致了中途岛的惨败。

美国人巧破乱数式密码 罗斯福令歼山本五十六

1943年4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为督促日军对瓜岛进行全面轰炸的作战计划的实施，来到了太平洋前线司令部的所在地腊包尔。在轰炸计划接近尾声的4月13日，山本五十六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在4月18日用一天的时间到靠近瓜岛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个基地去视察，以鼓舞那里的官兵的作战士气。虽然这一计划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山本执意要去。13日傍晚，太平洋前线司令部向山本将要去视察的各基地。各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了电报通知。其内容为：GF长官将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06：00乘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到达巴拉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抵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本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为了使山本的前线视察行动绝对保密，太平洋前线司令部使用的电报密码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制定的，从4月1日才启用的新密码。这一密码是高深莫测、令人无法捉摸的5位数字的乱数式密码。日本人根自信，认为破译这种密码电报，从理论上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密码完全有可能被美国人破译，而且恰恰是这份密码电报把山本五十六逼进了坟墓。

美国人可谓恨透了山本五十六，因为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的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事件，就是由山本所策划和指挥的。

山本五十六是在1939年11月31日就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德国法西斯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面对突变的国际局势，山本感到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上交锋的日期已经迫近。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难以自拔。若要与美国开战，既要考虑南方的困难，又必须防备北方苏联的进攻。从此以后，山本便在他的旗舰“长门”号上冥思苦想，企图构思一个能够出奇制胜，一举击败美国的作战方案。1940年3月，当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看到一队队的日本飞机在白天出色地进行鱼雷攻击训练时，萌发了用飞机进攻珍珠港的构想，他认为，在开战之前孤注一掷，突袭珍珠港，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可以扫清日本人南下作战的障碍。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对珍珠港的偷袭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人以29架飞机，55名官兵的代价，使美国损失5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油船；重创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总计炸沉炸伤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击毁击伤450架美国飞机，4500余名美军官兵伤亡。

战争这个使人心发狂的怪物造成了一种凶残的复仇情绪，而发布偷袭珍珠港第一号作战命令的山本五十六显然成了众矢之的，美国人确实恨透了山本五十六。哈尔西海军上将认为，山本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首相的第三巨头，“应该把那个家伙套上锁链，牵着他在华盛顿的宾西法尼亚路游街”，由人们在后面踢着他走。“攀登新高峰”这一日本军方隐语，在美军将领中化为“干掉山本”的口号。

而现在，山本决定到瓜岛前线去视察，他本人并不明白，这一决定实际上已为渴望复仇的美国人提供了良机。

早在珊瑚海海战之前，美国人就从沉没在达尔文港外50米深的日本潜艇

中打捞到了密码本。美国海军情报机关里那一批聪明绝顶的“魔术大师”们根据这一线索，曾经破译了许多日军密电，从而为中途岛海战的获胜提供了第一个条件。1943年初，日军在瓜岛陷入绝境，水面运输困难重重，被迫用潜艇对瓜岛日军进行物质补给。不料，“伊—3”号与“伊—1”号潜艇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相继沉没。美国海军在日本潜艇沉没的海岸一带连续进行了几天的潜水搜索，终于成功地从“伊—1”号潜艇中找到了价值极高的机密文件。这些发现显然有助于美军的“魔术大师”们进行更加神奇的表演，而日本人对这些暗中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不久之后，美国海军情报密码小组便破译了大量的日军密码。与此同时，他们努力从大量截获的密电中对山本五十六的行动进行追踪。当4月13日傍晚截获了那份有关山本视察前线部队的绝密电文后，美军的密码专家和电子专家们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从“28743”、“25354”、“19839”、“27291”……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群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山本拟定的视察计划被美军了如指掌。

4月17日上午11时，有关山本五十六行动计划的一份电报被送到华盛顿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的办公桌上。很快，这份电文又在当天罗斯福总统举行的例行午餐会上传阅。在空中谋杀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计划立即开始酝酿。

不过，究竟利不利用日本人自己提供的这次谋杀山本五十六的良机，美国海军首脑们对此是犹豫不决的。美国的历史并不太长，但他们却对古代战场上的骑士风度一往情深。过去的战争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得暗杀对方的指挥官，皇帝和将军们只能战死沙场。受这一观念影响的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多次放弃了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机会，并且甚至拒绝对这些行动给予协助。他们崇尚的是堂堂正正地与对手较量，不愿意放暗箭。

可是，美国人的对手却不像美国人这样“堂堂正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阴谋杀害盟国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一艘德国潜艇曾企图用鱼雷袭击罗斯福总统乘坐的船只，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准备参加一个战时会议；在布尔吉战役中，德国人曾计划暗杀艾森豪威尔将军；当德国人得知邱吉尔首相从地中海休假后飞回伦敦的消息后，曾对“他”的座机进行攻击，结果弄错了目标，把著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乘坐的飞机给打了下来。德国人甚至在他们的间谍手册中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能导致对敌人不利，暗杀作战领袖就是一种合法而正当的措施。

虽然一般的美国人反对采用暗杀对方指挥官这一手段，但美国海军中的某些人又认为对山本五十六应该另当别论。他们认为，山本五十六自太平洋开战以来，已经丧失了法律保护权，因为他违反国际规定，置世界舆论于不顾，无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接到日方的最后通牒之前竟不宣而战，开始了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这是对美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人民的公然挑战。他们还认为，此次山本视察正处于战区之内，在这里，一员大将和一名普通荷枪实弹的水兵一样，都是合法的射击目标。最后，海军将领们认为应当由华盛顿来对此事进行裁决。

当这份被破译的密电提交到当天的总统例行午餐会上的时候，出席者对这份详细的巡视日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人还怀疑这份电文如此详细，很像是一个诱饵，是不是日本人又在耍诡计，企图把美国飞机一网打尽？

但是，争论最终使人们回想起了被偷袭的珍珠港的惨状，使人们在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山本五十六这个罪魁祸首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珍珠港之仇一定要报！罗斯福总统断然决定：击落山本座机，干掉山本。华盛顿的首脑们在决定了山本的命运之后，为这一行动计划起了一个恰当的代号：“复仇”。

罗斯福总统的决定受到了美国海军的欢迎。对美国海军来说，当山本成了自己网中之鱼时，如果让其漏掉，将是让人万分遗憾的事；现在罗斯福下令消灭山本，确实令人高兴。不过，要将罗斯福总统的决定最终付诸实现，仍然要动许多脑筋。因为事关重大，海军部长诺克斯亲自动手拟定行动方案。他找来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将军和 P—38“闪电”式战斗机专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使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 P—38 式飞机即完全可以捕捉到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遵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命令，诺克斯立即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接到华盛顿的指令以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又将任务由努美阿的哈尔西传达给所罗门战区航空部队指挥官米切尔海军少将。命令说：“山本司令将于 4 月 18 日清晨由新不列颠北端的腊包尔去南方最前线航空基地布干维尔岛南端的卡希利（月本称布因），但不是直达卡希利，而是在巴拉尔岛机场降落，然后乘潜艇到达对岸的卡希利。预定到达巴拉尔岛的时间是上午 9 时 45 分（美国时间）。山本司令带领参谋人员，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有 6 架‘零’式战斗机护航……。P—38 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战斗结束后立即销毁！”

4 月 17 日下午，米切尔海军少将在瓜岛亨德森机场他的司令部内召集部属会议。会议对山本的行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破译的电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研究。16 时，被选中负责执行截机任务的第 339 中队中队长米歇尔少校被秘密召到司令部，米切尔将军对他说：我们要击毙山本，想让你们去拦截。但是，他的起飞地点离这里有 1000 多公里，只有卓越的远程飞行才能拦截。”米歇尔回答说：“我们随时做好准备。”随后的会议在拦截方式上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击落山本座机，有人则主张攻击山本乘坐的猎潜艇。米切尔最后叫住大家，请他们允许由米歇尔来决定。他向米歇尔少校说：“是在空中吗？”米歇尔干脆利落地回答说：“是，长官！”计划便这样决定下来。

经过一晚上的精心准备，4 月 18 日清晨 7 时 25 分，由米歇尔少校率领的 16 架“闪电”式战斗机飞过瓜岛西端的埃斯帕恩斯角，飞出锡拉克海峡，进入了一望无涯的海空。飞机贴近海面，低空飞行，张开了埋葬山本五十六的大网。而此时，日本人却毫无觉察。

4 月 18 日清晨，山本突然换下了他一直穿着的白色军服，穿上了一套草绿色军服。小泽治三郎中将为山本及随行的 8 名工作人员以及参谋长字垣送行。他们驱车奔向腊包尔机场，在那里，705 航空队的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已经等待多时。

山本等人分乘两架飞机：山本司令与高田军医长等 4 人乘 1 号机，机长兼主驾驶员是飞行兵曹长小谷立，字垣参谋长与北村会计长等 5 人乘 2 号机，机长是一等飞行员谷本，主驾驶员是二等飞行员林浩。两架飞机的驾驶员都是经历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飞行员。按照预定时间，两架飞机于日本时间 6 时整准时起飞，离开了腊包尔。紧接着，204 航空队所属的 6 架“零”式战斗机，也起飞升空，以二、三编队的队形编成两队，分别在山本座机的左右

两侧护卫飞行。

8架日本飞机越过布兰切海湾，飞向大海。他们第一次看到的陆地，是新爱尔兰岛南端的一座灯塔。两架轰炸机平行飞行，山本的座机在右，略靠前，飞行高度2000米。飞机在大海上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机械师穿过过道，把驾驶员林浩写的一张纸条递给宇垣，上面写着，“7点45分到达巴拉尔。”宇垣看了看表，时间是7时30分。飞机将在15分钟内降落，比计划提前一刻钟。

此时，美军米歇尔少校率领的执行截杀任务的机群正在飞向预定地点。当他们飞行了大约637公里，前面只剩约64公里路程时，米歇尔带队突然急转弯回到东北航向，直奔布干维尔岛的西岸。与此同时，他们进行了机关炮试射。现在，“闪电”式飞机重新靠拢，恢复密集队形。米歇尔估计在10分钟之内，他们就将投入战斗。

那天上午的天气晴朗，能见度极好，可以看清30公里以外布干维尔岛上的群山。美国人的表针指向9时44分时，米歇尔盯着左边的天空，寻找飞机的影子，按他的推测，山本的座机将在1分钟内到达这里，可是，米歇尔看到的天空是空荡荡的。正在焦急万分之时，飞行员坎宁突然打破无线电静默，叫道：“发现敌机，左前方！”不一会，坎宁又喊道：“在上方！”米歇尔也看到了前方的敌机，一共是8架，其中有两架轰炸机。尽管情况有变，敌人中多了一架轰炸机，但米歇尔还是十分得意：山本终于来了，而且与自己预计的时间只差1分钟。

此时，日本人也发现了美国飞机。可是未容日本人有所反应，美国战斗机群已突然折回来，各机都抛掉副油箱，摆开攻击阵势。米歇尔将机群分为两路：一队迅速升高；另一队向日本人前方迂回过去。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令日本人来不及仔细思量，两架日本轰炸机的去路已被截断。

日本飞行兵曹长小谷立驾驶的山本座机见势不妙，迅速下降，几乎降的要角到海岸密林的树梢时，又猛然左转，企图甩掉美国飞机，夺路飞往前方不远的布因基地。护航的日本“零”式战斗机左遮右拦，拼命反击。为消灭山本，美军飞行员兰菲尔驾驶的“闪电”式战斗机不顾一切地向山本座机扑过去，机关炮连连开火，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那一瞬间，兰菲尔看见山本座机的右发动机已经起火，他知道目标已被击中。山本座机的右机翼紧接着也开始燃烧，而这种轰炸机一旦起火，便无法挽救，加之飞机已是在低空中飞行，降落伞根本派不上用场。兰菲尔随即看到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紫色火焰裹住，火光之中，碎片横飞。机翼掉了以后，整个飞机仿佛是一个红色的火球，迅即钻进了密林。

当山本座机遭到攻击之时，宇垣参谋长乘坐的另一架轰炸机迅速降低高度，作了两次闪避转弯。这时，机内的宇垣看到山本座机在距离大约4000米处紧擦着原始森林，喷着浓烟和火焰，慢速向南下方坠落。当他定睛再看时，座机已经无影无踪，只见原始森林中升起了冲天的黑烟。宇垣座机原来可以躲开美机的攻击，但在山本座机遭致攻击时，宇垣为了保卫长官座机，下令紧追山本座机。当山本座机被击落以后，宇垣座机也被美机四面包围。日机飞行员林浩在这千钧一发之机，突然调转方向，向海上飞去。当飞到距离海岸线约50米时，飞机已经下降到螺旋桨快要拍打着水面的程度。就在这时，飞机突然被美机所击中，失去控制，瞬间便坠入海中。

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就这样被消灭了。

山本五十六被歼灭，可以说是美国人精心策划的一个极其成功的谋略。战争中，信息与情报是最重要的，美国人成功地破译了日本人自以为无法破译的乱数式密码，然而并不张扬与轻易使用，“好钢用在刀刃上”，致使日本人毫无觉察，而在最关键的时候，一使出这个“杀手锏”，歼灭的就是最为美国人所痛恨的战争罪犯。在这一谋略中，罗斯福总统表现出了果断的精神，他不为传统的认识所约束，尽管包括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在内的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伏击山本座机这一暗杀对方指挥官的手段不大光彩，然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胜利，山本五十六偷袭珍珠港难道光彩吗！罗斯福下令“干掉山本”这一决策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米歇尔少校等人精心组织的伏击战，是空战中的成功范例。山本五十六被歼灭的事实，极大地震撼了日本侵略者。虽然当时日本人为山本五十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可是从送葬者呆滞的目光中，人们可以发现山本五十六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影响，可以发现山本五十六的死将给这场由日本人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蒙哥马利诱德军上当 “沙漠之狐”阿拉曼惨败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英军陆军元帅。他出身于伦敦一个牧师家庭，18岁入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索姆河战役中指挥一营英军同德军作过战。这段经历对他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军事对他而言是一种终身的职业，故一直潜心研究战争和科学的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哥马利所在的英国自战争爆发以来，即遭到了法西斯的一连串打击。1942年，当处于英国控制之下的埃及又连连告急时，坐卧不安的英国首相邱吉尔日夜苦思解救北非英军的对策，他想到了蒙哥马利。邱吉尔确为慧眼识人，对蒙哥马利的启用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940年秋天，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墨索里尼乘法国战败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溃退之机，调集大批军队在北非和东非发动攻势，想要抢占英法殖民地。意大利军队起初进展颇为顺利，但好景不长，到12月，英军集中15个师，向意军发起反攻，迅速突破意军防线，进入昔兰尼加，接着便沿非洲北岸节节向西推进，1941年1月进占托卜鲁克，2月进占阿盖拉。意军一败涂地，处境危急。

希特勒为了挽救他这位无能的伙伴，并妄图占领埃及，然后向东，与进犯东南亚的日军在印度会师，就派遣德军将领埃尔温·隆美尔为北非德意联军总司令，率领1个军团的兵力去北非。隆美尔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也是希特勒最得力的将领之一。他惯于使用坦克集群发动闪电般的突击，而北非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为他大显身手创造了条件。

隆美尔当时的级别仅是中将，所以率领去北非的军队号称1个军，实际上数量不足，但在他的领导之下，以闪电般的凌厉攻势在沙漠中纵横驰骋，英军连连败北。尤其是1942年1月21日，隆美尔所发动的第五次闪电战，将英军击退500多公里。隆美尔占领了英军重兵防守的托卜鲁克，3万名英国守军被迫投降。隆美尔由此声名大振，获得了“沙漠之狐”的称号。

1942年7月4日，德意联军又逼近埃及阿拉曼附近的英军防区，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40公里。形势万分危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上将的陪同下，从英国本土乘飞机抵达开罗，亲自了解北非战场形势，研究制定新的作战计划。邱吉尔决定改组中东战区的军事领导班子。他撤掉了主张撤退的中东总司令兼第八军团司令奥金莱克，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为中东总司令，又将已奉命去指挥“火把战役”的蒙哥马利中将调任为第八军团司令。

8月11日，蒙哥马利到达开罗。8月13日上午11时，他动身去北非沙漠前线指挥第八军团。在前线，迎接他的是一片混乱、士气低落和准备撤退的气氛。当天晚上，蒙哥马利召集60名指挥官、军事参谋训话。他说：“我不喜欢这儿的气氛。这是一种怀疑的气氛，是向后寻求增援部队、挑选下一个撤退点的气氛，是对我们能够击败隆美尔失去信心的气氛。所有这些必须停止。……让我们建立起一种崭新的气氛。埃及的防线就在阿拉曼和鲁丰萨特山脉这儿。如果我们失去这块阵地，我们就将失去整个埃及。我们将在此战斗，决不后退。我已命令立即烧毁一切关于撤退的计划和指示，我们将在此战斗。如果我们不能在此生留，就让我们在此献身……”

第八军团本是一支杂牌部队，包括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印

度人和英国人，蒙哥马利的讲话鼓起了这支军队的士气，使一支沮丧的军队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蒙哥马利通过迅速向其部下传达自己的意志，努力使部队受到他人格的感召。他造成这么一种印象：这是他的军，而且只有他知道正确的方向。同时，蒙哥马利立即着手整顿军队，解除了一些贪生怕死军官的职务，统一指挥陆军和空军，加强部队的动员和训练，充实人员和装备，并建立了独立的装甲部队。他根据新任中东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向敌人进攻，歼灭他们”的命令，积极着手组织进攻的准备工作。经过整顿，第八军团的兵力和装备大为增强。更重要的是，此后蒙哥马利的人格魔力在这支部队中始终不衰，从阿拉曼到突尼斯，他的意志控制也始终不放松。有人认为他的行为近似粗鄙，他的个人崇拜之风令人感到肉麻，但是，他率领下的士兵确实充满了征服者的精神，而且是一路打胜仗。

此时，国际形势开始有利于英军，德国由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大大压缩在非洲的兵力和武器的供应，这就给英军在北非战役的反攻提供了有利条件。蒙哥马利恰当地把握了这一时机，组织了反攻。

8月31日，蒙哥马利在阿拉曼附近的阿拉姆·哈法高地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他预见到隆美尔将进攻英军防御薄弱的地点，便依托阿拉姆·哈法高地的有利地形，组织好防御力量，构筑起坚强的防御工事，并决计诱使德意联军的坦克部队进入预设的战场——英军布雷区和伏击区。

如何才能诱使隆美尔这只狡猾的“沙漠之狐”上当呢？蒙哥马利逐一分析了前任在阿拉曼战场多次失败的教训，初步掌握了隆美尔的作战特点后，想出了一条妙计，先用各种假情况，使对方相信他的部队被战败后已不堪一击；根据隆美尔当时对阿拉曼地区的地形还不熟悉的情况，他巧妙地送给隆美尔一套假地图，在这些地图上，车辆难以通行的流沙地区被改为“硬地”。隆美尔得到这张地图后，觉得正合他的想法，既没有想过需要实地侦察，也没有通过其他手段进行调查核实，就完全相信了。

9月1日凌晨，隆美尔开始按照这张地图向阿拉曼地区发动进攻。蒙哥马利早已在此悄悄地部署了3个战斗力很强的装甲师严阵以待，专等“鱼”上钩。隆美尔果然上当。他的部队按图“索骥”、从凌晨到天亮时都未找到一个目标。这时，隆美尔不但不改变决心，反而指挥部队继续按图前进，结果很快使德军非洲兵团进入流沙地区。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半履带车和7辆卡车在英军假地图标明为硬地而实际上为流沙的地区东倒西歪地挣扎，许多车辆陷入泥沙中不能动弹，当德军士兵下来推车时，英军几个中队的战斗机对其进行了轰炸扫射。一时间，沙漠里到处都是燃烧着的德军车辆。蒙哥马利的装甲师也乘机发动了反攻，狠狠地打击了德军的嚣张气焰。这次战斗，以德军损失惨重，仓皇撤退而告结束。蒙哥马利首战告捷，英军士气为之一振。

但战局仍未发生根本变化。蒙哥马利为了打破双方在阿拉曼战线的僵持局面，决定在10月下旬再发动代号为“捷足计划”战役，向德意联军发动总攻。

蒙哥马利的英军第八军团，编有10个师和4个独立旅，总兵力为23万人，1440辆坦克，2311门火炮和1500架飞机。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是在左翼钳制敌军，由阿拉曼西南地域发起进攻，向西迪——哈密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将德意联军压缩至沿海一带，然后予以歼灭。

隆美尔指挥的德意联军当时在阿拉曼以西布置了长达60公里的防御阵

地，共编有6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伞兵旅，总兵力约为8万人，还有坦克540辆，1450门火炮及350架飞机。但是德意联军的坦克师不满员，补给十分困难，各种物资极为缺乏，只能达到需要量的40%。在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隆美尔决定采取守势，即以第一梯队步兵师抗击英军的进攻，以第二梯队4个坦克师实施反突击，争取歼灭楔入的英军。

蒙哥马利在准备战役时，非常注意采取伪装隐蔽措施，保障战役的突然性。他在第八军团南翼的后方特意设置了一个假地域，似乎在那里集中了几个装甲师。这一伪装使隆美尔摸不清英军的突击方向，不得不将预备队的一半兵力即两个坦克师集中在战线南翼。

英军总攻时间预定在10月23日夜间进行。蒙哥马利在日记中表达了英军必胜的信心：“敌人知道我们将会发动进攻，于是加强防御。我们不仅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且在人力、坦克、大炮和其他物资方面都占有极大的优势。必须发挥我们战术的优势……使隆美尔的机械化部队进退维谷。”

此时的蒙哥马利已经享有其前任所没有过的优势，他从有关击沉敌人的船只的报告和秘密情报中，已得知隆美尔部队的补给严重不足，尤其是在燃料方面。号称Ultra的系统能够截获和译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无线电报，使蒙哥马利对于敌人的计划和其他问题能获得一连串的可靠资料，这对于他的指挥具有深远影响。同时，美国的运输船队又给蒙哥马利送来了大量的物资，其中有使用高爆炸力炮弹的“谢尔曼”坦克，有6磅的反坦克炮，新的生力军及大量的补给更壮大了蒙哥马利的力量。

在10月20—23日，蒙哥马利下令英军第八军团的空军利用空中优势，实施了密集的航空火力准备，对德意军队的机场、交通线和兵力集中地域进行了多次突击。

10月23日21时40分，英军近1000门火炮，同时向敌军的炮火阵地开火。20分钟以后，英军步兵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开始前进。英军由于炮火密度小，每公里正面仅配置50门火炮，所以射效不大，未能把德意方面的火力发射点完全压住。经过一夜激战，英军才接近敌军的防御前沿，之后又花了一个小时重新配置兵力，继续前进。但遇到德意联军的疯狂抵抗。到了第二天早上5时半，英军虽有两支部队进入指令地区，然而在主攻的中路方向上，由于工兵未能完成开辟通路作业，不得不在行进中继续扫除地雷，所以进展缓慢，离预定目标尚有1000多米。蒙哥马利下令把战役计划规定用来发展突破的第二梯队投入战斗，但仍然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蒙哥马利感到这种“啃骨头式”的攻击代价太大，遂于10月27日停止了进攻，重新进行兵力部署，决定把进攻轴线向北移动。隆美尔这时也在重新调整部署，他发现英军南翼实际上是佯攻，就将坦克突击团建在北翼，打算以此来击溃英军的主攻部队。结果双方都把自己的全部坦克力量集中到了北翼。

隆美尔对坦克部队的调动情况很快被蒙哥马利所侦知，他立即在10月28日下午，令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德意军坦克部队进行了强有力的轰炸，破坏了德意联军准备实施的反突击。

11月2日凌晨1时，英军又在主要突击方向发起进攻。在步兵和坦克发起冲击前，进行了4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同时还得到了空军的频繁支援。步兵和坦克部队的进攻开始了，英军所投入的大量的重型坦克较之德、意军的

又小机动性也差的坦克占了明显的优势。到傍晚时分，意大利第 20 军全部被歼，军长被俘。英军不顾重大损失，终于在德军和意军的结合部打开了缺口，坦克部队乘胜突入德军阵地，对德军造成围歼之势。

隆美尔不仅损失严重，更为严重的是后勤补给情况极为糟糕，他认识到这次会战是败定了。11 月 3 日，隆美尔请示希特勒，要求给予他“完全的行动自由权”，但希特勒对他的答复是：“站住不动，不准后退一步，对于你的部队，你应该告诉他们不成功，便成仁。”隆美尔不得不下了道停止退却的命令。但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执行这项愚蠢的命令，他的军队必将遭到彻底覆灭的命运，因此对部下的撤退行动听之任之。11 月 4 日拂晓，英军完成突破，德意联军全线溃败。此时的隆美尔，手中既无预备队，又无燃料，不得不急速撤退，撤退中又劫掠了意大利军队的运输车。被德军遗弃的 4 个意大利步兵师，走投无路，只好向英军缴械投降。隆美尔率领残兵败将一口气后退了 700 英里，逃至突尼斯境内，总算使 3.5 万人暂时摆脱了英军的追击。

在这场为期 12 天的阿拉曼战役中，德意联军被俘和伤亡 5 万人，被击毁坦克 525 辆、火炮约 1000 门；英军伤亡 13500 人。这次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战局的转折点，也是英军抗德战争中的第一个巨大胜利，从此战场的主动权开始转到英军方面。蒙哥马利由于在这次战役中战功显赫，被晋升为上将，还被封为阿拉曼子爵。

斯大林格勒大捷 二战迎来转折点

莫斯科战役之后，漫长的苏德战线相对地沉寂下来。双方都在秣马厉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役，以争夺战略主动权。这时的德军已无力在苏联发动全线的进攻，被迫将兵力集中于南线，准备发动一场局部攻势，矛头所指的就是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经过半年多的浴血苦战，歼灭了德军 66 个师约 150 万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英、美等国的报纸将这次战役的胜利比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战役，其实这次战役的意义远非凡尔登战役所能比拟。

莫斯科会战后，德军士气开始下降，兵员和物资日感不足，其仆从国家亦产生疑虑，出现分歧。希特勒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计划，决定于 1942 年夏季，集重兵于苏德战线南翼，同时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攫取石油、煤、粮食等重要经济资源，切断伏尔加河水运干线，进而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与亚洲的法西斯日本军队在印度洋会师，造成南北夹击的局势，一举灭亡苏联，进而集中力量对付美、英和中国，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斯大林格勒位于顿河河曲以东五六十公里的伏尔加河岸上，原名察里津。1918 年，斯大林受列宁委托前来保卫察里津，粉碎了邓尼金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为捍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25 年，苏联人民为表彰斯大林的功绩，将察里津命名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是苏联南部的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役意义。希特勒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故把进攻斯大林格勒作为打击苏联要害的手段。为此，他集中了 150 万德军，并把在北非作战的一部分飞机和坦克都抽调过来了。担任直接进攻的是德军第六集团军，第四航空队负责空中支援。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军统帅部鉴于南方战线严峻局面和斯大林格勒的战略地位，深刻认识到坚守斯大林格勒对于整个苏德战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改善南方的战役态势，保持苏联中部与南部的联系，而且能够打破和阻止希特勒向北进攻莫斯科的企图。因而决心在该地区组织坚固防御，坚决阻止德军的进攻。为了争取主动，统帅部采取了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待机反攻的策略。决定先诱敌深入，再顽强抵抗，大量消耗德军兵力，待条件成熟时转入反攻，集中战略预备队突击德军薄弱的两翼，随即合围并全歼德军重兵集团。

7 月 12 日，苏联最高统帅部组建了由铁木辛哥元帅任司令员的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配置在总长 520 公里的顿河大河弯曲防线上。战役开始时，苏军总共只有 12 个师、16 万人、2200 门火炮和迫击炮、约 400 辆坦克、454 架飞机，此外，还有 100 多架轰炸机。强敌当前，斯大林格勒军民严阵以待，响亮地发出了“决不后退一步”的口号。全城构筑了 4 道防御围廓，即外层、中层、内层和市区围廓；组织了 83 个民兵歼敌营，协同主力部队作战；居民也做好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准备。

7 月 17 日，接近地争夺战拉开了序幕。德军向苏军前沿阵地发动猛烈攻击，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和坦克的反突击。德军统帅部意识到单靠第六集团军的现有兵力不足以攻下斯大林格勒，就从高加索调来坦克第四集团军，从

南面进行攻打。但是，苏军经过浴血奋战，仍然把德军阻遏在顿河西岸近 1 个月之久。

德军不断以强大的坦克部队和优势兵力向苏军频频猛攻，终于在 8 月 23 日强渡过顿河河曲，出现在斯大林格勒市区以北的伏尔加河河岸，对市区造成严重威胁，并把苏军分割成两部分。与此同时，德军对市区进行了轮番的狂轰滥炸，平均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投下了总共 100 多万颗炸弹，使城市变为一片焦土。但这并没有使斯大林格勒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他们复仇的怒火。北郊的拖拉机厂离德军只有 1.5 公里，工人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空中轰炸，继续生产和修理被打坏的坦克，许多工人装配好坦克后就直接开着这些坦克到前沿阵地去参加战斗。

针对斯大林格勒已经出现的严重形势，斯大林和苏军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兵力；对突击至前的德军实施反击；重新部署防御；委派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具有突出贡献的朱可夫大将作为最高统帅助理，统一指挥各部队的作战行动。

苏军经过短期准备，于 8 月 24 日、9 月 2 日、5 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起反击，迫使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正面调出 8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师，大大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城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所限和准备不够充分，这些反击未能歼灭已突至伏尔加河的德军，双方争夺激烈，伤亡都很大。战斗延续至 9 月 12 日，苏军已全部撤至市区围廓，外围防御地带已全部丧失。

9 月 13 日，德军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即展开直接争夺城市的战斗。14 日下午，德军突破了苏军防线，窜入了市中心，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德军为抢占市区，动用了 13 个师约 17 万的兵力、500 辆坦克、1700 门大炮和迫击炮。守卫市区的苏军只有 9 万人，配有 1000 门大炮和迫击炮、120 辆坦克。苏军虽处劣势，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顽强抗击，与冲进市区的德寇进行殊死战斗。每个街区、每幢楼房，甚至每层楼、每间房、每个街垒，都要进行反复争夺，有时要费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决定归属于谁。战斗空前激烈，苏军不少师只剩下几十个人，仍坚守阵地。近卫军中士雅可夫·巴甫洛夫领导的一个 24 人战斗小组，死守一幢四层楼房达两个月之久，德军反复冲击，始终未能攻下这座楼房。在苏联人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面前，激烈的血战只能使德军感到胆战心惊。

激烈的战斗进行到 11 月 18 日，德军的全部后备部队已经消耗殆尽，第一线的主力打得精疲力竭，寸步难行。而苏军则在斯大林、朱可夫的统一指挥下，给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以强有力的支援：先后增援了 10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和 2 个坦克旅，这些部队先以勇猛的反突击收复失地，然后再组织防御，对于迟滞德军进攻起了重大作用；空军集团军和防空部队，全力抗击德机空袭和德军的进攻作战，先后击落德机 929 架，苏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远程航空兵日夜轰炸德军阵地和后方集结地域；运输航空兵对被围部队，不停顿地空投物资，伏尔加河舰队亦加快运输部队、武器、弹药和粮食；其他地区的苏军也加强对德军的打击……这些行动，都大大改善了斯大林格勒守城部队的困难处境。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企图迅速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只能宣告破产，德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德军转入防御即是苏军进攻的开始。还在斯大林格勒防御阶段，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即制定了反攻计划，并为反攻的到来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苏军为大反攻调集了 110 万人的兵力、15500 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50架飞机。而此时的德军第六集团军群虽经几次增援，仍只能处于劣势，作战人员比苏军少10万人，火饱和迫击炮少5000多门，坦克和自行火炮少700多辆，作战飞机少100多架。更重要的是，苏军士气高涨，对胜利充满信心；而德军士气低落，为苏军的英勇精神所震慑。

11月19日清晨，苏军西南方面军首先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发起攻击，2000门大炮同时轰响，到天黑时，苏军已向纵深推进25—30公里。11月20日，苏军又在南面发起进攻。22日晚，苏军坦克第26军先头部队抵达顿河大桥附近，发现德军在桥上设有重兵守卫。苏军指挥官菲秘波夫中校决定实行一项大胆的计划。他命令坦克车打开车灯，大摇大摆地向前冲。德军守兵看到几十辆坦克排成一字长龙，还以为是前来增援的德军，因此予以放行。苏军坦克一上桥，立即开火，歼灭守桥德军，卸下德军在桥上安置的爆炸装置，然后打起两颗绿色信号弹，让后续部队放心过桥。菲利波夫由于这次果敢行动，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11月23日，从西北和南面发起攻击的两支苏军在卡拉奇、苏维埃茨基、马里诺夫卡地域会师，完成了对德军鲍留斯军团33万人的合围，然后逐渐压缩合围圈。鲍留斯被压缩在150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后，处境困难，曾向德军统帅部要求突围，但未获希特勒批准。

希特勒为解救被围德军，于11月25日授命曼施坦因组·建顿河集团军群。该军群包括顿河中游至阿斯特拉罕以南的全部德军，并从西欧、非洲及苏德战场其他地段抽调了4个坦克师、6个步兵师，在托尔莫辛和科帖尔尼科沃地域，建立了2个突击集团，企图从西南方向打开一条通路，殊不知这正中苏军制定的“围敌打援”之计。苏军统帅部立即命令西南方面军歼灭托尔莫辛集团，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歼灭科帖尔尼科沃集团，顿河方面军则继续压缩被围敌军。

在打援战斗期间，广大敌后游击队频繁出击，不断炸毁铁路、桥梁、颠覆了几十列运送德军兵员和物资的列车，给苏军以有力的支援。

此时，苏军已掌握了制空权，德军无法从空中运输粮食、弹药和援军。包围圈内仅有的德军空军基地皮特姆尼克机场也被苏军占领。苏军利用机场的照明和无线电导航设备，巧妙地欺骗德军飞行员。当时，他们还不知机场已为苏军所占，几十架降落下来的德国飞机旋即成为苏军的“笼中之鸟”。

被围困的德军由于饥饿，不得不把骑兵的马匹宰杀吃光；每个士兵每天只能领到100克面包和30克油脂；坦克也因缺乏燃料而成了一堆废铁。德军已陷入绝境，成为瓮中之鳖。到1943年1月8日，苏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鲍留斯投降，被拒绝。1月10日早上，苏军以猛烈的炮火和空袭向包围圈中的德军实施进攻，不断向包围圈内推进。1月24日，包围圈已经很小了，希特勒仍下令死守阵地。26日晚，德军被分割为南北两个部分。1月30日，在南部德军的鲍留斯电告希特勒：“部队将于24小时内最后崩溃”。希特勒赶忙发电，授予鲍留斯为“元帅”，其他117名军官也晋升一级。然而这不过是临死前的一种绝望挣扎，毫无作用。1月31日，鲍留斯及其司令部全体官兵，在中心百货商店的地下室被俘；2月2日，由史特勒克尔指挥的北部德军也投降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及罗马尼亚第三、四集团军、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皆被苏军击溃，灰溜溜地撤离伏尔加河，向西溃逃。

至此，历时6个半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德

军被打死、打伤、被俘和失踪的官兵总数约达 150 万人，占当时苏德战场上德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德军还损失了 35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2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4400 架战斗机和运输机。

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场面其残酷是举世罕见的。大规模的“人海”集群冲锋，阵地肉搏战，激烈的巷战，坚守要塞的狙击战，坦克集团的对攻战，密集的炮战，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人面对此场景，不能不感到这场大血战的惊心动魄。

然而，这场大战的重要意义又是十分明显的，是苏军对德军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它严重震撼了整个德国，动摇了仆从国对希特勒的信任；它促进了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的高涨；它迫使日本暂时放弃了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计画以及土耳其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变；它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法西斯集团开始分崩离析，德国的败局已定。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胜利，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的。最主要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统帅部制定了一个正确的作战方针：战役开始时，德军兵力强大，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苏军统帅部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不断周密的侦察，恰当地制定出各个时期的作战计画，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而后待机反攻”的谋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从实际出发并在战略上争取主动的正确方针。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各级指挥员全力贯彻了这一方针，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战役效果。此外，在整个会战中，苏军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集团军都十分重视组训和掌握预备队，在关键时刻使用于重要的战略、战役方向、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给德军以沉重打击，这对于扭转战局，发展胜利和组织连续战役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反攻中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将主突方向选在德军薄弱的部位，使被围德军孤立无援，陷入绝境，彻底覆灭。苏联党和政府为这次会战所进行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人民的支持，良好的后勤保证，也是斯大林格勒大决战取得巨大胜利的重要原因。

“瞒天过海”蒙骗了德军 “暗渡陈仓”诺曼底登陆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整个战争形势表明，希特勒法西斯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印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了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会议拟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并就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共识。为了开辟第二战场，三国决定实施名为“霸王”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提议第二战场在西欧开辟，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最后三国商定，“霸王”战役应于1944年5月发动，于是，一个使德军陷入两面作战局面而加速失败进程的大战役，也是在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登陆战，参加人数达数百万人的“诺曼底登陆战”发动了。

还在1943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宣布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西北欧盟国远征军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霸王”战役；英国的泰德空军上将为副统帅；蒙哥马利为英军地面部队司令；美国的布莱德雷为美军地面部队司令。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威尔飞抵伦敦，成立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全面展开“霸王”战役的准备工作。

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登陆战至关重要。历史是颇具讽刺意味的，4年以前的1940年5月，当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进攻法国时，数十万英法军队被压缩在法国北部狭小的敦刻尔克，在9天的时间里，33万人奇迹般地从英吉利海峡大撤退，那时的形势是极为悲惨的。而今，德军的优势已经丧失，盟军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加强，英、美盟军又要反攻回来了，要重新渡过英吉利海峡了。

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后，开始对有史以来最大的三军联合作战作最后6个月的强化准备。那时，关于“霸王”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由英国摩根中将领的一个特种联合作战计划小组建议以诺曼底为登陆地点，不过当时的计划是以3个师的登陆兵力为基准。

为什么要选择诺曼底？因为盟军登陆地点的选择，对战争成败的关系极大。选择登陆地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登陆地点必须离英国空军基地很近，这样部队才能取得空军掩护，陆续上岸；建立牢固的桥头堡；登陆地点附近必须有港口设施，这样登陆部队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军用物资和后续部队的支援，否则就无法抵挡住德军的反击。欧洲大陆沿海比较适合登陆的地点只有两处，一是法国的加莱海岸，一是法国的诺曼底海岸。加莱地区港口良好，距英国最近，不到40公里，可是却是德军重点设防的地区，加上海边岩壁陡峭，海滩狭窄，对登陆部队展开作战不太有利。诺曼底地区虽离英国较远，有140公里左右，没有良好港口，但附近有瑟堡港，可以提供海上支援，更为重要的是德军在这里防御薄弱，海滩地带宽阔，可以容纳二、三十个登陆师，而且陆上地形起伏不大，便于向纵深发展。两相比较，诺曼底海岸的有利条件要多些，所以盟军决定从这里登陆。

艾森豪威尔和奉命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蒙哥马利对从诺曼底登陆的作战计划仔细研究后，决定将登陆兵力增加到5个师。在计划大纲拟定之后，艾森豪威尔把关于登陆的详细准备工作交给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去负责，因为那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他所关心的是比较广泛的问题，如空军的使用、后勤系统的建立、民政和政治问题以及同盟战役等。

从指挥角度来看，对于艾森豪威尔，空军指挥权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他要求英国的一切战术和战略空军应完全在其控制之下进行诺曼底登陆之战。对于战术空军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英国的哈里斯将军却强烈反对将英国的战略空军完全交于艾森豪威尔指挥，他不希望艾森豪威尔干涉其每夜对德国城市的盲目轰炸。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于3月23日宣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我将呈请辞职。”这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结果是英国的参谋长们作出让步，同意把哈里斯的轰炸机部队安排在艾森豪威尔的“指导”之下。于是，艾森豪威尔指派他的副帅——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代表他协调有关空军的运用问题。

由于诺曼底地区没有海港，为保证顺利登陆，必须构筑大型人工海港，以便船舶停靠。英国海空工程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发明出一种顶制的海港堤岸。这种预制的堤是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铸的巨大空心块，准备登陆时由船只拖到诺曼底海滩上，拼接成一道道堤岸，然后拔出空心块的塞子，使之沉到海底。由于这种混凝土块又高又大，沉到30英尺深的海底后，还能露出海面30英尺，足够船舶停靠之用。盟军一共造了200多块各种形状的空心块，其中最大的有60英尺高、55英尺宽、200英尺长、重达6000吨，其大小和一幢五层楼房相仿。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盟军已悄悄地为诺曼底登陆战役集中了288万人的兵力，其中陆军36个师，153万人；空军飞机13700余架，其中轰炸机5800架，战斗机4900架，运输机3000架；海军各型舰艇9000余艘，其中登陆艇4000艘。而德军在西线的地面部队共58个师，空军飞机500余架，海军舰艇、鱼雷艇共200余艘，其中在诺曼底第一线实行抗击登陆、作战的部队，当战役发起时，已经只有6个师又3个独立团，仅9万多人。

德军根本没有想到盟军会选择诺曼底为登陆地点，他们一直以为盟军可能在加莱登陆，希特勒亲自确定构筑防御阵地的顺序是：加莱海滨、瑟堡要塞，诺曼底。因而在诺曼底的防御相当薄弱。这又和盟军所采取的多种迷惑德军的方法有关，“以假乱真”的谋略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是大放了异彩的。

在准备诺曼底登陆的同时，美、英盟军在多佛港口虚设以巴顿将军为首的美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并制造即将在加莱地区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假相，在英国东海岸各港口设置大量假登陆艇、假物资器材堆积物，树立显明的上船和登陆准备标志；在已知的德军特务机关周围，建立了假的无线电网，适时发出假情报；突击上陆前夜，还在佯攻方向布伦地区施放模拟登陆舰队，用飞机投掷铝箔片，使德国在雷达荧光屏上看来好像大群飞机，造成有护航机群掩护登陆的假相；重点轰炸加莱地区，整个准备阶段，美、英军在加莱地区投下的炸弹吨数超过同期在诺曼底地区投弹量的两倍。

诺曼底登陆战役最直接的是陆军登陆之战，指挥此战的是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蒙哥马利，为了迷惑敌人，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盟军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了一个冒名顶替的欺敌行动。其内容是故意让德国人拿到一些“证据”，证明英国登陆部队的司令官蒙哥马利已离开英国本土，到直布罗陀及阿尔及尔视察去了。英国情报部门精心物色了一位相貌酷似蒙哥马利。且有25年职业演员历史的陆军中尉杰姆士，在较短的时间内训练他熟悉蒙哥马利的一切生活习惯，言谈举止，甚至连吃饭时麦片粥中要不要放牛奶和糖的细节也不放过。杰姆士本有扮演各种角色的天赋以及丰富的表演经验，经过训

练，他的模仿已使人们无法分辨真伪。到了5月15日这天，由杰姆士扮演的蒙哥马利将军在高级将领的欢送声中，搭乘首相专机飞往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去了。与此同时，英国情报部队又故意放出风声说，蒙哥马利将军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重要使命是编组英、美联军，可能向法国南部海岸登陆。

纳粹德国当局得知此消息后，开始也半信半疑。为了证实真伪，特派两个受过盖世太保严格训练、希特勒极为欣赏的间谍，前往直布罗陀进行侦察。由于杰姆士的表演逼真，有时还故意在容易泄露机密的场合谈论英、美联军作战问题，并且在确知有德国间谍混入的群众面前露面，甚至当一位驾驶轿车的金发女郎要求“蒙哥马利”签名留念时，他也把签了字的照片递给她，并且脸上毫无笑意。他“讨厌”在战地遇到女人。这一切维妙维肖的表演，使德国间谍深信确是蒙哥马利到了直布罗陀。甚至连直布罗陀总督、蒙哥马利的密友拉尔将军，也以为是蒙哥马利临时改变计划，前来视察的，英军情报部门设计的这一冒名顶替的欺骗行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德军统帅部终于误信了西方盟军要在法国的加莱地区登陆，而把防守诺曼底地区本已很薄弱的兵力又抽调了2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到加莱地区，从而大大减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

这一切，果然骗过了德国。希特勒对盟军登陆的方向和时间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以为盟军在英国东南部已集结了92—97个师的兵力，准备在7月进攻加莱，因此把德军最精锐的军队都集中于加莱地区，设置了有6公里纵深的防御地带；加莱一带的海滩中又放置了大量障碍物和3道水雷区。而在诺曼底，希特勒却只部署了6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防御力量和构筑工事薄弱。诺曼底海滩虽有一些障碍物，但塞纳湾中并未敷设水雷。

6月5日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选定的登陆日。6月1日，美、英军登陆的突击梯队5个步兵师在英国西南部16个主要港口开始上船。航渡时编成5个登陆编队，各编队一般编有1个旗舰大队，3—4个登陆大队，1个扫雷大队，1个火力支援大队和1个警戒大队。但自6月2日起，登陆地区天气不断变化，海面上刮起了6级以上大风，不利于实施登陆作战，许多已在海上编队的登陆艇只好返回港口待机。这时，美国气象学博士、气象委员会主任斯塔格上校预报，从6日晨到8日之间将出现一个短期适合登陆的好天气。艾森豪威尔当机立断，于6月6日早晨6时30分登陆。

德军未能掌握盟军登陆的主攻方向及时间，更未掌握6月初这一气象变化对战局的影响，仍认为盟军不可能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登陆。6日早晨，防守诺曼底的德军司令隆美尔元帅根本不在德军司令部，他在前两天天气正恶劣时就放心大胆地回德国“休假”了；驻诺曼底的德国第七集团军司令部也已下令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所属指挥官到远离海滩的地方进行“图上作业”去了。直至美、英联军登陆的炮火打破了诺曼底的沉默和宁静，德军仍然错误地认为诺曼底只是一种牵制性的行动，仍将很大预备兵力控制在加莱地区。这种状况，无疑有利于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的成功。

6月6日凌晨，英、美联军3个空降兵师在2219架轰炸机的支援下，搭乘2395架飞机与847架滑翔机，在诺曼底海岸实施空降着陆，正式拉开诺曼底登陆战的序幕。由大批船舰运送的盟军登陆部队也开始在各个滩头强行登陆；1000多架飞机和海军大炮同时向德军防线猛轰。奥马哈滩的登陆战最为激烈，尽管如此，仍有34000人登上岸，伤亡仅2000人。盟军在各登陆点肃清敌军后，迅速向前推进，到6日夜晚，已有13万余人上岸。到12日，盟

军占领的 5 个滩头连成一片，有 32 万余人上岸，初步在 80 公里正面、13—19 公里纵深建立了集团军统一的登陆场。至 7 月 5 日，登陆部队超过 100 万人，并把大量武器、车辆和物资运送上岸。7 月 18 日，登陆部队已增至 36 个师 150 万人，各种车辆 33 万辆，作战物资 160 万吨。盟军的登陆任务顺利完成了。

在美、英军队突击上陆的较长时间内，德军统帅部未能察明登陆作战的真实规模，仍认为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在加莱地区，所以德军始终在加莱地区控制相当大的兵力。从 6 日至 12 日的 7 天中，德军除原防守登陆地区的第八十四军外，从各方面调来抗击美、英登陆的兵力约为 12 个师，因为行动不统一，并未组成强大的突击力量。面临盟军的攻击，德军的指挥系统相当混乱，内部又矛盾重重。部署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 7 个装甲师，表面上受隆美尔指挥，实际听命于专门用来节制隆美尔的西线总司令部及其装甲群调度。在盟军登陆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军竟没有一个装甲师能够发起反击。一直等到三天以后，德军装甲师才相继投入战斗。而这时，盟军早已在滩头站稳了脚跟。

当仓皇从德国赶回诺曼底的隆美尔再用急电请求希特勒调兵遣将时，已经太迟了。盟军经过长时间的战略轰炸和反潜战斗，使德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希特勒鼓吹的“大西洋壁垒”彻底被打破，隆美尔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败阵而去。

诺曼底登陆战胜利后，盟军于 7 月 25 日开始向内陆大规模推进。8 月 25 日，在起义军和巴黎人民的配合下，盟军开进了巴黎。法西斯德国在西欧的防线全面崩溃。

巴顿将军所向披靡 飓风进攻令敌丧魄

1945年12月9日，因在记者招待会上竟说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差不多”，当场引起轩然大波，从而被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免去第3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巴顿将军，在外出打猎途中遭遇车祸，21日因伤势过重而在德国海得尔堡去世。去世后的巴顿将军立即成为美国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因为二战中的新闻报导早已使他成为典型的神话人物。许多人都相信，若没有他，欧洲战争可能还要拖得更久。这或许并非过誉之词，因为巴顿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有成就，尤其是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他所领导的第3集团军转战千里，所向披靡，创造了不少战争史上的杰作。直到今天，那些当年曾在巴顿手下服役的美国老兵，一说到“我随着巴顿长征”，都仍然面有得意之色！

1944年6月6日凌晨，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声令下，诺曼底登陆战役打响了。此时，已奉命赴英国担任美国第3集团军司令的巴顿将军，却呆在远离战场的英国中部肯特地区，只能注视着战场局势的变化。炮声隆隆，战事正酣，巴顿心急如焚，然而，艾森豪威尔却命令他呆在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在我投入战斗之前，战斗就会结束。”作为一个屡建战功的军人，这种焦急等待的滋味实在难受。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让巴顿继续在英国按兵不动，是考虑到：巴顿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行动计划中的任务不是抢占滩头，而是向内地扩张战果，继续实施诱骗德军的“刚毅”计划，以分散德军的注意力。

巴顿将军于1944年1月到英国任第3集团军司令的同时，就兼任了设在多佛的并不存在的“美军第1集团军群”司令之职，任务就是实施迷惑德军的“刚毅”计划。巴顿的疑兵之计搞得相当出色，他下令集结了一支假的入侵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入侵司令部在肯特的假相，巴顿还经常在肯特市招摇过市。德国人上当了，以为盟军将在加莱海岸登陆，故在此集结了防御重兵，而恰恰忽略了诺曼底海岸，就在盟军发动诺曼底登陆的那天夜里，巴顿还让皇家空军散发了四处飘扬的、人们称之为“金属干扰带”的锡箔片，造成一支舰队正在第厄普附近海面向东驶去的假相，德国人所剩无几的海岸雷达站也受骗上当，误认为盟军的舰队已驶向加莱地区。

远在肯特，巴顿却非常关心“霸王”战役的推进。他清楚地看到“霸王”战役已到了关键时刻，盟军虽已在诺曼底站稳了脚跟，但进攻却已受阻，他的直觉告诉他，第3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刻已为时不远了。果然，艾森豪威尔对“霸王”战役的进展远远落后于计划而非常生气，尤其是7月2日看到讽刺蒙哥马利“一连串光荣失败”的报道后，便打电话给巴顿，要他火速赶到法国前线，准备投入战斗。

7月25日，“眼镜蛇”战役开始了。这个战役的主要内容是：集中大量的轰炸机对圣洛以南地区狭窄的正面实施最强有力的轰炸，然后以第1集团军的第7军实施突破，以求打破目前的僵局，整个计划的最终结果是使美军从科唐坦突围，突破库坦塞斯——科蒙防线，攻占阿夫朗什，为巴顿的第3集团军横扫布列塔尼的扩张战果行动打开局面。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集结，巴顿获难以美国第1集团军副司令的身份在“眼镜蛇”战役中赴第8军

督战，他以两个装甲师作为追击的先锋，先攻占库坦塞斯及其附近地区，随后夺取了阿夫朗什。在这次战斗中，巴顿强调不管两翼如何暴露，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向敌纵深挺进，结果第8军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变换不定的进攻方向使德军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两个装甲师的行进速度如此之快，就连美军也感到不可思议。德军第7集团军的几个主要指挥所在还未弄清情况时就被摧毁或是陷入“敌人的防线之后”。

8月1日，巴顿的第3集团军集结完毕并正式参战，隶属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为了充分发挥巴顿第3集团军的打击力，取得更大的战果，使希特勒难以找到巴顿，艾森豪威尔决定：第3集团军参战属于机密，部队不许发新的肩章标志，舆论界不得宣传第3集团军参战的消息，军界一定要守口如瓶。

在第3集团军司令部，巴顿致了祝酒词。他说：“我们将在今天中午12时正式投入战斗，你们长期忍耐和坚贞不屈地等待的这一伟大时刻即将来临。你们要记住一条座右铭，那就是：‘果敢，果敢，永远果敢！’我要的首要问题是前进，前进，永不停止！不管我们是从敌人的头上，脚下。还是从敌群中穿过去，请切记一条，那就是要一往无前。不要他妈的去为我们的侧翼操心担忧，我们必须警戒我们的侧翼，但不能舍此而无所作为。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去干‘固守阵地’的蠢事，我们要不断前进，揪住敌人紧紧不放，把它打得魂不附体。我相信各位先生会做得非常出色的。”

布莱德雷分配给第3集团军的进攻目标是攻占布列塔尼。巴顿仔细研究了战局，他看到德军因东线吃紧，已无更多力量来顾及法国战场，因而主张盟军应不失时机地修改战役目的，把主攻方向向左大转弯，将敌人挤到塞纳河畔的一只大口袋里，拉紧尚在挣扎的希特勒士兵脖子上的绞索；至于布列塔尼，只需派遣少量兵力去占领。艾森豪威尔支持巴顿的想法。

8月1日下午，巴顿按照自己心中的新方案命令第3集团军迅速行动起来，在快速通过阿夫朗什山口后，第8军以最快的速度向布列塔尼挺进，巴顿限定第8军在5天之内必须攻占布列塔尼半岛顶端的布雷斯特城。第3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向左大转弯全部转入东线作战。其具体部署是：第6装甲师和第79步兵师向布雷斯特挺进，第4装甲师和第8步兵师指向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进攻的矛头直指昂热和法国腹地。

当听到巴顿命令5天之内到达布雷斯特的消息时，布莱德雷、蒙哥马利和米德尔顿都认为巴顿简直是发疯了。他们认为让一个师孤军深入敌人腹地200英里，单枪匹马去夺取一个敌军实力不明的要塞，简直是无稽之谈，况且装甲师的左翼和后方会暴露挨打，而走得很远的装甲纵队和敌第7集团军主力之间没有盟军一兵一卒，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巴顿却认为，先头部队前进越快，效果越大，如果一举拿下布列塔尼半岛的意图是在装甲部队孤军深入，快速夺取布雷斯特的前提下实现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干净漂亮、出奇制胜的典范。那样的话，布列塔尼就可迅速拿下。

第6装甲师指挥官格罗是骑兵出身，曾经当过巴顿的作战处长，在战术思想上属于巴顿作战学派，接到巴顿命令他孤军深入的指令后，兴奋得手舞足蹈。他告诉他的参谋人员说：“我们从一位真正的骑兵那里接受了一项骑兵的使命。这一回我们可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世界上露脸了。”他即刻命令部队迅速行动，到8月3日，已推进到离布雷斯特只有100英里的卢

代阿克。

由于布莱德雷和米德尔顿的干扰，格罗的第6装甲师向布雷斯特特的进军被耽误了一天，被巴顿发现后才得以纠正，继续前进，但进攻的锐气受到了挫伤。更严重的是，尽管格罗日夜兼程，绕敌人快速前进，可也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24小时。在他走完余下的100英里的过程中，德军已把一天前还防务薄弱的港口加强了防御，这给美军的攻城战斗造成了巨大困难。8月7日，格罗部队到达布雷斯特后，立即展开了进攻。与此同时，伍德的第4装甲师按照巴顿的部署，在夺取雷恩后迅速攻占了瓦恩和洛里昂一线，使敌军处于毫无退路的境地，为全歼布列塔尼之敌创造了条件。

巴顿在这次战役中采取的“飓风式”作战方式，是布莱德雷可望而不可及的。巴顿在战役中的指导思想就是随机应变的作战，他分析情报机构所刺探到的特殊情报，充分利用敌人防御线上的缺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飓风式”作战方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牛的胜利，从而推动了整个战役的进程。而这些情报的收集全靠他的集团军情报队。

战役进行到此时，令艾森豪威尔以及盟军高级指挥官对巴顿不得不另眼相看，他们都理解了巴顿在战役初期就提倡的战役目标，决心对“霸王”战役计划进行全面修改，把目标放得更远一些。他们认识到巴顿关于美军只需派少量部队进入布列塔尼，其主力的基本任务是向东推进，扩大在欧洲大陆的占领区的战役观点是极有远见的。

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思想统一，使原先登陆后期没有章法的战役变得紧凑而有序，将士们的目标统一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特别是巴顿，在解除了长期以来的束缚后，终于舒了口气，从而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战术天才，使“霸王”战役后期的战事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霍奇斯将军的第1集团军对莫尔但地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德军精锐的第11空降军、第84军和第47装甲军进行拼死抵抗，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但在英国第2集团军发动的侧翼攻势的有力配合下，德军的右翼开始溃退，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巴顿立即发挥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和攻击性，迅速插进，长驱直入。8月6日，第3集团军第15军抵达马延河一线，第20军到达卢瓦尔河。第15军按照巴顿的命令，自东南转向东进军，攻占了勒芒，与友邻部队将勒芒以北的法莱斯地区的德军合围起来，为彻底消灭该地德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布列塔尼，第3集团军的第4装甲师于8月6日攻占了位临海滨的瓦恩——洛里昂一线，完成了切断布列塔尼德军退路的任务。在付出伤亡1万人的代价后，第3集团军终于攻下坚固的布雷斯特。德军在前有大军压境，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完全绝望了，有组织的抵抗再也不复存在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布列塔尼大部分地区便获得了解放，残余之敌犹如过街老鼠，仓皇逃进几座孤立的海港城市。8月6日晚，巴顿认为布列塔尼对“霸王”战役的新计划已经失去战略意义，便把肃清残敌的任务交给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自己抽出身来为下一场在法国腹地的战斗作准备。

8月9日，巴顿给第15军下了一道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命令：“将迄今在沿英吉利海峡一线与盟军对峙的德军赶至巴黎和鲁昂之间的塞纳河边。现将第5装甲师和第79、第90步兵师及法国第2装甲师划归第15军，以准备向纵深推进之用。第15军的使命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歼灭德军于第15军的前沿。”

该计划显示只有他的亲密部下们才能看懂的暗示语言：“准备向纵深推进”，即是说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不要停止前进，应继续向阿让唐挺进，挥师法莱斯，与来自北面的加拿大部队汇合；“歼灭德军于第15军的前沿”，即是说“围而歼之”。巴顿正在巧妙地利用他独特的指挥艺术，为德军布下一个天罗地网。

对巴顿的指令，第15军心领神会，马不停蹄地向阿尔让当进发。这是巴顿创造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有10万或许更多的德军被巴顿的计划围入了瓮中。如果把德军就地歼灭，敌人就不可能再到别的地方去作战了。战争本身就不光限于占领土地，更重要的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巴顿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不能再受战争教条的束缚，不管有没有蒙哥马利还是布莱德雷，有没有战区界限，他拿定主意，决定自行其是。他对第15军说：“甭管蒙哥马利的什么战区界线。作好准备，在必要时，一直打到法莱斯的那一边去。我会下达命令的。”

巴顿的这个天才计划由于蒙哥马利的反对、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的礼让以及英国、加拿大军队的延误，未能完全实现，部分德军得以逃出法莱斯包围圈，但毕竟实现了大部。事后，布莱德雷对他的失误悔恨不已。

8月间，盟军神速地越过法国，这一进军公认应归功于巴顿的英勇和机智。他不断地前进，从不犹豫踟蹰。在解放法国的战争中，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城夺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由于保密等原因的限制，巴顿及其第3集团军始终是以保密的身份参加作战的，各级战报和新闻报道均不得提及他们的名字。巴顿对这个问题满不在乎。8月31日，巴顿指挥第3集团军强渡马斯河，进占凡尔登、逼近梅斯，巴黎终于被解放了。战斗从此进入德国的心脏地区。

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攻，突破美国第1集团军防线，企图攻占列日和安特卫普。巴顿根据有关情报，判断出德军的反攻方向，作了相应的计划和处置。22日，巴顿部从南往北对德军翼侧发动进攻，以1个步兵师加强卢森堡东北的美军，以1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驰援被围的巴斯托尼美军。在解除巴斯托尼的围困之后，巴顿部直接威胁德军的后方战线。1945年1月，北线盟军反起反攻。巴顿的北翼部队完成对萨尔河和摩兹尔河三角地带的清剿，攻克德国的特里尔市；南翼部队则推进到莱茵河畔，肃清河西的德军。随后即发起了向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和美因兹挺进的攻势，歼灭德国2个集团军大部，俘敌8万多人，突破齐格菲防线。

当占领美因兹后巴顿应邀参加莱茵河桥通车典礼并主持剪彩。剪彩时，他拒绝使用大剪刀，叫嚷“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裁缝师傅吗？”“他妈的，给我拿把刺刀来！”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巴顿和他的第3集团军的功绩被公开，巴顿立即成为广泛传播的英雄。而此时，惯于征战的巴顿受命兼任巴伐利亚军事长官，顿时感到孤独和疲乏，以致引起了关于纳粹党与美国的共和、民主党并无太多区别的轩然大波。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顿不是政治家而只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尤其是诺曼底登陆之后的军事行动，使他赢得了部队和群众的爱戴，敌人的尊敬，以及军事天才的美名。

巴顿将军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军人之一，也是古今世界名将之一。他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对于攻击具有强烈的信心，他比当时的大多数

指挥官更能将其本人的强烈进攻意识灌输到部队中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顿在北非、西西里和欧洲战场上有每战皆捷的纪录，使他在生前即已饱享盛名，赢得传奇人物的地位，而在死后，更成为美国历史中的民族英雄。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而进攻则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并且是积极的手段。任何兵书都对进攻之法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巴顿有一句名言，“不要让恐惧左右自己”。他注重对情报的收集和研究，然后以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发动“飓风式”的进攻，使敌人无法防备，从而使他的部队能千里转战，所向披靡，创造了许多令人惊异的战争奇迹和赫赫战功，战争讲究“兵贵于速”，神速而勇猛的进攻可以说是战无不胜的。

苏军攻克柏林 欧战胜利结束

1945年4月16日至5月2日，苏军向德国首都柏林发动了强大的进攻。经过17天的英勇奋战，歼灭敌军近100万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500架、坦克1500辆、各种火炮1万余门，使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帝国彻底覆灭。希特勒在柏林彻底惨败时在柏林地下室统帅部自杀。柏林战役是苏德战争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次战役对于结束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确定德国的战后体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苏联卫国战争史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场直捣希特勒老巢的最后一战的经过及其谋略是如何的呢？

1944年，欧洲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年，苏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战略性突击，粉碎了列宁格勒及诺夫果罗德附近地区、德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克里米亚和敖德萨、卡累利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境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军，摧垮了德军由巴伦支海至黑海的整个战线，肃清了苏联国土上的法西斯德寇；在各国民民主力量配合下，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全境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大部领土，以及挪威的北部，战争直接向德国境内延伸。1944年战局结果表明，苏联战时经济迅速发展，武装力量空前强大，单独对德作战，已经能够取得完全胜利，美、英当局，鉴于苏军进展迅速，德军节节败退，东部战线日益西移，罗斯福、邱吉尔乃与斯大林共同商定，于1944年6月由美军和英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德军处于东、西两条战线的夹击之中。希特勒为摆脱困境，决定把东线作为决战地区，集中了200个师对付苏军，而在西线只配置了15个师的兵力。因此，美英远征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时，未遇到顽强的抵抗，不久就把德军从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赶了出来。

这样，苏军和美英盟军的下一个目标都是德国首都柏林，一场争夺对希特勒老巢的占领的竞赛开始了。

美英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这场竞赛信心十足，他知道德军在西线的防御较之东线薄弱得多，盟军自可轻易获得竞赛的胜利，先于苏军到来之前拿下柏林。他在1944年9月15日写信给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说：“很明显，柏林是主要战利品。……我的愿望是：采取最直接最迅速的路线，用美英联合兵力并在其他适当部队的支持下，通过关键性的中心城市，占领两翼的战略地区，向柏林挺进。”然而，艾森豪威尔的估计是太过于自信和乐观了。

德国统帅部为了瓦解反法西斯同盟，迫使美英政府与其单独媾和，以便改变两线作战的压力，巧妙地利用了美英联军的自信与轻敌。在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亚尔登地区拼凑了20个师的兵力，突然向美英联军发起进攻，联军猝不及防，仅一周时间，德军就向西纵深推进60英里，深深楔入美英防线，进入安特卫普，造成美英军队的第二个敦刻尔克失败。美军第1军团伤亡10万人，英军亦损失惨重。联军形势不妙，邱吉尔不得不急电斯大林，向其求援。

苏联为了支援西线盟军，斯大林下令把原计划于1945年1月20日发动的进攻提前了8天。1月12日，苏军从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在长达1200

公里的战线上，以5个方面军150个师的兵力，全线向西突进。连续实施了维斯拉河——奥得河、东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等重大战役。苏军的进攻，迫使希特勒不得不把13个战斗力最强的师，其中包括6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800多辆坦克以及其他大量武器从西线调往东线，从而减轻了西线盟军的压力。西线盟军经过十几天苦战，终于在1月28日把德军赶回德国边境，恢复了原来的战线。而在苏军的西进战役中，40天的战斗共毙伤德军80万、生俘35万，击毁和缴获飞机3000架、坦克4500辆、各种火炮13000门。苏军向西挺进了570公里，离柏林只有60—100公里了。

这场战役打乱了盟军的进军时间表，使他们的计划推迟了6个星期，从而使美英军队企图抢在苏军之前到达柏林的计划成为泡影。当苏军距柏林只有60公里左右，并已作好攻打柏林的准备时，盟军距柏林尚有480公里。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存实力，减少牺牲，艾森豪威尔遂将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改为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放弃了对柏林的争夺。4月19日，美军占领莱比锡；25日，美军第1军团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120公里的易北河岸的托尔高与苏军会师，这就是著名的易北河会师。

此时，苏军已经进抵奥得河，开始了攻克柏林的准备工作。苏军进攻柏林，其政治目的是：完全粉碎法西斯德寇，迫使希特勒无条件投降；其军事企图是：在突破奥得河——尼斯河防线后，随即合围德军柏林集团及法兰克福——古本地区的集团，各个歼灭，最后攻占柏林。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对反法西斯的最后一战是早就作了精密的准备的。还在1944年11月，苏军总参谋部即着手拟制柏林战役计划，航空兵先后6次拍摄了德军防御地区的照片，各部队不断组织侦察，为最后确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于1945年2月间，在库斯特林附近奥得河西岸，抢占和扩大了一块宽约50公里的登陆场，这为苏军的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各级后勤部门，赶修道路、桥梁，运送兵员、物资。通讯、工程部队，亦出色地完成了准备工作。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按照斯大林于1945年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增强战斗意志、夺取最后胜利的指示，深入进行了思想动员，整个部队情绪饱满，斗志昂扬。

参加柏林战役的苏军，为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共有20个合成集团军、4个坦克集团军、7个坦克独立军、2个机械化军、4个航空兵集团军，总计约250万人，有火炮、迫击炮416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6300辆，飞机8400架。和德军相比，兵力为德军的2.5倍，坦克为德军的4.1倍，火炮为德军的4倍，在兵力、兵器上，都占显著优势。

由朱可夫将军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占领柏林以东奥得河东岸至尼斯河口一线，担任直接夺取柏林的任务，其进攻正面宽约175公里。该方面军以5个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组成突击集团，在库斯特林附近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直指柏林。左右两翼各以2个合成集团军，实施辅助突击，从南北两面迂回，右翼在柏林以西格特增——波茨坦地域，左翼在柏林东南邦斯多尔夫地域，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会合，完成对柏林守军及法兰克福——古本地区德军的合围。

由科涅夫将军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占领尼斯河口至苏台德山一线，其进攻正面宽达300多公里。该方面军以4个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组成突击集团，向福尔斯特、施普伦堡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粉碎柏林以南德军集团。从南面迂回柏林，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会合，完成对德军的

合围。另以 2 个合成集团军，向德累斯顿实施辅助突击，保障主要突击队的左翼。

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占领奥得河上游至波罗的海一线，牵制并歼灭柏林以北德军，其进攻正面达 140 公里。该方面军以主要兵力，向格柳恩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切断德军坦克第 3 集团军与柏林守军的联系，予以围歼，然后向西和西北进攻，保障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

以上部署及进攻准备，苏军在 1945 年 4 月上半月均已完成。

此时，希特勒预感末日来临，意识到整个战争和法西斯制度的结局将取决于柏林战役的结果。他像头垂死挣扎的野兽一样，在“两雄相衡取其轻”的考虑中，认为即使失败，也宁可让柏林让给美国人，绝不能让俄国人占领。他和他的谋士们还认为同盟国社会制度和国内情况不同，利益各异，迟早会发生战争，而这种事变对未来战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德军统帅部一方面加紧与英、美谈判媾和，同时准备单方面向美英联军投降，主动退出了西线中部地区，为美英军队打开了通向柏林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全力加强东线防御，在奥得河到柏林之间构筑了三道防御圈，纵深 20—40 公里；围绕柏林城又构筑了外层、内层和市区三道环形防线。希特勒在东线拼凑的总兵力为 48 个步兵师、9 个摩托化师，6 个坦克师，还有许多其他部队和兵团，共约 100 万人，再加上火炮和迫击炮 10400 门、坦克和强击火器 1500 辆、作战飞机 3300 架。妄图以此阻止苏军推进，作困兽之斗。

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军队鉴于时机成熟，故改变放弃柏林的计划，于 1945 年 3 月底恢复了进攻，渡过了莱茵河，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其先头部队急速向易北河推进，企图先于苏军占领柏林。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军统帅部，面对这种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正确而果断地及时组织实施了柏林战役。在苏军各个部队里，各级指挥员都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动员，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苏军士气高昂，誓死为消灭法西斯而战斗到底，军营里到处都回荡着振奋人心的口号：“打到柏林去！”“回祖国的道路只有一条——经过柏林！”

希特勒要死守，苏军要强攻。这就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柏林战役一定是很激烈的。

4 月 16 日凌晨 5 时，苏军对柏林的总攻开始了。几万门大炮同时轰鸣，把大地也震得颤抖起来。炮火之猛烈使德军在半小时内未能回击一发炮弹。5 时半，苏军坦克和步兵发起冲击，140 多部大功率的探照灯把进攻的地面照得如同白昼，德军在强光的照射下，睁不开眼睛。苏军乘机迅速前进。但进至两公里后，遭到德军的拼命反抗，进攻速度便大大慢了下来，直到 4 月 19 日晚才完全突破奥得河的一道外围防御线，攻占了奥得河畔被称为“柏林之锁”的泽劳弗高地，打开了直接进攻柏林的大门。

4 月 19 日以后，战斗进入合围和分割德军的阶段。20 日下午 2 时，苏军逼近柏林防御圈。21 日，第三突击集团军、近卫坦克第二集团军、第 47 集团军所属各部突入柏林城郊，开始了城市交战。25 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柏林西边的波茨坦胜利会师，终于完成了合围德军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截断了美英军队进入柏林的道路，使希特勒企图与西方单独媾和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4 月 26 日后，柏林战役进入歼灭被围德军的阶段。苏军对企图突围的德军使用坚决歼灭的手段，在敌军可能突围的道路上加强防御，不让德军逃跑。

苏军进入柏林市区后，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每条街道、每幢房屋，都是通过强攻后才占领的；有时一天要消灭近 300 个街区的敌人。在柏林的地铁隧道中，在各种地下交通设施和通道内，到处都出现了白刃格斗。29 日，战斗达到了高潮，苏军开始进攻象征德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大厦。夺取这座大楼的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都要经过战斗。30 日，两名苏联士兵终于将胜利的红旗插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这天下午 3 时，困守在深达 50 英尺总理府地下室内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看见大势已去，开枪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5 月 2 日下午 3 时，德军完全停止了抵抗，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将军率守军残部投降。5 月 8 日 24 时，在柏林举行了德国投降签字仪式。参加签字的苏方代表是朱可夫元帅和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是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和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代表德军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空军上将什图姆普弗。签字仪式由朱可夫主持，投降书从 1945 年 5 月 9 日零时开始生效，法西斯德国宣告灭亡。

5 月 9 日，斯大林发表了广播演说，宣布欧洲战争的结束。苏联人民、欧洲人民以及一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莫斯科专门以 1000 门大炮鸣礼炮 30 响，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

柏林战役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战前和战役过程中的军事、政治形势，都很错综复杂。美、英当局，开始消极观战，阿尔登战役失败后，又急电苏军求援，而当苏军兵临柏林城郊、希特勒与其秘密谈判并开放西部战线后，美英军队又长驱直入，企图抢先占领柏林。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统帅部，正确分析和处置了复杂的斗争形势，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苏德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的胜利。苏军进攻柏林的战役计划，是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战前进行了周密的侦察，掌握了大量实际情况。这一作战计划的主要谋略即是集中 3 个方面军的优势兵力，在突破奥得河——尼斯河的德军防线后，同时合围法兰克福——古本集团与柏林集团，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最后夺取柏林。苏军注意了与美英联军的协调，当盟军处于不利时，予以了坚决的支持；当希特勒拟与盟军单独媾和甚至将柏林交于盟军时，苏军又果断地发动战役截断德军与盟军的联系，这种以军事手段完成政治目的的谋略，是柏林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突出之点。

同盟国联合进攻 小日本宣告投降

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两大战场进入了最后决战阶段。在欧洲战场上，苏军先后解放了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奥地利、南斯拉夫等国；与此同时，美、英在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场，将德军赶出了法国和比利时，并进入荷兰，推进到德国西部边界，使法西斯德国陷入两条战线的强大夹击之中。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连战连败，美军先后攻占了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吕宋岛，切断了日本从印尼到本土的海上运输；在中国战场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在华北、东北、华南、西北地区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主力，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德国法西斯在1945年5月被彻底打败后，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也为期不远了。

早在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就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讨论过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和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问题。1944年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宣告德国法西斯的败亡已为期不远。在这种形势下，1945年2月，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迅速灭亡，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又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会上除讨论了彻底击败德国法西斯的计划等问题外，还同时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雅尔塔协定”所达成的关于美、英要求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和苏联答应在远东对日作战，除了共同希望迅速击败德、日法西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积极因素外，苏、英、美三国实际上都包含着各自的私心。从美、英方面来说，日本在远东战场虽连遭失败，但它仍不打算放下武器，积极准备在本土与美国作战。美、英集团对迅速战胜日本既缺乏信心，又害怕付出更大代价，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从苏联方面来说，感到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但它仍在本土、中国东北和朝鲜集结着强大的陆、海、空军主力，直接威胁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为迅速解除日本的侵略威胁，苏联也希望迅速消除这个战争策源地。同时认为德国投降之后，日本的处境将更加孤立，国内由于长期战争，经济困难，民心涣散，军心动摇，此时苏军挥师东进，有可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

苏联同意参加远东对日作战，是开出了条件的，即它不是无偿作战，而是有代价的。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协定中规定，苏联对日开战有6个条件；即：维持外蒙古的独立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的一切岛屿划归苏联；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优越权；千岛群岛交还苏联。这些条件，除了涉及日本的外，大部分都是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而当时由于美、英急于要苏联出兵对日开战，竟同意了以上条件。

1945年5月，欧洲战场胜利结束，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在中国军民和盟军的猛烈打击下，远东战局也急转直下，虽然日本军方仍狂吠打到底，但长年战争，已使日本国力消耗殆尽，德国的彻底失败更使日本陷于绝境，支持战争越来越困难了。

还在 1945 年春，日本铃木内阁就曾提示内阁书记长官迫水秘密地对日本资源情况作一番调查，看看日本是否还能继续把仗打下去。于是，便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局，人员包括内阁计划局、外务省、大藏省、军需省以及海、陆两军的军职和文职专家。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 10 万吨，比官方的估计少三分之二；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三分之一；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削弱 50%；船舶总吨位已只有 100 万吨；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迫水的报告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将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迫水的报告还表明，国民食物的供应，由于粮食作物的减产已降到最低限度。虽然政府制定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的居民要完成收集 500 万石橡子的任务，但由于食物严重不足，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已降到 1500 卡路里以下，只有日本人以前最低标准的三分之二。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跑到乡下去换白薯、蔬菜和水果。

迫水的调查报告在 5 月初呈送给日本由首相、外相和军方 4 个首脑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即“核心内阁”。由于迫水报告的含义是无可辩驳的，在 5 月 12 日举行的“核心内阁会议”上，海军大臣米内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然而遭到了军方的反对。

为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兵器，对日军在太平洋所占的各岛屿发动逐岛进攻，使战争向日本本土发展，并同时依靠强大的空中优势，对日本本土的工业城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使它的城市一个个化为灰烬。美机在 5 月中旬对日本工业中心的轰炸，使东京有 34.2 平方英里的面积被焚。5 月 23 日下午，562 架 B—29 轰炸机再次飞临东京上空，将包括工业区和居民区在内的东京港西侧地带炸成废墟；36 小时后，502 架“超空中堡垒”又飞来轰炸东京的心脏，投下 3262 吨燃烧弹。4 天以后，美机又把矛头转向日本的第五大城市横滨，当 517 架前来空袭的飞机飞来后，该市 85% 的地方已成一片火海。把东京、横滨地区炸成废墟后，B—29 轰炸机又集中炸大阪和神户两市，不到两个星期这两个城市便被摧毁。

然而，即使如此，日本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及其死党，仍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然狂妄地叫嚷要“血战到底！”在 6 月 6 日举行的“核心内阁”会议上，穷兵黩武的军令部总长丰田狂叫：“即使日本国厌战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陆军大臣阿南喊道：“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我们就应该切腹，真诚谢罪！”而看问题比较实际一些的外相东乡却挥动着迫水的报告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继续进行战争。”“核心内阁”会议最后决定争取实现所谓的“体面和平”。

所谓“体面和平”，是日本一厢情愿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的“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是：如果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其占领权，放弃对所有占领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将主动撤出在这些地区的日本武装力量……”在这个“和平”计划内，丝毫也看不到认罪的成分，甚至对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造成的灾难，也没有表示：“遗憾”，而是以战胜国的姿态提出的。为实现这个计划，日本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身上。

6月21日，美、日双方历时83天的冲绳战役正式宣告结束。在战役中，日本不仅丧失11万陆军，使20万居民死于非命，而且输掉了在日本本土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日本不得不加紧推行“体面和平”计划。

6月24日，日本外相东乡令广田拜访苏联大使马立克。因情况已很紧急，广田抛弃了外交辞令，开门见山地要求用日苏新约去代替即将到期的中立条约。马立克却冷淡地说，第一个条约还没有到期，没有必要再搞一个新条约。在绝望之下，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铝和钨去换苏联的石油。他说，“如果苏联陆军和日本海军联合起来，日本与苏联加在一起就将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但是，马立克对此毫无兴趣。日本的幻想破灭了。

就在日本加紧活动要苏联出面调停和订立所谓“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就结束对日作战和有关对日的战后处置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予以公布，这就是《波茨坦公告》。当时的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讨论，但在公告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了字，所以这实际上是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是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要求“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入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统治，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宣言说：“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同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宣言最后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最后通牒，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法西斯集团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欲进行垂死挣扎，因而对《波茨坦公告》采取极不认真、置若罔闻的态度。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他们仍幻想通过苏联或其他什么国家调停，实现所谓“体面和平”。所以，要使日本法西斯真正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举手投降，反法西斯同盟国还要在军事上作最后的斗争，对日本侵略者实行严重的打击。

从7月27日到8月1日，盟国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了150万张传单和300万张《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它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袭击。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任何迹象。这样，继罗斯福之后的杜鲁门政府，便按着原定计划，不顾日本平民的生命，悍然于8月6日、9日分别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两颗原子弹对加速日本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战局还不是决定的因素。

8月8日下午11时（莫斯科时间为下午5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亲自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8月9日零时之后，苏联红军百万雄师，在远东军队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兵分四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和中苏边界，对日本的精锐之师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苏联的四路大军共有80个师、4个坦克机械化军、6个步兵旅、40个坦克机械化旅，总计157.7万人，此外，还

有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黑龙江分舰队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苏军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权作战飞机就有 3400 多架，坦克 5500 多辆。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日本关东军，形成了强大的攻势。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整个远东战役中，苏军共击毙日军 83737 人，俘敌 59.4 万人，缴获大炮 1565 门，坦克 600 辆，飞机 861 架以及许多轻武器。苏军的进攻，使日本法西斯妄图依恃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土地进行最后负隅顽抗的计划彻底破灭了。

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区各战场，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总反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发生根本的转折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即由战略相持阶段胜利地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继 1944 年局部反攻的重大胜利之后，1945 年中共毛泽东主席就提出“削弱日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以更大的规模对敌寇发动进攻，使局部反攻不断向总反攻发展。到 1945 年春，中国解放区的正规部队已增加到 91 万人，民兵发展到 225 万人。全国解放区已增至 19 个，总面积达到 95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1 亿。解放区已成为打败日本，解放全中国的主要力量。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中国的反攻，美国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和对日本本土的猛烈轰炸，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溃败。8 月 10 日，就在苏联出兵和美国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的第二天，日本外相亲自访问苏联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政府已准备无条件投降。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终于被彻底打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告结束。在对法西斯的这最后一战中，中、苏、美三国的军队及其他亚洲国家携手合作，采取了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融军事、政治、外交于一体的凌厉攻势，使日本法西斯难以招架，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所有的军事手段中，美军的逐岛进攻，将战争推向日本本土，对日本工业中心的狂轰滥炸，以及两颗原子弹的投掷；苏联百万大军击溃约占日本陆军总兵力四分之一的精锐之师关东军；中国军队在中国各个战场对日军发动的战略大反攻，都对日本法西斯起到了沉重的打击作用。在此基础上，配合政治攻势，宣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及如苏联公开对日宣战这种外交攻势，使日本法西斯必然处于一种“四面楚歌”的境地。尽管穷兵黩武的日本军方一再拒绝投降，并欲以日本本土和全体日本国民的生命为与同盟国决战的资本，然而，“四面楚歌”的状况使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除了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已没有其他选择。

毛泽东“寸土必争” 刘伯承“围城打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长期遭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处于极大的欢乐中，人们欢天喜地地迎接和平，庆祝胜利。可是，人民厌倦战争、希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隆隆炮声震得破灭了。为了和平，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毛泽东的壮举，已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无疑是给以和谈为烟幕，积极备战和抢夺地盘的蒋介石将了一军。蒋介石并不打算谈判，毛泽东亲到重庆实大出预料，蒋介石只得一面对谈判一再拖延和阻碍，一面调动36个军、73个师，向解放区大举进兵，企图尽快控制华北和华东的战略要地，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抢占东北，以强大的军事压力，逼迫中共在谈判中屈服。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的阴谋，就有充分的估计。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就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8月26日，毛泽东动身去重庆的前两天，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又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历史的发展果如毛泽东的预料。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之时，一面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密令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向晋东南解放区大举进犯。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阎锡山部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即率1.7万余人，由临汾县的东张镇出发，分两翼向晋东南的上党地区进犯。8月21日，侵占长子；23日，侵入屯留、长治；25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

敌占上党，用意十分险恶。从整个战局看，蒋介石令第一战区胡宗南发兵渡黄河北上，迅速打通同蒲路，与阎锡山南北接通，然后沿正太路，进驻平、津，占领华北，令十一战区孙连仲以3个军集中郑州，准备沿平汉线北进；令第十战区李品仙以3个军向徐州前进，准备沿津浦路北进。他们企图夺取东北，掠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并以此迫使我党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更大的让步。从局部看，阎锡山妄想以一把刀子插入上党，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然后把共产党军队的主力逼到山区消灭。

国民党军进占上党后，蒋介石是得意的。当重庆谈判陷于僵局时，蒋介石亲自出马，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他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即毛泽东），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蒋介石自恃军力雄厚，有807万大军，未把共产党领导的100多万军队放在眼里。

毛泽东可不是软骨头，一生喜欢迎接挑战，一生不怕威胁，他在第二天见到蒋介石时，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他说：“现在打，你是力量强大些。但是这没什么关系！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你占领城市，我占领乡村，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为了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支持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进行上党战役。当时，共产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担心上党战役是否会影响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邓小平十分有把握地告诉他们：“我们上党战役打得

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我党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战前，刘伯承认真研究了此次战役的特点，精心起草了《上党战役中的几个战术问题》的指示，发往各部队。当时，初次集中的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分区的主力虽多数是老部队，但过去都是作为骨干团分散到各军分区作战的，编制不充实，装备较差，整个参战部队只有6门山炮，新战士多使用大刀长矛；而阎锡山所投入的史泽波军是主力部队，装备齐全，长于防御，且据守着日军多年修筑的坚固工事。因此，刘伯承在指示中指出：消灭这部敌人，将是一个艰苦的战役任务，主要是进行许多城市的战斗，也要进行野外战斗（运动战），他详细地写出了“城市战斗的战术指导”和“野战（运动战）的战术指导”，并告之各级指挥员应切合任务、敌情、地形，实行战斗指挥。

刘伯承整个作战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围城打援”。他计划以一部兵力逐个夺取长治周围的各城，以主力配置在长治之敌可能出援的地区，准备打敌援兵；然后再攻取长治，并准备在攻取长治时打击可能从太原来援的敌人。

1945年9月7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下达了发动上党战役的作战命令。随后，立即在潞城地区的黄碾庄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相继作了重要指示和部署，确定上党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运动战、攻坚战……。决定了第一步先夺取长治外围地区，诱敌主力由长治出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再攻打长治的战役总方针。具体部署是：以太行集团先攻占屯留，再以太岳集团攻占长子，以冀南集团攻占潞城、壶关。三大集团实施攻城作战时，各以主力配置、集结于机动位置，随时准备合歼长治出援之敌；以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配合主力集团围困各城。

9月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打响了。太行部队以主力攻打屯留，另有两个团攻打壶关；太岳部队以主力攻打长子；冀南部队攻打潞城。在刘、邓军队攻打长治周围各县期间，长治守敌于9月11日、12日连续两次出动6000余人试图向屯留增援，都因害怕被歼，伸出一下马上缩了回去。

太岳部队攻打长子城。三八六旅领导刘忠与张祖谅决定，以独立团为佯攻兵力钳制东门守敌；以七七二团攻打北关，尔后伺机占领城楼；集中二十团、三十八团作为攻城主力，从长子西关攻击突破。9月13日，担任佯攻的独立团和攻打北门的七七二团首先发起战斗。在刘、邓军队的连续强袭攻击下，敌人支撑不住，于当日下午溃逃城内。太岳部队立即围住长子，并开始各种攻城的准备，在旅工兵分队的配合下，抵进爆破的坑道作业推至城墙之下，各种登城器材也准备完毕。

一切准备就绪后，9月18日晚7时许，在10来分钟的炮火准备后，总攻击开始了。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地开始哆嗦、颤抖，长子西门城楼在一阵猛烈的摇晃中似乎立即要坍塌下来似的，一个巨大的缺口出现在城墙上。敌人还来不及收住猛烈爆炸后的惊魂，攻城的火力急袭又开始了，山炮、迫击炮、小炮、轻重机枪组成的一道密网似的火力压向敌人。扛着云梯的战士们飞快跃出掩体，踏着战友们已经架好在外壕沟上的木板，不顾在身边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弹片飞旋、刺鼻的硝烟，将云梯架好在城垛上。随着嘹亮的冲锋号，二十团、三十八团的战士们从掩体群跃而出，争先恐后地踏上炸开的缺口，猛攻城楼。敌人遭两面夹击，顷刻间就溃不成军，举手投降了。

又经过一番巷战，阎军挺进二纵队司令部被攻占。到翌日2时许，全歼长子城守敌，共计毙伤敌军300余人，生俘敌二纵队司令白映瞻以下官兵1500余人。

与此同时，太行、冀南部队也先后攻下了屯留、壶关、潞城、襄垣。9月20日，三路大军齐集长治城下，合围长治之敌。

长治守敌阎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带领本部1.1万余人据守长治，妄图凭借高壁深壕的地形及日寇盘踞时所经营的一套坚固工事体系困守此城。合围部队猛攻长治并夺取北关后，史泽波恐慌万状，昼夜急电阎锡山告援。阎锡山当然不甘心丢掉上党地区，遂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二十三、八十三两个军外加炮兵两个团共2万余人，星驰长治增援。

刘伯承、邓小平围长治的目的就是吸引敌军来援，以便歼灭援军。得知敌人援军出动，立即变攻城为打援，下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困长治，主力分两路隐蔽北进，歼灭来援之敌。

阎军援兵沿白晋公路长驱南下。9月30日行至虢亭镇，忽然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虢亭至屯留的南大路向南挺进。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令北进部队挺进于虢屯公路两侧，准备钳击敌援军，而以十七师和独立支队尾击援敌。10月2日，刘邓军主力预期与敌援军遭遇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之线，刘、邓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迂回，同时尾敌前进部队向南展开攻击，将敌人合围于老爷岭、磨盘脑地区。

10月4日，刘伯承以陈锡联率太行主力一部向老爷岭以东迂回，攻击并切断敌四十七师与彭毓斌所率主力之间的联系；以陈赓率太岳主力一部，在冀南军分区主力一部的阻援配合下，乘敌四十七师立足未稳，抢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敌四十七师在伤亡过半的惨状下，只得放弃阵地北窜逃跑。

四十七师的溃败使彭毓斌胆战心惊，他一面指挥各残部与继续攻击的刘、邓军作战，同时打起撤退逃跑的主意。尽管阎锡山又增派了一个军外加一个团的兵力来援，也不能动摇彭毓斌放弃增援长治而北逃的决心。彭毓斌打仗虽然不行，但与国民党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对于如何逃跑还是颇有研究的，这次也煞费了一番苦心。他命令一小部敌军坚守阵地，在抵抗我军进攻的同时，向南佯动，企图给我军造成他要继续南进增援长治的错觉，从而掩护他率主力逃遁。敌军的这些花招很快就被刘、邓军识破，陈赓急令总攻的太岳部队由进攻转为追击，同时将敌情变化飞报刘、邓。

刘伯承立即改变部署，令太行、冀南参战主力迅速加入追击。三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在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这“三陈”的指挥下，沿白晋公路对敌两翼实施平行追击。10月6日，三路大军将逃敌包围在襄垣以西的虢亭附近。成了瓮中之鳖的逃敌虽然还能做点无济于事的零星抵抗，但经我各部队一发冲击，遂溃不成军，除了腿长的还在四散逃跑外，余敌皆纷纷缴械投降。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亦挤在四窜的逃跑者之中，在自相践踏的骚动里，死于乱军之下。敌2万余人的这支增援大军全部被歼，敌副总指挥兼炮兵司令胡三余、四十六师师长郭溶、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等人，均被刘、邓军活捉。

在彭毓斌的两个军即将被歼的时候，阎锡山从太原给困守在长治的史泽波发一密电，内称“上党必争，长治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灭”，为长治城里的孤敌打气。史泽波一直期待着援兵来解围救命，并且组织“敢死队”，拼命突围达17次之多。刘、邓军打援战斗的胜利结束，使史泽波慌了手脚。

阎锡山听到彭毓斌部被刘、邓军全歼的消息后，一时如五雷轰顶，再想继续派兵增援，明知不过是步彭毓斌的后尘而已。又急又怒之下，只好电令困守长治的史泽波弃城突围。眼巴巴望他派兵去救的史泽波正恨不得早点接到这个命令，遂于10月18日弃城西逃临汾。

然而，这一切早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意料之中。当史泽波的逃跑行动刚开始，立即就受到刘、邓两支精锐部队的追击；围困长治的部队，亦立即按刘伯承的部署，从逃敌的侧后翼实施追击；刚刚结束了围歼彭毓斌部的刘、邓军主力部队，也顾不上恢复连日作战的疲劳，立即掉头南下，发扬刘、邓军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从东北方向钳击逃敌。刘、邓军各部经过昼夜兼程，翻山越岭的长途追击，终于在沁水地区将史泽波部全部歼灭。

10月12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1个步兵师，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敌军，缴获无数和生俘阎军史泽波、胡三余等将级军官27人。

上党战役打得好，在重庆的蒋介石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署了，表明重庆谈判毕竟取得了一定成果，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的某些意见，承认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这是毛泽东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刘伯承、邓小平以军事手段粉碎蒋介石进攻支持重庆谈判的政治、军事均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结果。

上党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也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充分肯定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在肯定刘伯承、邓小平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后，毛泽东风趣地谈到了这次刘伯承、邓小平与阎锡山针锋相对的行动：“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了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就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是解放战争的第一仗，由于刘伯承等人的正确果敢、机动灵活的指挥，此仗打得干脆漂亮，大获全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上党战役的胜利，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共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正确谋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签定《双十协定》。这一战还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巩固了解放区的后方，加速了中共军队由游击兵团向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的转变。刘伯承、邓小平在具体指挥上党战役时，在“围城打援”这个基本谋略的基础上，还运用了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诱敌出援，集中优势兵力，佯攻等等谋略，而所取的战绩也是极其辉煌的。

暂弃延安“人地皆存” 诱敌深入“七战七捷”

当 1947 年的春天即将到来之际，蒋介石将对解放区的进攻重点转向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解放区。其狂妄的目的就是妄想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逐出西北，并配合其在山东战场的攻势，打通津浦路、平绥路，然后东西两翼军队夹击华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师张家口和山海关地区，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解放军完全割开，再实行各个击破，为达此目的，蒋介石在这里前后共投入了胡宗南部队及宁夏、青海、榆林地区的部队共 34 个旅、23 万人的兵力。而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兵力只有 2 万多人，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敌人自以为胜券在握，3 月 20 日，陈诚代表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就狂妄地宣称：“余曾有言，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但过去是因和谈关系，国军多是挨打”，今后“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而战争的无情结果却大大嘲笑了这一狂妄的宣称。

当 1947 年到来的时候，蒋介石深知他对解放区所发动的全面进攻战略已经失败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发动全面进攻战略了，他不得不改变战略方针，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有两个：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驻地。蒋介石决心要占领陕甘宁，占领延安。他认为攻占延安可以实现其“摧毁共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目的。

2 月 28 日，蒋介石把他的得意门生、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至南京，面授机宜。胡宗南从 1938 年秋后即奉蒋介石之命。脱离抗日前线，率第 17 军团驻防陕甘地区，名为防日军西渡黄河，实为包围和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后胡宗南升任国民党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长官，其部队也由数万人扩充为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蒋介石让他的这支嫡系军队一直养精蓄锐，就是为了选择某个时机对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解放区来个“犁庭扫穴”的大行动。他命令胡宗南：“本党三中全会就在 3 月中开幕，无论如何要在三中全会开幕前，拿下延安！”

胡宗南受命，立即赶回西安，加紧调动和集结部队。3 月 10 日，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作战命令。命令要求进攻延安的 16 个旅于 3 月 13 日晚 6 时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14 日拂晓攻击前进。此时的胡宗南志得意满，信心十足，扬言三日内占领延安，要建立奇功，向世界告捷。两天以后，胡宗南开始进攻了，他以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乱炸，同时以其第一和第二两个整编军共 16 万余兵力，由董钊、刘勘率领，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之线出动，采取钳形攻势直扑延安。

面对国民党的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积极行动起来，决定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然而，仗还未打，就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全部撤出，留空城一座。

当时有许多人对放弃延安大惑不解，很不愿意。毛泽东就耐心地说明必须撤走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指挥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敌人有 23 万，我们才两万多。两万多人要消灭 23 万人，是有困难的。

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极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大家理解了撤离延安的战略意义，决心在西北战场与强敌周旋。

按照军委建制，陕北的部队统归联防司令部领导，司令员是贺龙。但当时贺龙正忙于处理晋绥问题，一时赶不回陕北，严酷战争又即将开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主动请缨，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组织起了西北野战军，这是中共领导的几个野战军中最小的司令部，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张宗逊为副司令员，开始了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3月13日拂晓，胡宗南亲自率领16个旅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为了消灭敌人，彭德怀采取积极防御作战的方针，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指挥西北解放军在延安以南进行了胜利的阻击战，杀伤敌人5000多人后主动撤离。3月18日，胡宗南军开到延安城郊三十里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延安军民全部撤离延安。

3月19日，胡宗南的军队“占领”了延安。虽然只是一座空城。而恬不知耻的胡宗南竟在3月20日的西安报纸上大肆吹嘘：“我军攻克延安，打垮共匪两个旅，毙敌三千人。”而向蒋介石的报告不仅说“攻占延安”，还说“是役俘敌五万，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可当时的许多人都知道彭德怀在陕北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总数也不过两万多人，即使全部作了俘虏，也使数目仍欠一大半！

有好事的记者就一定要去延安采访。这可急坏了胡宗南和蒋介石。胡宗南只得拿出国民党军队谎报战绩的传统精神和办法，一切亲自炮制，抓500名村民，又在国民党军队中挑选1500多名“伶俐”士兵，经过快速训练，组成“战俘”。这2000多名“战俘”在对付参观的10座战俘营内轮流住宿，刚在甲战俘营给记者参观完，又赶忙运到乙战俘营区让记者参观。弄虚作假必然会丑态百出，有眼光的记者发现战俘似曾相识，于是进行采访，这下子露出了狐狸尾巴，令胡宗南和蒋介石好不难堪。

蒋介石和胡宗南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中共中央虽撤出了延安，却并没有离开陕北。3月27日，毛泽东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北面的小山枣林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的5位常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同志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组，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叶剑英、杨尚昆前往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

尽管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声称消灭了共军多少多少万。然而他自己心中有数，他的军队并未与共军发生真正的战斗，共军主力是主动撤离，如果未与共军主力决战并歼灭，延安是不可能占稳的。因此，他命令他的部队要尽快找到共军主力。这位志大才疏的“西北王”做梦都想不到，毛泽东、彭德怀正希望他的部队动一动，以便解放军“诱敌深入”，从而各个击破。彭德怀将少量部队部署在安塞诱敌，而将主力隐蔽集结在青化砭地区，等待战机。

3月20日，胡宗南接到情报：西北共军主力正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撤退。胡宗南急召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他率部急速行军，寻找共军主力并与其

决战。3月21日，董钊的整编第一军的5个旅的兵力便由延安向安塞方向追来。西北野战军巧妙地不断引诱敌人分兵，而将敌三十一旅朝青化砭地区引，因为彭德怀、张宗逊正集中野战军主力于青化砭地区，布成袋形伏击阵地。

3月24日，天气十分晴朗，敌三十一旅在旅长李纪云的带领下进军拐卯镇，探知在青化砭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感到异常，即电告胡宗南。胡宗南接致电报，大为生气。“哪里会有解放军？解放军主力绝对不会在青化砭！李纪云简直“是贪生怕死！”命令他们继续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李纪云所部就在胡宗南主观武断的命令下钻进了西北野战军的包围圈。

3月25日10时许，按照预定部署，已经切断了敌退路的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敌三十一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野战军三五八旅和新四旅的指战员从预伏地一跃而起，军号频吹，红旗翻飞，枪声、杀声响成一片，就像快刀斩乱麻一般，总共不过1小时40分钟的战斗，就全歼了敌军2900余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

青化砭战役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后获得的首次胜利，大大振奋了陕甘宁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对全国各个解放区军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更给了骄傲不可一世的胡宗南以沉重打击。

面对青化砭之战的胜利，彭德怀首先想到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动情地说：“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说真话，使敌人变成了聋子瞎子。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此时，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指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胜利，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向军委报告说：“自青化砭战役之后，敌人吸取了教训，行动异常谨慎，他们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就房舍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进，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这种小米碾子式的战法，减少了我军各个歼敌的机会，须耐心地长期地疲困敌人，消耗敌人，迫其分散，寻求弱点歼灭之。”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报告后，十分赞成彭德怀的见解，并高度评价他的这种求实作风。毛泽东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并立即回电彭德怀：“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青化砭一役后，胡宗南发现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他吸取了三十一旅分兵而被歼的教训，采用了蒋介石的国防部所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即集结几个旅的兵力为一路，数路并行，互相策应。胡宗南下令董钊和刘勘率数万大军以“方形战术”在延川、清涧、瓦窑堡一带反复兜圈，企图寻找野战军主力。可是，胡宗南的数万大军找来找去，处处扑空。西北野战军正在隐蔽处休整，而敌人因为整天爬山越沟，挨饿受冻，露宿荒野，又被拖得疲惫不堪，减员严重，陷入了困境之中。

4月中旬，胡宗南军队的8个旅由蟠龙、青化砭向西移动，以驻瓦窑堡的第一三五旅南下，企图歼灭野战军主力于蟠龙、青化砭以西地区。毛泽东下令以解放军的一部向西吸引敌人主力，大部在瓦窑堡以南预伏。14日，当南下的敌军第一三五旅4700人进至羊马河地区后，彭德怀当即以解放军4个旅的优势兵力将敌人四面包围，经过8小时激战，全歼敌人。俘敌代旅长麦宗禹，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

胡宗南经此两战后，心中已经惧怕，一听见“伏击”二字就似触电一般。而野战军此时更加充满歼灭敌人的信心。4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发出《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指出：“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做‘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为了达到使敌人十分疲劳和极端缺粮的目的，毛泽东决策调敌北上，并断敌补给。具体方案是以部分后方机关佯向河东转移，用一部分兵力诱敌北上，以主力攻歼胡宗南部在陕北战场上的主要军需供应基地蟠龙守敌。

蒋介石和胡宗南又上当了。4月下旬，蒋介石据情报断定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遂命令胡宗南迅速率军沿咸榆公路北进，又命邓宝珊的第二十二军从榆林南下，企图夹击西北解放军于吴堡地区。胡宗南只留下第一师一六七旅主力及地方保安团共7000余人守蟠龙。当敌人以9个半旅北犯绥德时，彭德怀指挥解放军4个旅秘密南下。5月2日夜，西北野战军对蟠龙守敌发起攻击，激战两天三夜，全歼蟠龙守敌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子弹、给养无数。而北进的敌人当然又扑了空。

三次战役，胡宗南以众临寡，却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在陕北来回游行，到处挨打，到处扑空。

随后，毛泽东、彭德怀又指挥西北野战军挥师西向陇东，5月30日至6月30日，歼灭宁夏马鸿逵部4400余人。8月初，西北解放军主力直逼曾与胡宗南相商欲南下夹击解放军的邓宝珊的第二十二军所在地榆林，再次调胡宗南北上，敌主力日夜兼程北援，8月6日至11日，彭德怀指挥解放军围攻榆林，歼敌5200余人后，撤出战斗，向沙家店地区转移。8月20日，解放军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在沙家店全歼敌三十六师6000人。解放军乘胜追击，在延安川岔口地区，又歼敌4000人。至此，蒋介石组织的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完全失败，西北野战军随即转入内线作战。

1948年4月22日，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胡宗南在损兵折将10万人之后，不得不撤走。

以2万多兵力战胜23万敌人，这种极其悬殊的兵力对比却能获得巨大胜利，全在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杰出军事指挥艺术。当胡宗南以强大的优势兵力进攻延安时，毛泽东作出了暂时放弃延安的谋略，这是极其正确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后来的事实对此全是证明。暂弃延安，失去的只是一座空城，而且是暂时失弃。放弃延安后，毛泽东、彭德怀充分利用了解放军对陕北地形熟悉、有群众支持的有利条件，与敌人采取“蘑菇战术”，以少数兵力不断地牵着敌人的鼻子东奔西走，拖得敌人既疲劳又缺粮，哪里还有什么战斗力呢？而西北野战军主力却一直隐蔽待命，一旦条件有利，则伺机以绝对优势于某一部敌人的兵力突袭该敌，这样就连续获得了七战七胜，歼敌3.1万余人的战绩。不仅打退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的作战，而且创造了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击败绝对优势的敌人的光辉战例。这个战例，实际上也是“诱敌深入”，以便各个击破谋略的灵活运用。

陈毅“忽东忽西”调动王牌军 粟裕“虎口拔牙”围歼张灵甫

1947年，蒋介石在华北战场连续失利，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企图首先解决山东和陕北问题，剪掉两翼，孤立中原。在3月上旬，蒋介石调集了3个机动兵团，共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余人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这次进攻，蒋介石可是出了血本，他将国民党军所谓“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74师、整编11师和第5军，均调集于山东战场。整编74师为“五大主力”之首，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该部队不仅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而且受到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蒋介石曾到74师视察，宋美龄曾到74师慰勉，就连美国人也曾到74师检阅，故该师有“荣誉军”、“御林军”称号。其师长张灵甫，外号“张跛子”，抗战期间曾多次建立过战功，深得蒋介石的器重。然而，在山东指挥解放战争的是华东野战军杰出将领陈毅和粟裕，张灵甫也难逃厄运。

1947年4月，当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他发明了“新战略”，他以“三大主力”为骨干组成了3个兵团，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向前推进，企图压迫华东野战军退至黄河以北，进而强占山东解放区。蒋介石把他的“新战略”称为“硬核桃”和“烂葡萄”战术。他把嫡系主力作为“硬核桃”放在中间，而两翼放置的是作为“烂葡萄”的杂牌军和次等部队。按照这个部署，如果中共的军队要插到中间去打他的嫡系主力，不仅敌74师、11师、新5军3个主力能够互相策应，两翼部队还可以赶来，你就啃不动这个“硬核桃”；如果打他的两翼，他拼着牺牲几个“烂葡萄”，等打了几仗，双方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的主力部队就突然从横里来袭击中共军队。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取得他没有取得过的胜利。

如何粉碎敌人的新战略？在山东前线直接指挥部队的陈毅、粟裕在寻求最佳作战方案；陕北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也不断通过电波传来各种指示。

根据当面的敌情，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粟裕周密部署华东野战军采取了一系列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的军事行动；实行耍龙灯式的高度机动，时东时西，时分时聚，使敌人弄不清华东野战军的意图和动向；对刚占新泰之敌达成包围后，当夜又主动撤围后退；华野主力再后退一步，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机；原准备南下鲁南、挥师华中的第一、第七两纵队突然停止南下，已经南下的第六纵队则隐蔽集结，不惊动敌人后方……

这一系列忽进忽退，时东时西，或打或撤，或明或暗的具有高度回旋和机动的行动，果然迷惑和调动了敌人。但是，敌人虽然吃够了苦头，也很狡猾，宁愿个别次要部队被华野吃掉，他的主力也绝不肯分散突出，硬是要聚成一大堆、一大堆的，齐头并进，使华野一时找不到打掉他主力的机会。

不过，敌人再狡猾也终于露出了破绽。经过实践，陈毅、粟裕从与敌周旋中逐渐把敌人的老底摸透了。毛泽东也明确指示：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掌握最大的兵力；不要过早惊动敌人的后方；歼灭敌人的战机总能出现并捕捉到的。到了5月中旬，战机出现了：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有进犯沂水模样，他们处在大兵团的右翼，比较暴露。陈毅、粟裕抓住战机，

拟以 5 万发炮弹把这两支部队炸烂。可是，当各部队领受任务后于 5 月 11 日出动时，陈毅、粟裕却又侦得了汤恩伯兵团的核心集团的具体作战部署：以第七十四师为中心，其他 5 个师作为左右翼，成锥形阵势，限时攻占坦埠，对华野实行中央突破。第七十四师是这锥形的尖端，前进得比较猛，它的前锋突出了 20 多里路程。这是一次多么宝贵的战机。粟裕立刻发现了这一战机并当即向陈毅建议：改变计划，放下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首先歼灭敌人的这个王牌师。

按照粟裕提出的作战方案：不打敌军侧翼，改打中路强敌第七十四师，采取正面突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南北各路援敌的战法，将第七十四师从敌人重兵集中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这个作战计划虽然改变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和“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的传统战法，可谓是“虎口拔牙”，是以中央突破来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但陈毅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同意粟裕的建议，紧急命令已出发的各部队就地停止待命，迎战敌第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坚决把它从敌人的大兵集团中挖出来予以歼灭。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新的作战方案。

就在这一天，敌第七十四师在左翼二十五师、右翼八十三师的配合下，疯狂地向我坦埠扑来。当晚，七十四师更是急切，脱离其左右邻，直向坦埠攻击前进，形成孤军深入的态势。5 月 13 日，伴随着“鲁境国军势如破竹”的一片鼓噪声，张灵甫命令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的七十四师，连夜做好继续进犯的准备，妄图于 14 日一举攻占我坦埠。

此时的张灵甫已完全迷信于自己的错误估计。自从他充当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内战的急先锋以来，在占宿迁、泗阳、淮安、淮阴之后，就认为“新四军不打硬仗，不打阵地战”，梦想凭借他手中的美国武器“长驱直入”。现在，他又以为我军已“望风披靡”，可以“跟踪追击”，“深入山东中部共军山区巢穴之中”。

然而，张灵甫哪里知道，雄心勃勃要歼灭七十四师的陈毅、粟裕，此时已精心为他准备了口袋。在各部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毅就捉住歼灭敌七十四师这个战机，作了一番精彩动人的讲话。他说：莱芜战役，我们出奇制胜，一举歼灭了孤立突出的李仙洲集团。当时，把七十四师张灵甫留在南面，没有去动他，准备把猪养肥了再杀，油水会更多一些。现在，蒋介石已把这只猪送上门来了，很好！这真是“坐地等花开，财喜上门来”。5 月 12 日，粟裕在坦埠东北葛沟庄的华东野战军总部，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王建安、许世友、成钧、韦国清率领的各纵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过了沂水，直向坦埠公路插过来；王必成纵队从南边费县，何以祥纵队从西边平邑直扑垛庄、青驼寺。

汤恩伯发现情势骤变，急令张灵甫回师临蒙公路与左右翼结阵。张灵甫却不以为然，他向汤恩伯建议：“陈毅仍然是老一套，想截住我突出部来打，我想将计就计，以七十四师为诱饵，把他们吸引过来，痛歼之。”汤恩伯认为张灵甫此计大妙，决定照办。

5 月 15 日拂晓，一支神兵突然从敌七十四师的背后杀出，迅速抢占了沂蒙公路上敌人赖以进退的唯一道路——垛庄。这支神兵，是粟裕早就有意安排于鲁南山区隐蔽待命的王必成纵队。这个纵队与敌七十四师可是“老交道”了；在 1946 年两次涟水保卫战中，王必成纵队都曾与七十四师交锋，但只取

得歼敌 3000 人的小胜，甚或只能说是平手。这可把王必成这个被华野称为“王老虎”的战将气得嗷嗷直叫，发誓再与七十四师交手，一定要打出个新样子。此时粟裕安排王必成纵队担任切割重任，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而且，执行断敌退路、封闭各围口的任务，在王必成纵队的漫长战斗历程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著名的黄桥战役，它第一次出色地完成了这种战斗任务；莱芜战役，它又一次胜利完成了这种任务；现在，又把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团团围住了。

张灵甫被围，并不惊慌，他根本不知这是他的末日即将来临，反而以为是他的妙计成功了。倒是坐等捷报的蒋介石以及顾祝同、陈诚等人坐不住了，他们接二连三地发出电令，一面好言抚慰张灵甫，一面加速调兵增援张灵甫。

蒋介石对张灵甫确实关怀，亲自飞到徐州督战，他异想天开地部署了所谓“磨心战术”。企图一面以七十四师为“磨心”，将华东野战军主力紧紧吸住在孟良崮周围，一面紧催敌第五军、十一师、六十四师等共 10 个整编师，从新泰、莱芜、河阳、汤头等地赶来增援，从而合击华野于蒙阴以东、汶河两岸地区。蒋介石给张灵甫打气说：“抓住共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此时此地的张灵甫，仍把他的七十四师看作是个“生铁蛋”，自以为“战斗力强，建制完整，兵力集中”。“共军想吃也吃不动”。蒋介石给他一打气，胆子更壮了，气更粗了，竟自鸣得意地说什么：“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击，“两下一挤，共军就完蛋了。”

虽然蒋介石又以 10 个整编师包围了陈毅、粟裕围住整编七十四师的 5 个纵队，而密切注视敌人动向的华野总部始终充满了围歼敌七十四师的信心。陈毅说：“蒋介石想叫张灵甫中心开花，我就叫张灵甫片甲不留，自掘坟墓。”但是，由于蒋介石对我军实行反包围，这就使我军必须迅速歼灭敌七十四师，否则就将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陈毅给负责指挥一、四、六纵队的叶飞司令员打电话说：“蒋介石拼死和我们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一、四、六纵队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又给从东北方向主攻孟良崮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说：“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充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充两千！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陈毅和粟裕坚定不移的决心变成了华东野战军全体将士的行动。叶飞，陶勇、王必成、王建安、许世友率各自纵队拼死冲杀，将包围圈步步缩小；韦国清、何以祥、成钧、宋时轮率各自纵队英勇阻击，使援敌不能前进半步。

自孟良崮战役发起以来，华东野战军虽连日作战，十分疲劳，但眼见国民党的头号“王牌”已经被围困于绝境，无不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此时此刻，从指挥全局的华野总部，到英勇拼杀的前沿阵地，上上下下唯一的目标和共同的誓言，就是“坚决消灭七十四师，不让敌人跑掉一个！”

终于，经过与敌人反复激烈的争夺、厮杀，七十四师被压缩到了孟良崮主峰——芦山地区了，原来大声叱斥部属要“沉着，沉着”的张灵甫，面临末日到来的时刻，自己怎么也沉着不了了。顶又顶不住，突又突不出去，张灵甫唯一的招数就是求援。他远向蒋介石求援，近向左右邻求援。报话机传出的张灵甫的呼救声，越来越急促。他甚至不得不一反往日睥睨一切的骄横神态，向敌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苦苦哀求：“黄先生……李先生……赶快向我靠拢！赶快向我靠拢……”

蒋介石眼看“王牌军”快要葬身沂蒙山区，对各路增援部队不仅是催促，而且是下死命令了。就在5月16日上午8时，亦即七十四师覆亡前的8小时，蒋介石给增援部队发出手令，威迫各路援兵将领说：“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定必以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这无异于把尚方剑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可是，无论蒋介石怎么软硬兼施，直到16日下午，敌人的各路增援部队始终没有谁能跨越华野包围圈的一步。而此时，陈毅、粟裕却正指挥华东野战军加速向孟良崮高峰挺进，他们命令主攻部队指战员要用最大的勇敢、最大的毅力、最有效的手段，迅速致七十四师和张灵甫于死命。

在孟良崮战役中最后击毙张灵甫的是王必成的六纵，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在战斗最疲劳之时，王必成使出了“杀手锏”。他大吼一声：“特务团，给我像刺刀一样刺进去，象猛虎一样扑上去！”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率领生龙活虎的侦察营猛打猛冲，一步步逼近张灵甫盘踞的山洞。他们在洞口打掉张灵甫卫队20多人，向洞中猛烈扫射。当他们冲进洞内时，发现佩戴中将军衔的张灵甫已被击毙。

孟良崮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我军以伤9000人，亡2000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七十四师3个旅及整编八十三师一个团被我军全歼，消灭敌人3.3万人，斩掉了蒋介石在山东维持进攻的一支骨干力量，迫使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暂时停止了进攻。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他的一腔怒气无从发泄，于是拿陈诚开刀，取消了陈诚这个国防部参谋总长的指挥权。而这，又怎么可能阻止国民党反动派的继续失败呢！

一会儿南，一会儿北，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调动和迷惑了敌人，这种“示弱战略”使敌人的“五大主力”之首七十四师及张灵甫更为狂妄骄横起来，而“骄兵必败”，猖狂的敌人自愿当“诱饵”，完全不把华东野战军放在眼里，这就正中陈毅、粟裕的分割敌人之计，敌七十四师孤军深入，这就有利于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能够突然以大兵团将突出于大兵集团的敌七十四师包围了起来，以“虎口拔牙”的精神，改变了华东野战军历来先打弱敌的战法，这又“出敌其不意，攻敌其不备”，终于全歼敌七十四师，击毙张灵甫，使华东野战军获得了震撼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胜利。

毛泽东运筹三大战役 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

1948年秋，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时，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1.5亿。而国民党军此时虽仍有365万人，但第二线兵力只有175万人，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计划，改为“重点防御”。毛泽东对比双方力量，认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大量歼敌，就必须攻击对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对方的大兵团作战。他决定趁蒋介石在考虑是否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以确保华中、经营江南而举棋不定之时，抓住良机，组织战略决战，以消灭蒋介石的战略集团。于是，毛泽东毅然决定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计划，改为“重点防御”。国民党的5个战略集团，也分别被牵制在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有55万兵员，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有60万兵员，分布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有60万兵员，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有75万兵员，分布于平汉南段以及汉口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有30万兵员，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取得了济南战略的胜利，动摇了国民党军队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的力量更加坚强。毛泽东果断地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决定用电报遥控指挥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大决战。

毛泽东首先选择东北战场进行大决战。毛泽东看到：东北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经过三年奋斗，已完成土地改革，解放区已占东北总面积的97%，人口占东北总人口的83%，东北工业发达，经济上居解放区第一位；东北战场有解放军100万人，是唯一超过国民党军队人数的战场；国民党仅困守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上，蒋介石有“撤退东北”的打算，使东北国民党军队处在犹豫、动摇、举棋不定的状态。由于这些条件，有利于歼灭据守三个孤立地区之敌，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能及时转入关内作战，更有利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毛泽东认为辽沈战役的关键是打锦州。9月7日，他给东北解放军领导林彪、罗荣桓电报指出：“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非常英明，因为解放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哪里，对全局关系甚大。当时，长春守军已被久困，是敌方弱点，要攻城歼敌并非难事，同时还可解除我军后顾之忧。可是攻长春，沈阳、锦州守军正好改善态势；长春被攻克，沈阳、锦州守军正好撤退关内，影响全国战役。而且，锦州守军虽比长春多，但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有把握，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驰援，有利于战役发展。攻克锦州，

又可截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和“瓮中捉鳖”的形势。

所以，毛泽东再三强调：东北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占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开始。东北野战军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攻长春外，主力部队开始包围绥中、兴城、义县等地。10月1日，歼灭了绥中、兴城、义县等地的守敌后，主力部队包围了锦州。蒋介石此时明白了毛泽东的部署，亲自飞到东北进行指挥，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5个师和山东的2个师援助锦州，连同原来在锦西的4个师，共11个师，于10月10日攻打解放军的塔山阵地。经过6昼夜的激战，解放军歼灭敌人万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生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12万人。锦州的解放，使长春的敌人动摇。在人民解放军的声威震撼和政治攻势下，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2.6万人起义，撤出长春；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下宣布投降。长春宣告解放。

锦州的攻克，长春的解放，东北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然梦想夺回锦州，恢复北宁线，打通关内外的联络，急令廖耀湘兵团从彰武向锦州方向前进。东北解放军在攻克锦州之后，立即向东北方向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解放军将廖耀湘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过一夜激战，全歼该敌，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约10余万人。之后，解放军乘胜猛攻，11月2日攻下沈阳、营口，再歼敌14.9万人，生俘敌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至此，占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共历时52天，共歼国民党正规军4个兵团，11个军，66个师，47万余人。在这一战役中，毛泽东把歼灭战原则首次用于战略范围。他根据战场广阔，兵力众多。各种环节极为复杂的战场情况，指挥东北解放军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奔袭战：攻坚战、运动战、阵地防御战等战斗形式。各种战斗形式的综合运用，为以后组织实施大型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还在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便在华东战场发动了淮海战役。

当时，集结在淮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副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80余万人。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的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的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的7个纵队，以及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为60多万人。虽然解放军在数量上少于敌军，装备和运输条件也比较差，但是，解放军处于进攻地位，士气高涨。

10月11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要求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共同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到商丘，北抵临城，南到淮河的广大地区发动淮海战役。毛泽东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围歼徐州和海州之间兵力比较分散的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斩断敌人右臂，然后各个包围歼灭。同时，鉴于敌人的机动兵力相互增援，毛泽东要求采取灵活运用兵力的原则，以半数兵力用于围歼敌人，以近半数兵力用于阻援打援。为了领导这次战役，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

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五人组成，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战役的进行。

徐州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蒋介石发现解放军纵横驰骋于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时，便决定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调到徐州地区，准备与解放军决战。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向淮海战场挺进。7日，横扫陇海路北侧的敌人。两个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几个夜晚即将敌军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好几块。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后，黄伯韬见大势不妙，向西撤退，打算靠拢徐州，但去路已被解放军截断，遂被围困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11月12日，华东野战军对黄伯韬兵团展开攻击，战斗至22日黄昏，一举歼灭了号称华东敌军劲旅的黄伯韬兵团18个正规师，共17.8万人，黄伯韬被击毙。解放军完成了对徐州的包围，并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逃路。

当黄伯韬兵团被围歼时，蒋介石急忙从河南调黄维兵团增援淮海战场。11月23日，黄维兵团刚到宿县西南时，即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中。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经过10天激战，至15日夜，解放军歼敌12万余人，活捉兵团司令黄维。黄维兵团被围时，蒋介石见徐州大势已去，11月30日，慌忙指挥徐州守敌杜聿明等弃城西逃。解放军数路猛追三天，至12月4日，将30万国民党军围困在永城东北纵横不到20里的地区内。孙元良部妄想突围，结果于6日夜间几乎遭到全军覆没。

此时，毛泽东本可下令迅速歼灭被围困的杜聿明部27万人，但毛泽东发出指令，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就围而不攻，休息到1949年1月5日左右再开始行动。这是毛泽东对全面战局慎重考虑后又下出的一步妙棋。

原来，当黄伯韬、黄维两兵团在中原战场上接连被歼灭时，毛泽东已指挥华北战场开始了平津战役。傅作义所指挥的60多万国民党军队，已为辽沈战役所震惊，加上大沽与天津之间交通全被截断，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撤或西退绥远。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20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部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傅作义部，蒋介石已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此时，让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相呼应，推迟进攻，“缓和局势”，就具有颇大的战略意义，这样可以麻痹敌军，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苦战硬拼。这样，解放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使淮海、平津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

毛泽东的部署暂时“延缓”了杜聿明部的被歼灭。杜聿明成为一块“鱼饵”，即使华北国民党军不致南撤，又使李延年兵团可能北上救援，达到分割歼灭的目的。杜聿明部在被围困期间，粮草断绝，饥寒交迫，已丧失战斗力。

1949年1月初，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完成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的任务，即使蒋介石再想迅速海运南撤华北国民党军已不可能，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军发起总攻。月6日，解放军向被包围在青龙集、陈官庄的残敌开始进攻；至10日上午即结束作战。生俘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结束了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共历时65天，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共55.5

万人，并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防御计划，至此，华东、中原和华北三个解放区已完全联成一片。

在东北卫立煌集团已被消灭，华东刘峙集团也已奄奄一息时，华北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唯一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了。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傅作义集团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而傅作义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毛泽东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和逃窜的可能，彻底消灭傅作义集团，立即以提前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组织了平津战役。

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他有4个兵团13个军，连同地方保安团，有60多万人。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这支部队“都已成了惊弓之鸟”。傅作义以为东北解放军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入关作战，所以采取收缩兵力的方针，把部队部署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既准备负隅顽抗，又准备不利时赶快撤退。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稳住傅作义，使其不撤兵，是战役的关键。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制定了平津战略的作战方针，规定了稳住敌人，不使其南逃西窜，分割包围就地歼灭的一系列英明战略决策。毛泽东命令淮海前线解放军暂时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李、孙诸兵团的余部，“两星期之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命令太原前线解放军缓攻太原，以麻痹平、津之敌；命令平绥前线解放军对新保安之敌“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防止敌军沿津浦线南下向青岛方面逃跑。这些指示，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发展。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于12月5日至21日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据点的分割包围，切断了敌人南逃西窜的道路。为抓住两线，稳住东线，毛泽东下令采取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对敌的包围。

12月22日，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了新保安之敌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24日，又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守敌5.4万人。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向拒不放下武器的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于15日攻克了坚固设防的天津，歼敌13万，指挥官陈长捷被活捉，天津宣告解放。17日，塘沽解放，切断了敌人海上的退路。

天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傅作义的50万守军包围，傅作义完全陷入绝境。由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北平守敌在傅作义的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58天，除塘沽守敌5万余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人。平、津、张地区的解放，不仅解放了华北全境，而且使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军联成一片，有了坚固的后方。

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北中国的一次大决战。仅仅4个月零19天，人民解放军就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进行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敌人在军事上并且也在政治、经济上面临绝境。

国民党反动派已基本上被打败。

毛泽东自豪地宣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经为时不会太远了。新中国即将诞生。

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绝唱，其高超、精湛的军事谋略可谓举不胜举。邓小平说过：“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就是要把蒋介石的部队封锁在长江以北打，不让他跑掉！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从三大战役的结果看，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果然达到了这样的理想效果。

在三大战役的过程中，毛泽东及时地抓任了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了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有机地联系起来；以高超的军事艺术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密切结合起来，把军事攻势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同时也运用了过去的战争经验，使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规模之大，歼敌之多，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得到地方部队、农民游击队的有力配合，得到解放区人民的积极支援。在辽沈战役中，有30多万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在淮海战役中，有40余万地方武装配合战斗；在平津战役中，几十万华北民工直接参战。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支前作战，保证了三大战役的彻底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是人民解放军对敌作战的一贯原则。这一方针，是毛泽东所规定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在军事斗争上的具体运用。由于反动派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内部矛盾更为加深，军队士气极度低沉。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就显得更为重要。

共产党统战结出硕果 刘文辉适时宣布起义

195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人，起义40余万人。西南战役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这里对刘文辉等三将军在彭县发动的反蒋起义作了充分肯定，足见这次起义对西南战局的影响。而刘文辉等三将军的起义，却首先是周恩来长期统战工作的结果，其次是周恩来对起义时机的把握。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拥有10余万军队，占有大半个四川，成为四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的刘文辉，虽然从1929年就走上了反蒋道路，但最后走上与共产党联系，举行反蒋起义之路，却是与周恩来的长期工作分不开的。

早在1929年，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组成了一次大联合，掀起了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刘文辉于12月1日、2日与唐生智等75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斥蒋介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这次反蒋，因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上风，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反蒋主力唐生智及其部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刘文辉的部队又远在四川，难以给予军事支持。随着唐军的迅速崩溃，反蒋斗争失败了。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发动了中原大战。刘文辉认为这是一次倒蒋的大好机会，于是一方面暗中调遣兵力，准备出兵武汉，与冯、阎联军相配合；另一方面又于9月6日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要求他“克日下野”。这次反蒋，因为张学良突然改变骑墙态度，并率军入关援蒋，中原大战遂以蒋的胜利而告终。

两次反蒋，使刘文辉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政治上已水火不相容，蒋必欲翦除而后快。所以在1932—1933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支持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部，打垮了刘文辉军队，占据了刘文辉在四川的大部分地盘，迫使他率领不足两万人的残余部队，退守西康。蒋介石仍不放过他，不断地对他进行削弱和打击。先是在西昌设立行辕，继而在康定、西昌、雅安设立军统特务站，对刘文辉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后又屡次提出派中央军进入西康，企图彻底铲除刘文辉这股异己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心继续反蒋的刘文辉清醒地认识到，在那时能与蒋介石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因而采取了亲共反蒋的态度和立场，并逐步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最终为“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而“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以及“把握时机，适时起义”谋略的制定，却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精心杰作。

1938年4月，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即派吴玉章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文辉在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接触。吴玉章向刘文辉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

势，指明抗战的光明前景，使刘文辉受到启发和鼓舞。

周恩来还通过刘文辉派到汉口的联系人邹趣涛转告刘文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当走这条路。”之后，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若飞、华岗、李相符、田一平、杨伯凯等人，都分别一次或数次地与刘文辉会晤，使刘文辉不断增强了同蒋介石斗争并坚持到底的决心。

1942年2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宅亲自会晤了刘文辉。周恩来向刘文辉讲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赤诚相见的谈话，使刘文辉深受感动并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

此后，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的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中共中央不仅与刘文辉草拟了《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协定十二条》，周恩来还派王少春到雅安与刘文辉保持密切联系，架设了秘密电台并得到刘文辉的保护，可以与延安党中央直接通报，经常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胜利的消息，向刘文辉传达。

根据“控制川、康，迎接解放”的谋略，刘文辉为抵制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控制与渗透，除在政治上广交朋友以摆脱孤立地位外，还比较注重和加强西康地区的经济及其他建设，以变不利为有利，赢得与蒋介石斗争的物资基础。他在西康搞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十大建设”，建立起一个武器修理所，随后又扩建为厂，以加强军队装备并减少军费开支；办起一个军政学校，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并以此与当地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的各阶层建立起紧密联系；办起了几所中专学校；在山峦重迭、交通不便的地方，下大力气开通几条公路；加强了警察治安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采取了开放政策，鼓励私人经济，沟通商旅往来，促进市场繁荣；鼓励驻军与民同垦，将不少荒山开发为梯田；大力整修沟渠，兴修水利，扩大了灌溉面积；开设新式图书馆、书店、普及近代科学文化；开设近代医院，引进和推广西医西药。这些措施的推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使得刘文辉驻防中心的雅安，在当时竟享有川康“小香港”之誉。这些措施增强了刘文辉的实力，为刘文辉“控制川、康”，坚持对蒋介石的长期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

在加强西康建设，借以自保的同时，刘文辉又主动采取措施，化敌为友，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结为同盟，共同抵制蒋介石集团对川、康两省的控制、渗透、分化和吞并。刘文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逐步摆脱了政治上的孤立地位。针对蒋介石的威胁、利诱、分化、渗透的种种阴谋，刘文辉采取了“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即：不反对国民党中央在西康的经济活动，容许蒋介石派少数人员参加西康省的党政工作，拒绝蒋介石派兵进驻西康）的策略，与蒋介石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不懈斗争。如：对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的长期斗争；断然以武力收复甘孜，将班禅行辕赶出西康的斗争等。1946年，蒋介石借整编为名，企图行削弱地方军之实。刘文辉则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蒋介石见屡次施计不成，就欲来一个“调虎离山”，让刘文辉到他的“中央蒙藏委员会”去坐第一把交椅。刘文辉明白蒋介石的

企图，于是予以断然拒绝，并通电说他宁愿去当老百姓，也不愿去当这个“委员长”。蒋介石只好作罢。1948年，蒋介石派亲信王陵基取代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则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以省参议会为工具，策动“驱王运动”，由反王进而反蒋，等等。

刘文辉因为反蒋而亲共，因为亲共而必然会走到人民阵营，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还在1946年春，当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时，刘文辉为此而担忧，周恩来即借刘文辉在重庆出席会议时对他：“蒋介石背信弃义，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人民是反对的。我们被迫自卫，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对战争是乐观的。”他鼓励刘文辉“回去只要好好搞，赢得人民的支持，将来是有前途的”。

刘文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努力“控制川、康”局面。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刘文辉被推为川康分会的负责人，以“杨宗文”这一化名领导工作。1949年，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盟主席张澜都分别派人与刘文辉联系，商谈川、康起义事宜。

到了1949年8月，继南京、上海、福州、武汉等重要大城市相继解放之后。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义，两湖底定。此时，刘文辉意识到“迎接解放”的时日已为期不远。但当时他的二十四军远驻西康，形格势禁，无法同邓锡侯的部队靠拢，当何以为？他认为应向周恩来去电请示行动方略，当即拟就一电交王少春发出；大意为：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以处境困难，只好暗作准备。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两部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何时起义对整个西南的解放最为有利？对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性命攸关的战场上，把握时机尤为重要。周恩来就是善于把握时机的大师。时机未到，他不急不躁，静观时局；时机一到，则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真可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1927年3月26日，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就是鉴于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驻守上海的敌军只剩下3000名正规军和2000名警察，而且军心涣散，丧失斗志；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已达高潮；工人纠察队已接受初步训练，军事准备工作已到位等因素，确认起义时机已成熟而不是陈独秀所言的“太早”，果断地发出了立即起义的命令。结果只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工人纠察队就用150杆破旧枪支，3枚炸弹和少量手榴弹打败了5000多反动军警，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现在，刘文辉要发动起义，这对解放大西南当然是有很大帮助的，可是，究竟何时起义才最适宜，对战局的影响才最好呢？周恩来考虑到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刘邓大军尚在对大西南实施战略包围的初期阶段，西南的起义尚不宜过早行动，所以他电告刘文辉，指出：“大军行将西进，希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过早行动，会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文辉接此电文，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最佳时机，和中共联络人王少春等一起积极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0月，刘文辉从雅安到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达周恩来指示，同时结成了以刘、邓、潘三部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的进步力量，拟在解放大军西进入川时，配合行动的各项准备，以及对蒋介石反动集团所应采取的对策。刘文辉还派杨家桢在张铁僧家，秘密与中共地下党商订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刘文辉所率的二十四军配合行动的计划。决定：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军

仅存的主力，在人民解放军由北面南下，胡宗南部被击破向西康方面逃跑时，二十四军应截断其退路，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之；胡宗南部在人民解放军压迫下向西康撤退，后面有人民解放军尾追时，二十四军应配合夹击消灭之；胡宗南部未与人民解放军战斗，即向西康撤退时，二十四军应单独行动，阻止其进入西康，以待人民解放军的到达。

1949年12月5日，此时刘邓大军已完成对四川的战略包围，里应外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周恩来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8日，周恩来又电告率大军挺进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之联系。”至此，已是万事俱备，只欠“起义”。

12月9日傍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离开成都，在彭县联名发表通电，宣告起义。此举不仅及时打乱了蒋氏集团的步伐，使蒋介石集团企图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部署与计划很快破产（蒋介石不得不于10日下午携带蒋经国乘“美龄号”专机仓皇逃往台湾），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截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妄图逃窜康、滇的通道。

受刘文辉起义的影响，麇集于川西的其他国民党军董宋衍、罗广文等6个兵团，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纷纷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得以迅速缩小对成都的包围，聚歼了盘踞在川西的胡宗南残部，于12月27日胜利地解放了成都，彻底打碎了蒋介石妄图凭借其“西南防线”负隅顽抗的阴谋。

刘文辉等人的彭县起义，加速了人民解放军西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军民的伤亡，避免了城市的破坏，有力地保护了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厂、仓库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川、康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德怀临危受命抗美援朝 志愿军隐蔽渡江神兵天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和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为了“保家卫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常委决定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中央决定由林彪挂帅。可是林彪却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而朝鲜战争的对手是美国，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载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军的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林彪据此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林彪不敢去，毛泽东决定改派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朱老总称赞说：“还是老彭靠得住。”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彭德怀受命后，就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向毛泽东主席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彭德怀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上专门讲了入朝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已断定“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因而猖狂扬言要在11月23日即感恩节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国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有利于志愿军的奇袭。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彭德怀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志愿军装扮成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给敌人以突然袭击。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40军、39军、42军、38军和3个炮兵师，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40军首战南朝鲜军，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初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入朝部队的作战信心。部队通过实战感到；南朝鲜军虽然全部是美式装备，然而每个师只有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火力还不很强，其士兵又大部分是被强征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战术技术水平都很低，作战时主要依靠美国飞机和大炮的掩护。彭德怀因此总结说：“敌人离了飞机大炮，就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军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作战，就可以肯定是能歼灭敌人的。”

虽然志愿军已经与南朝鲜交火几天了，可是美军对于中国是否出兵仍然抱着怀疑和不在乎态度。当南朝鲜军已不敢再朝鸭绿江边推进时，美国陆军最悠久的王牌师第1骑兵师（这是美国建国时创立的番号了，该师“骑兵”早已摩托化了）仍然向距鸭绿江边60公里的云山前进，支援已在那里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这时，志愿军第39军已经奉命围歼在云山的南朝鲜军。于是，中美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云山之战就打响了。

11月1日傍晚，志愿军第39军以8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的兵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部队在隐蔽接近和包围敌人后，不待进行火力准备，即以一部兵力突然冲入云山镇，以打乱敌人指挥。部队打进敌人阵地后，发现敌兵臂上带着马头臂章，而且个头高大，才知道遇到了美国军队。而美军这时刚与南朝鲜军接防，戒备疏忽，把进入镇内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同他们握手。志愿军先头部队将错就错，进至美军一个营的营部前才突然开火。敌人遭受突袭后，一片惊慌，脆弱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迅速崩溃。由于双方实行近战，美军优势的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在坦克的掩护下于午夜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8团又遭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包炸毁，在第1、第2营趁隙逃脱之后，第3营未能逃脱被志愿军包围。志愿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11月3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军骑1师第5团也被击退。云山之战共消灭美军约1800人，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

在云山之战开始的同一天夜晚，志愿军总部判定清川江以北敌人只有5万余人，又处于分散状态之中，而志愿军可以集中12—15万人投入作战，因此决定向敌发起总攻。具体部署是：以侧后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力争分割和歼灭清川江北的敌军主力，特别是南朝鲜军的3个师。从11月1日晚间起，志愿军各部展开全面攻击。可是，敌军因美骑1师的失败而发现与之为对阵的突然冒出来的“朝鲜军”力量强大，急忙于11月3日全线撤退。敌军全是机械化装备，收缩十分迅速，一天之内，敌军各部就已经后撤了几十公里，退守到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各部队均是徒步追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逃窜，但毕竟已歼灭了1万多敌人。取得了出国作战后的第一次战役的胜利。

第一次战役于11月7日结束，共进行了13天，不成建制地消灭了敌军158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南朝鲜军，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了清川江南。首战告捷，粉碎了美国妄图一举吞并全朝鲜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美国情报部门此时终于发现突然冒出来的“朝鲜军”是中共军队，然而

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怎么也不可能相信这个情报。麦克阿瑟熟悉中国历史，知道中国历史上各种乌七八糟的军队，这些军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从未有所改进。他认为中国军队在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战胜第一流外国军队的记载。因而，他认为即使中共军队介入朝鲜战争也值不得放在心上。

彭德怀此时却正集中精力在部署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他知道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真正“保家卫国”，迫使侵略者坐在谈判桌上。为了增强志愿军的力量，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下令将原作为预备队的第9兵团的3个军再调入朝鲜，赴东线作战。这样，到11月24日，在朝鲜的志愿军总数已达4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38万人。

彭德怀计划在11月底发起第二次战役。在此之前，志愿军除了以后撤诱敌外，还释放了100余名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俘虏，并向其解释我军因粮食不足，要后撤回国。这样，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向敌方宣传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敌人的错觉。

11月24日，美军统帅亦即“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狂妄地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发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同日，敌军数千门火炮向着只有我军个别警戒人员的前沿阵地轰击后，各路敌军开始分头沿路向北推进。这时，西线美军第8集团军和东段美军第10军之间留下了一个数十里的缺口；西线之敌右翼又是刚受过打击的南朝鲜军第二军。彭德怀及志愿军总部立即抓住敌军的这个薄弱点，决定向西线敌人的右翼德川发动攻击，下一步再向美第8集团军的深远后方迂回。

11月25日黄昏，西线敌人已推进了6—12公里，其右翼更加暴露。当天夜幕降临后，天空升起一轮圆月。就在这个月夜，伴随着令敌人胆颤心惊的军号声，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了进攻。

夜战是志愿军所擅长的。还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有星光之夜，人民解放军就通常会组织小规模夜战；有月光之夜，人民解放军则通常会组织大规模夜战。在朝鲜战场上，月夜也是志愿军进行夜战的最好时机。志愿军入朝作战不久，饱尝志愿军夜战之威的美军就已得出了结论：月亮是“中国人的月亮”；有月亮的夜晚是“中国人的月夜”。

11月25日晚上，是美军初尝“中国人的月夜”之时。这天晚上，志愿军的第39军、第40军、第50军、第66军这4个军的夜间攻击虽然消灭了部分前沿之敌，进展却不大。主要原因是敌人兵力火力密集，不易分割，一时形成对峙。但是，向敌右翼迂回的志愿军第38军、第42军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38军、第42军在攻击前，侦察分队就已经查清敌军的接合部疏于戒备，因而各穿插部队一夜之间就顺利地将南朝鲜第2军分割。第二天白天，志愿军部队利用敌我双方插在一起，敌机难以分辨之机，向溃逃之敌猛打猛冲，将敌两个师全部击溃。11月27日早上，美国广播新闻评论员也只得宣称：“大韩民国军队第二军被歼灭，业已完全消灭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

这次战役后，美国参谋学校专门撰写了《德川战役南韩第二军被歼的检讨》一文，作为研究中国军队进攻战术的范文。该文称赞志愿军进攻作战的优点是：“集中压倒兵力于企图决战方面”，“发动大规模重点的夜间攻击，深入敌阵地后方控制整个战场。”

德川战斗胜利后，志愿军总部命令第38军和第42军向西线进行双层迂回。第38军进行内层迂回，插向价川、三所里，包抄美第9军后方；第42

军进行外层迂回，插向顺川、肃川。如果此计谋成功，就可以将美第8集团军主力合围于平壤以北。

11月27日晚，第38军第113师全部轻装，只是骡马驮载少量轻型火炮伴随出发，部队沿山间小路全速前进，在夜间排除了少数敌人的零星抵抗后，天明已进入敌方纵深。这时敌人戒备疏忽，只有飞机来往侦察。第113师为了迷惑敌人，部队索性去掉伪装，整队前进，果然使敌机误以为这支部队是由德川败退下来的南朝鲜军。11月28日上午8时，第113师经14小时行军，前进72.5公里，插到了平壤至价川公里的交叉点三所里。

志愿军占领三所里，使清川江北的敌军三面被包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同日，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人要把他的部队“全部歼灭”。

11月29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开始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全线撤退。同时，以美军骑兵第1师，英军第29旅各一部向北增援，猛烈攻击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扼守的三所里、龙源里，企图打开南逃通路。

当时，南北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志愿军部队头顶上有上百架飞机轰炸，地下有近万辆坦克在南北进行相对冲击，部队随身携带的弹药又已用完。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指战员利用缴获的武器，以无比顽强的精神和敌人搏斗。第337团3连在龙源里、第335团3连在松骨峰的阻击打得最为顽强。战士们打完了子弹，就用石块、拳头、牙齿和敌人拼命。在第113师部队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打开通路的企图未能得逞，被迫丢掉辎重改道向安州方向激退。而志愿军也随之调整部署，在清川江畔西起新安州，东至价川，南至三所里、龙源里地域内展开了分割围歼敌人的战斗。美军第2师、土耳其旅大部被歼，美军第25师、骑兵第1师被重创，其他部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至12月24日，历时49天，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万人，包括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的全部土地，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军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统治集团的御用宣传工具合众社对此只得哀叹：“这是美国建军以来最大的失败，是美国陆军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此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又发动了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又经过两年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的历程，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迫使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在描述他签字的心情时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

至此，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彭德怀以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向世界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是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胡志明以持久战消耗法军 武元甲围奠边府取得大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侵入了尚属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越南人民的革命领袖胡志明于1941年5月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1945年初，形势的发展表明日本败局已定，胡志明即积极筹划越南独立工作。8月中旬，胡志明在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果断地发动了“八月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包亭广场50万人的欢呼浪潮中，宣读了《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然而，日本法西斯虽然战败退出了越南，原来占领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却并不甘心失去印度支那这块富饶的土地。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向东方的扩张浪潮中，法国军队于1858年用武力占据了越南，后来又占领了柬埔寨和老挝，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在长达80余年的殖民统治中，法国殖民者造成越南只有2%的儿童受过初等教育，0.5%能进入中学，全国只有一所大学。文化教育的落后决定了经济的落后。为了反抗殖民统治，越南人民曾进行过多次起义，但都失败了。法国殖民者为了巩固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采用血腥手段对越南人民的起义进行残酷镇压，仅监狱就修了81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因受德国法西斯侵占，无暇他顾，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得以成立。

可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虽然面临着重建家园的艰巨任务，却并不想放弃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时刻梦想着卷土重来。

日本刚投降，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就召开法国临时政府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重返”印度支那的军事部署。他任命第二装甲师师长勒克莱尔为驻印度支那最高司令官，着手以军事手段重新踏上越南土地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945年9月21日，法军在英军的庇护下，踏上了越南的土地。两天以后，突然袭击了胡志明建立的越南劳动党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西贡的机关。西贡人民对法军的入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时的武装力量有限，胡志明希望通过和平途径以实现越南的国家独立和统一。经过谈判，越南与法国于1946年3月16日、9月14日先后两次签订协议。协议规定越南作为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存在，法国承认越南是一个独立国家，法、越双方采取措施停止敌对活动。

但是，法国并不遵守已经签订的协议。1946年12月16日，印度支那的法军当局在海防举行军事会议，做出了对越南北部发动全面进攻的最后决策。法军企图利用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迅速歼灭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武装力量，占领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2月19日下午8时30分，法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河内发起了总攻。

12月20日，即法军进攻河内的第二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了《告越南人民书》，宣布：“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一定不肯亡国，一定不肯做奴隶！”这是他向越南人民发出的抗战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抗击侵略者，捍卫国家独立与统一的人民战争自此开始了。

在抗战初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只有装备低劣的自卫队。游击队和人民军

共 1 万余人。面对装备精良的 10 万法国侵略军，胡志明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为了统一行动，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立了南、中、北三个抗战委员会，分别指挥各战区的抗战委员会；胡志明全面负责抗法战争的工作；胡志明的军事助手，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武元甲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负责指挥作战。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装备精良的法军攻势甚猛，迅速控制了河内、海防、广治、顺化等大城市，完成了对越南北方的分割。

针对法军的战略方针，武元甲将军以部分兵力实施阵地防御，主力则撤往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建立根据地，准备与法军进行持久的游击战，为以后进攻创造条件。1947 年 9 月，法军又先后攻占了越南西北地区的和平、山西、义路等重镇，继而沿铁路进占老街。10 月 7 日，法军又以 1.5 万人的机械化部队发动越北战役，企图一举歼灭越军主力。武元甲则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战术，于 12 月 23 日粉碎了法军的进攻。

由于越北战役的失败，法军在 1947 年 12 月以后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争形势的发展，改变了法国政府原来以为可以迅速占领越南的战争前途估计，战争已经由法国希望的速决战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是法国的国力难以支撑的。

1949 年 10 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远东的国际力量。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封锁中国的政策，希望介入印度支那战争，而此时的法国正因为陷入胡志明、武元甲为之设计的消耗战而力不能支，也希望美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1950 年，美国在越南设立了一个顾问团，并于该年 8 月 10 日把第一批军火运抵越南。自此之后，美国的军援源源不断，到 1954 年，美国的援助已占侵越法军军费开支的 80%。除此之外，法军还采取“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方针，重新扶持曾在日军手中当过傀儡皇帝的保大为“总统”，建立“越南国”，组建傀儡军同人民军作战。

根据形势的变化，越南民主共和国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1949 年 1 月，胡志明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认为，游击战争是有限度的，要想获得最后的胜利，必须大力发展正规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并组建机动部队实施运动战。8 月 19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随后又颁布法令，在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1950 年 1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5 月，胡志明率军政要员秘密访问中国，请求援助。尽管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也非常困难，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为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决定同意胡志明的请求，大力支援越南民族革命，向越南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南训练部队和干部，提供军事物资。因为中国的无私援助，越南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地加强了。

胡志明希望中国帮助越南人民军消灭盘踞在越南北部临近中国边境上的法国殖民军，打通越南与中国的直接通道。中国政府派遣了以打大仗、硬仗著称的陈赓将军去帮助完成这一构想。1950 年 7 月 7 日，陈赓秘密来到越南，接连不断的汇报会、座谈会、作战研讨会后，他否定了越南人民军提出的作战计划。他对胡志明说：“越南人民军刚建立不久，虽然其主力受过中国的集训和装备，但目前还只适应于打游击战，缺乏打攻坚战和进行大规模战役的经验，特别是战士们对法军还有相当的畏惧情绪、需要用胜利来鼓舞士气，所以不能打无把握之战。”他建议在高平、东溪、七溪这一条线的三个敌据

点中，以优势兵力攻打中间相对较弱的东溪，用少量兵力监视高平，用部分主力打七溪的援敌，最后诱使高平之敌出援，围而歼之。陈赓的想法得到了胡志明和武元甲的认可。

9月18日，越南人民军在陈赓的指挥下，发动了抗法战争以来的首次攻势，摧毁了敌人在东溪的工事，全歼守敌。之后又乘胜歼灭了高平、七溪、那岑、同登、凉山、禄平之敌，共歼敌9个营共8000多人，占法国在印度支那机动部队的二分之一以上。从此，中越边境畅通无阻。这是越南抗法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胜利，迅速改变了越南北部的形势。以致于法国人不得不惊呼：“上帝啊，陈赓不仅是来签订军事条约的，他直接插手指挥了！难怪越南军队一夜之间变得像个军队了！”

1950年12月以后，越南人民军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先后取得了中游战役、西北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大片国土。面对越南人民军的凌厉攻势，法国政府于1953年秋改派纳瓦尔将军为远征军司令官，他重新制订了作战计划。这个以纳瓦尔的名字命名的“纳瓦尔计划”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推行的，企图在18个月内消灭越南人民军主力。其决定性的一步是在11月20日，法军的3个伞兵大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占了军事重镇奠边府。

奠边府是控制越南西北和老挝北部的军事要地，地形呈盆状，南北长18公里，东西宽4—6公里，地势平坦、开阔。法军攻占奠边府后，立即加强工事，企图凭借地面火力和空中优势，引诱越军主力于此加以歼灭。为此，法军调集了1.6万人，配备了14架飞机、10辆坦克，并在奠边府建立了2个机场、8个据点群、49个据点。

越南人民军在获悉法军攻占奠边府的情报时，主力部队尚远离奠边府600公里，有些甚至1000公里。武元甲将军决心夺回奠边府，打击法军的气焰。从11月25日开始，越军以白天30公里、晚上50公里的行军速度，向奠边府周围地区集结。到1954年1月中旬，越军4个步兵师、1个工炮师，约3.5万人已形成了对法军的包围态势。前敌总指挥武元甲将军在指挥部完成对法军的包围后，动员了10万民工从奠边府外围的丛林中开辟一条大道，使越军的大炮可以直接运抵奠边府外围。对奠边府法军不断进行炮击，而且越军的支援也不断从这条大道中输入。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开始对奠边府发动进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到17日，越军已先后攻占了奠边府北分区兴兰、独立、班交3个高地，打开了从北面和东北方向进入奠边府中心据点群的大门，严重威胁中心分区和孟清机场。30日，越南人民军开始向奠边府中心据点群发动进攻，紧缩包围圈，4月初，越南人民军的包围圈已缩小到纵横距离仅1200米到1300米的范围。法军除空投外，包括空降等一切供应手段都被切断。由于越南人民军防空火力封锁严密，就是空投物资也很难准确地投入法军控制的地区。

法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作战，最后连饮水都成了问题，营地、厕所污秽不堪，尸体腐烂臭不可闻，只得戴上防毒面具作战。越南人民军此时也打得极为艰苦，进展速度相当缓慢，有些部队甚至只能用稀饭充饥。

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往往就看哪一方更能坚持得住。此时，武元甲的信心已经有些动摇。胡志明在得知这种情况后，亲自赶往前线总指挥部，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研究了新的打法。中国政府还派民工，翻山越岭，为越南人民军运送粮食和弹药。5月1日，越南人民军在获得充足的粮食及

弹药补给后，士气大振，向奠边府发起了总攻。7日上午，奠边府法军守将卡斯特里准将在组织了一次反扑没有成功后，只得拿出无线电话机向巴黎告别，率部投降。

奠边府战役以越南人民军获得大胜而结束。越南人民军在此役中共毙俘法军 1.6 万人，击落击毁飞机 62 架。法军在奠边府的失败，导致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全面崩溃。

越南人民军攻陷奠边府后的第二天，召开了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除印度支那三国外，中国、苏联、法国、英国和美国参加了会议，经过反复折冲，会议达成了协议，与会国保证尊重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印度支那三国保证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不准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日内瓦会议后，法军开始从印度支那撤军，1956 年撤完了所有部队。从此，法国彻底结束了在东南亚的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法斗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人民历时 9 年的抗法战争，是使越南真正获得独立的战争。这场反对殖民统治的战争首先是正义的，因而必定会获得胜利；其次是在战争的过程中，胡志明、武元甲等人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法军。

在抗法战争之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法军相比，处于绝对的劣势。胡志明、武元甲采取建立农村根据地，与敌人打持久战、消耗战的谋略，这是远离法国本土的侵略军无力承受的。持久战不仅拖疲拖累了敌人，更发展壮大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使之可以与法军相抗衡了。之后，即以优势兵力围歼了奠边府的法军，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一系列谋略，多么类似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应当指出的是，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作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人民，给予了无私的援助，胡志明主席和越南人民都是深知这一点的。

英法以调兵之计侵入埃及 纳赛尔固守运河捍卫主权

1953年4月，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新政府与英国政府就英军撤离地处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反复斗争，英国被迫于1954年10月同埃及签订协定，同意分批撤军。1956年6月，英军全部撤离埃及，但苏伊士运河公司仍为英、法所控制，成了埃及的“国中之国”。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总统的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移交埃及，冻结公司在埃及和在国外的资金和资产。这一决定，震动了西方世界，英、法为夺回对运河的控制权，对埃及进行了种种威胁，乃至发动战争；埃及为捍卫国家尊严，主权和经济利益，不惧英、法的威胁而采取抗争。这一事件最终演变为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这一战争又被称为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的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全长175公里，它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使欧、亚两洲的航程比绕道好望角缩短了6000—12000公里，成为连接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即被英、法帝国主义长期占领：1882年，英国派兵占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了它的海外最大军事基地；1936年，英国和埃及签订了英埃条约。肯定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力；苏伊士运河公司也被英、法垄断资本所控制。埃及殖民化的结果导致运河的大量收入流入了伦敦和巴黎银行。埃及人民为收回运河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1948年至1949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亦即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51年10月，埃及废除了丧失主权的英埃条件。1952年7月23日，以毕业于埃及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巴勒斯坦战争的青年军官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封建王朝，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

埃及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中东的局势，动摇了英、法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和恐慌。尤其是纳赛尔执政后所采取的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的坚决行动，更为英、法政府所妒恨。英、法两国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恢复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对纳赛尔政府进行种种威胁，并冻结了埃及在英、法的存款和运河公司的基金，指令两国商船通过运河时拒不向埃及交纳通行费，向埃及政府进行挑衅。

1956年8月16日，在英、法两国的倡议下，22个国家聚合伦敦，举行有关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会议。美国反对埃及的运河国有化，在会议上提出把运河交给“一个和联合国保持联系”的“国际委员会”管理，这一计划未能获得通过。伦敦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9月19日，美、英、法三国再次召集18国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协会”问题，仍未达成协议。9月30日，英、法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10月13日，安理会否决了英、法要求埃及接受“国际管理”制度提案，并建议埃及和英、法再次举行会议。英、法知道已无法通过谈判或其他压力迫使埃及屈服，遂表面上同意继续谈判，暗中却在勾结以色列，积极准备对埃及发动战争，企图用军事手段来实现谈判桌上未能获得的东西。

当埃及于1956年7月宣布运河国有化后，英国三军参谋长即奉命拟订一项进攻埃及、占领运河的军事计划。8月3日，英国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随

即征召了 2 万多陆军后备投人员入伍。5 日，一个英法联合计划小组开始工作，8 日即拟定了入侵埃及的初步计划。主要方略是：英法盟军在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登陆，然后穿过尼罗河三角洲直扑运河区。这个计划后来又作了修改，决定先用飞机摧毁埃及的空军，然后用空袭破坏埃及的经济、后勤基地和士气，最后在运河北端登陆。8 月中旬，英、法政府分别批准了这个定名为“火枪手”的军事计划，随即就开始向地中海大量增兵。

在策划和准备发动入侵埃及的战争时，英、法觉得两国的兵力不足，法国即提出要以色列参与他们的侵略计划。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以色列对埃及禁止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怀恨在心，早在 1955 年 11 月就制定了一个侵占加沙地带和埃及西奈半岛的作战方案。所以，法国与以色列一拍即合，以色列自愿充当入侵埃及的急先锋。

1956 年 10 月 13 日，法国和以色列双方商定了联合入侵埃及的军事计划；14 日，英、法在艾森的乡村别野举行了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制定了进攻埃及的作战计划。决定由以色列首先向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发起进攻，吸引埃及主力部队支援；英、法随即从塞浦路斯、马尔他、亚丁和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轰炸埃及，摧毁埃及的军事设施；英、法再出动军队从塞得港登陆，向运河区进击，切断埃军的退路；最后由以色列占领西奈半岛全境，英、法占领运河区，全歼埃军。

为支持以色列充当入侵埃及的急先锋，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 30 余架“神秘”式喷气战斗机；以色列的空军驾驶员被秘密派去法国接受训练；法国的教官也穿着便服来以色列传授军事技术；大批法国制造的坦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储备的武器零件，陆续运往以色列。到开战前，以色列共有军队 10 万人、坦克 400 辆、火炮 150 门、作战飞机 155 架。

面对英、法、以三国的威胁，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政府决心严阵以待，抗击任何敢于发动侵埃战争的入侵者。当时，埃及总兵力约为 15 万人、坦克 530 辆、火炮 500 门、作战飞机 255 架，但有许多飞行员和坦克手还在苏联受训，多数先进和重型装备尚不能在实战中发挥作用。如：2000 辆苏制坦克只有 50 辆可供作战；100 架米格式战斗机只有 30 架可飞行；50 架辛式轰炸机只有 12 架可用。虽然有 255 架作战飞机，其中能完成作战任务的仅 100 余架。为防止可能发生的进攻，纳赛尔总统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包括组织“民族解放军”；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强集体防务；同叙利亚、约旦组成联合司令部；制订运河区保卫计划，把保卫运河及尼罗河三角洲作为防御重点，等等。

1956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5 时，由以色列为急先锋的入侵埃及的战争爆发了。以色列上校阿里尔·沙龙指挥以军 202 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 500 余伞兵和部分武器装备。同时，该旅的主力 3000 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

埃军统帅司令部接到前线报告后，东部军区司令部于当日 20 时命令第二步兵旅的第 5 营和第 6 营立即开过运河，迎战米特拉山口的以军空降部队。同时，埃军总参谋部派遣第 4 装甲师的主力由运河西岸进入比尔·吉夫贾法地区，两个国民警卫旅尾随前进。第二侦察团向东南运动，企图切断以色列空降部队的退路，对米特拉山口的以军构成包围之势。

米特拉山口全长 30 公里，两旁悬崖峭壁，十分险峻。10 月 31 日中午时

分，以色列军队两个连，包括坦克支队和重迫击炮队组成的侦察分队进击米特拉山口。当以军进入海坦谷地时，即遭到埃军 5 个连伏兵的袭击。埃军占据了南北两侧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火力优势，打得以军进退两难，只得利用临时工事进行抵抗。双方激战至黄昏，以军才占领海坦谷地东部。

以军为实现“中间突破”的战术，威胁西奈北部埃军主力，配合第 202 伞兵旅在南线的进攻，派遣第 38 特遣部队突击位于西奈半岛东北部的阿布奥格拉。阿布奥格拉东距埃以边境 30 公里，向西可通往运河重镇伊斯梅利亚，从阿里什到库赛马的公路也须经过这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埃军在阿布奥格拉的前方鲁阿法水坝、乌姆希汉和乌姆卡特夫，都筑有坚固据点，形成了完整的防卫体系。所以，当 10 月 30 日中午以军第 7 旅进至乌姆卡特夫南线 600 米处时，遭到埃军反坦克火炮的射击，损失不小。

以军正面进攻失败后，第 7 旅奉命采取迂回战术，于 31 日拂晓越过埃军防守薄弱的达卡山口，进逼阿布奥格拉和鲁阿法水坝。同时，以军南部军区司令部为配合第 7 旅行动，命令第 10 步兵旅提前于 30 日下午出动。由东向西正面进攻，于当晚抵达乌姆希汉和乌姆卡特夫的东线，第 7 旅由乌姆卡特夫南面进攻。埃军也从阿里什和运河方向调集部队增援阿布奥格拉。

10 月 31 日，以军第 7 旅对阿布奥格拉发起进攻，受到埃军顽强抵抗和准确的炮火轰击。中午，埃军两个步兵营夹击以军。以军在空中人力支援下，占领了阿布奥格拉，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向西推进，一路向东围攻鲁阿法水坝埃军据点。埃军凭借 20 多个反坦克掩体组成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但未能抵挡住以军的避攻。

10 月 31 日，以军总参谋长达扬将军亲自督促第 10 步兵旅进攻乌姆卡特夫，但遭到埃军炮火猛烈袭击，进攻屡屡受挫，即使撤换了旅长古迪尔，仍不能得手。以军又命令第 37 机械化旅进攻乌姆卡特夫，11 月 1 日凌晨，第 37 旅先头部队发动进攻，遭到埃军炮兵和反坦克武器的集中射击，后续部队也误入雷场，旅长艾林达阵亡，大部分官兵受伤，进攻失败。以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命令停止进攻乌姆卡特夫阵地。

正当埃及军队在西奈抵抗入侵以军，大批埃军由运河区开进西奈并准备进行大规模反击的时候，英、法两国借口保护运河航运，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埃、以双方停火，并允许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否则派兵干涉。纳赛尔总统当即拒绝了英、法的无理要求。纳赛尔明白英、法的“最后通牒”不过是出兵入侵埃及的借口罢了，与英、法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0 月 31 日下午，英、法空军对埃及的 15 个机场、一些兵营和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等城市的重要经济、交通设施，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同时轰炸西奈的埃军部队，企图将埃军拦截在西奈半岛。

埃及识破了英、法的这一战略企图，纳赛尔总统为防止英、法占领运河区，而使西奈埃军受到夹击的危险，在英、法空袭后，立即命令增援部队停止进入西奈，在西奈的守军迅速撤至运河区。这样，埃及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出西奈半岛。驻守在乌姆希汉和乌姆卡特夫的埃军，虽受到以军的三面包围，仍然利用夜色掩护，向阿里什方向撤退。

10 月 31 日，以色列军队在英、法空袭埃及后，开始向准备撤退的埃军进攻。但沿途遭到埃军的顽强阻击。11 月 2 日凌晨，当以军进驻阿里什时，

埃军主力已全部撤出西奈半岛，从而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运河区，埃军同英、法军队的战斗主要在塞得港进行。从11月1日起，英、法空军对塞得港进行连续轰炸。11月5日拂晓，英军舰载机又轰炸了塞得港和富阿德港的埃军防御阵地，上午8时20分，英、法向塞得港空投了第一批伞兵，英军伞兵约600人在加密尔机场周围着陆，并迅速占领了机场；法国伞兵500人在富阿德港降落并很快占领了供水厂。下午1时45分，英、法又在这两个地区空降了第二批伞兵。

11月6日上午，英、法军队首先用猛烈炮火袭击塞得港防御阵地，然后2.2万名海军陆战队员开始登陆。英海军第3突击旅在塞得港登陆作战，法国海军陆战旅在富阿德港登陆。6日深夜，英、法登陆部队沿苏伊士运河南下，企图一举占领运河区，但遭到了埃军的顽强抵抗。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埃及军民奋起保卫塞得港。英、法第一批伞兵着陆后，即遭到塞得港守军的反击，埃及当局通过设在各重要地点的广播，迅速告诉居民敌军的降落地点，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协助守军消灭敌人。使英、法侵略军始终未能全部占领塞得港，先头部队只进到塞得港以南27公里外的卡卜。

英、法公然对埃及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苏联以及世界各国强烈谴责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侵略，英、法极为孤立，被迫接受联合国停火协议，于11月6日宣布停火。12月，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埃及。1957年3月，以色列军队也撤出埃及。

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英、法、以三个入侵者的失败而结束。兵力及武器装备均处劣势的埃及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就在于它是为捍卫国家主权而不得不进行的反侵略之战，故能充分得到国际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苏伊士运河之战正是这一公理的证明。从军事谋略的观点来看，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双方都不乏成功之处。英、法鼓动以色列的参与以及首先从守备薄弱的西奈半岛发动进攻，调动了埃及在重点防御的运河区兵力的增援，这就很有利于英、法军队完成攻占运河区这一主要作战目的。同时，对奔袭或救援或撤退的埃军都可能予以围歼。埃及的纳赛尔总统正确地看到英、法发动战争的目标是运河区，故以重兵在此防御，而几乎放弃了西奈的防御。当以色列在西奈发动进攻时，他虽从运河区调兵去增援，但很快就识破英、法调兵之计，不仅火速令援军撤回，而且连西奈守军一并撤至运河区。这样，更加强了运河区的防御，对人民群众的发动，使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从而获得了胜利。

美国总统以强权压古巴 卡斯特罗不屈服抗侵略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11月29日，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678号决议，授权集结于海湾地区的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解决海湾危机时，有一个中非洲的国家与美国针锋相对，投了反对票。1991年4月3日，当联合国又一次通过海湾战争正式停火条件的决议时，这个国家再次与美国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这个不畏美国强权的国家就是地处美国近邻的古巴，它的领导人就是刚强的卡斯特罗。古巴之所以要反对美国，是因为卡斯特罗以及古巴人民，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太清楚了……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北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海里，是一个美丽的岛国，在那里居住着白种人、黑种人、印欧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等。在11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储藏着重铁、镍、钴、铜、锰和石油等丰富的矿物资源，首都哈瓦那为西印度群岛的著名良港。

古巴在16世纪初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古巴。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古巴革命的胜利引起了美国的惊慌，美国采取过一些措施，力图把古巴新政府继续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如邀请卡斯特罗访美等，但卡斯特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于是美国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企图扼杀古巴革命的手段。起初主要是依靠经济封锁，妄图以此来威胁古巴屈从于美国。但是，卡斯特罗硬是顶住美国的种种威胁，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经济封锁的失败使美国转向武装干涉。1960年3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项命令，责成中央情报局“组织、武装和训练古巴侨民，作为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游击力量”。同月，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就在古巴策划了一起大规模的挑衅事件，在哈瓦那港炸毁了装载一批武器的法国“库弗尔”号轮船，企图给古巴政府造成内乱及外交麻烦。但是，在美国的严重挑衅面前，卡斯特罗毫不示弱，他针锋相对地宣布把美国在古巴的总数达10亿美元的财产收回国有，并立即付诸实施，作为对这一挑衅事件的回答。

卡斯特罗决不向强权妥协与屈服的态度，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极大愤怒，他们决心要颠覆卡斯特的革命政权。

从1960年10月起，美国借口“防止古巴袭击”，就加紧在关塔那摩基地集结海军陆战队和军舰。为了准备入侵，美国于12月2日向古巴反政府侨民提供了100万美元的资助，让他们在迈阿密建立了招募和训练反政府力量的中心。同时，美国不断派出飞机袭击古巴城乡，连续在加勒比海举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除在关塔那摩加强军事部署外，还在佛罗里达州和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巴拿马的美军基地训练雇佣军，由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军事专家负责训练。

美国对雇佣军寄予最大的希望，妄图靠这些雇佣军完成颠覆卡斯特的革命政权的梦想。他们要求雇佣军除了入侵古巴的直接参加作战外，还负有暗杀古巴政界要员、炸毁古巴重要设施、联络古巴反政府骨干分子等特殊使命。在雇佣军中，他们还以高价豢养了一批所谓的“敢死队”。他们计划由雇佣军

在古巴登陆，然后立即成立“反对派政府”，向美国要求援助，美国即可正式出兵干涉。

但是，卡斯特罗不是孬种而是硬汉，古巴决不是一块“橡皮泥”，光凭一支雇佣军是难以将古巴捏成主观臆想的東西的。

1961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肯尼迪上台了。仅仅过了一天，他即在1月22日召集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新行政机關的负责人員开会，讨论反政府力量在古巴登陆的具体计划。1月28日，肯尼迪又在扩大的第二次会议上向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进一步明确了发动侵略古巴的任务。国务院受权与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进行外交交涉，以便在政治上孤立古巴。

美国雇佣军共约2000人，受训后被编为一个旅，代号为“2506旅”，该旅由4个步兵营、1个摩托化营、1个空降营和1个重武器营编成。此外，该旅还辖有1个坦克连、1个装甲支队和若干辅助分队。按照美国的计划，雇佣军2000人为登陆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由美洲国家组织各国的“泛美武装力量”派出1.5万人组织。所有物资保障均由美国提供，美国为此专门建立了两座连结迈阿密与危地马拉、巴拿马的空中桥梁。

1961年4月12日，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不会进攻古巴。然而，这不过是美国在入侵古巴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之后为隐蔽侵略行动而企图使人们丧失警惕的一种障眼法。

早在4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秘密散发了一本小册子，号召古巴反政府分子起义，并答应在反对古巴革命政府的斗争中全面援助他们。4月4日，肯尼迪批准了由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制定的入侵古巴的代号为“冥王星”的战役计划。计划分为二部分：一是向古巴境内派遣雇佣军侦察破坏组，其任务是为“2506旅”主力入侵创造条件，并与在古巴地下活动的反政府力量建立直接联系；一是由“2506旅”主力在古巴猪湾沿岸登陆，由此向科隆地区发展进攻，夺占科隆后，由逃亡美国的古巴反政府领导人组成古巴“革命委员会”。登陆时间定为4月17日。

为配合雇佣军在古巴登陆，美国还准备在古巴海岸附近展开美国大西洋舰队部分兵力；在入侵前两天和登陆当日早晨，准备派出24架B—26轰炸机、14架运输机实施强大的航空兵突击，以消灭古巴空军，瓦解古巴政府军的士气和抵抗意志。

4月15日，雇佣军使用由美国海军提供的5艘武装运输船、3艘登陆舰和7艘登陆驳船合编成所谓“海军战术中队”驶向古巴海岸。美军陆队的舰艇也同时从东面迂回古巴，开始在其南海岸附近展开。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从卡贝萨斯港机场对古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和居民地，其中包括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了轰炸。

面对侵略，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所有能作战的飞机都转移到了预备机场，共和国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古巴当时的基干军队为数不多，由步兵及一些装甲坦克兵、炮兵、防空兵、航空兵和海军的部队、分队编成。古巴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是民警部队，其巡逻队负责执勤和警卫海岸。

4月17日夜間2时，由美国特种兵编成的潜水员首先在拉尔加滩地区登上古巴领土。当时在岸上的由古巴民警部队5名战士组成的巡逻队同他们交火，在兵力悬殊的战斗中全部牺牲，但他们已及时向自己的首长报告了敌登陆兵开始入侵的紧急军情，并迟滞了他们的推进。紧接着，雇佣军开始在吉

隆滩地区登陆，这里只有一支人数不超过 100 人的古巴民警队在执勤。美军又空投了一些伞兵群，用以切断由猪湾沿岸经沼泽地通往古巴腹地的道路，以此配合“2506 旅”主力向科隆以及亚瓜拉马斯和奥斯特拉利亚方向推进。武装干涉者利用突然袭击和兵力优势，于当日中午进至亚瓜拉马斯以南地区，受到了古巴武装力量有组织的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为顺利击退武装干涉者的猛攻，古巴革命政府宣布总动员，由共和国总理卡斯特罗统帅武装力量。4 月 17 日晨，古巴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号召坚决抵抗侵略者。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部把起义军和民警部队的主力调往武装干涉者的登陆区域，领导武装斗争的作战指挥所直接迁到作战地带。同时，群众组织和安全机关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国内的叛乱。

4 月 17 日下午，古巴武装力量转入反攻，并开始逐步迫使敌人退却。尽管由美国直接出面的武装干涉者掌握了制空权，古巴空军仍击落了 6 架敌机，炸沉了运载着一个营雇佣军的“豪斯顿”号运输船。当晚，美国军舰企图以火力阻止古巴各部队的推进，以改善被迫后退的“2506 旅”各营的不利态势，但并未能阻止古巴政府军的反攻。古巴岸防分队和海军分队的坚决行动击退了一切袭击。这些兵力还使入侵者无法从海上向已登陆的雇佣军控制地点运送弹药和装备。

4 月 18 日拂晓，古巴武装力量从奥斯特拉利亚、卡瓦东加、亚瓜拉马斯地域向入侵之敌展开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入侵者无法击退古巴政府军的突击并扼守所夺取的地区。武装干涉者伤亡惨重，被迫向吉隆滩退却。到晚上，雇佣军的几个营已被压迫到拉莫纳、圣布拉斯和吉隆滩三角地区。

一个个入侵失利的消息在 4 月 18 日不断地传送到美国五角大楼，战役的发展使美国的“冥王星”计划制定者难以入睡。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继续支持雇佣军问题，但根本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此时，苏联政府已就入侵古巴事件发表了坚决声明，中国和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表示在古巴人民争取共和国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中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4 月 19 日拂晓，古巴武装部队和民警队根据古巴统帅部的命令，在进行了 30 分钟的炮火轰击后，向武装干涉者阵地展开了猛烈进攻，从三个方向向吉隆滩实施突击。雇佣军深知这个面积不大的登陆场背后就是大海，无处可退，只得负隅顽抗。经过一整天的激战，雇佣军已无法抵抗古巴政府军的猛攻。

美军在 4 月 19 日出动了空军和海军，企图救出被击溃后残存的雇佣军及古巴反政府分子。古巴空军在早晨顺利击退了由卡贝萨斯港机场起飞的美军 B—26 轰炸机的突击；白天又对美军的驱逐舰实施了突然轰炸，炸毁了部发救生器材，并与古巴海军的护卫舰艇一起，把雇佣军的浮动工具逐离海岸。这样，雇佣军的补给和后撤均遭破坏，侵略者只得缴械投降。

由美国策划的入侵古巴的“冥王星”计划不到 72 小时就被击溃了。雇佣军在入侵古巴过程中被击毙 82 人，被俘 1214 人。古巴政府军还击落美国飞机 12 架，缴获“谢尔曼”M—41 坦克 5 辆、装甲运输车 10 辆和“2506 旅”的全部轻、重武器。

这次侵略古巴的军事行动一年后，即 1962 年 4 月，1200 多名雇佣军被送上古巴革命军事法庭，法庭以充分的材料揭露美国是这次侵略的组织者和唆使者。法庭对雇佣军进行判决，并裁定他们在侵略过程中给古巴造成了总

数为 5300 万美元的损失。美国政府向古巴照付了全部款额，古巴才释放了美国的雇佣兵。

美国虽然在 1961 年对古巴的军事入侵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仍然没有放弃侵略古巴的阴谋。1962 年 2 月，美国又施加压力把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并不断越过古巴边界，侵犯古巴的领空和领海，轰炸古巴的城市。然而，由于卡斯特罗始终以决不妥协的姿态与之抗衡，使美国的阴谋不能得逞，到 1962 年底的古巴导弹事件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不得不向全世界保证，美国将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美国政府承担义务，不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这是古巴人民的胜利。

五千里远距离夜袭恩德培 以色列四飞机解救被劫者

以色列虽然国家小，人口少，但从来不被外来压力屈服。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总是不择手段；为了自己同胞的安全，他们总是拼尽全力。他们最善于创造奇迹！

1976年7月，以色列特种部队某营在拉宾总理的直接指挥下，闪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同劫机犯展开较量，从死亡线上营救同胞获得成功的惊险军事行动，就被全世界都公认为“一个极为突出的奇迹”。

1976年6月27日，一架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往法国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第139航班A300B—4飞机在雅典被劫持，劫机者是两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西德人。这架飞机共有242名旅客，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劫机者提出，要用这242名旅客作为人质，换取关押在以色列的53名巴勒斯坦人。否则，将杀死全部人质。7月1日是劫机者提出的最后期限。

“6·27”劫机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拉宾总理立即召集了由国防部长、运输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不管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危机对策委员会会议。此时，对139航班一直进行严密监视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又送来新的消息，139航班已被劫持到利比亚的班加西机场加油，据悉在加油后要转向非洲大陆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犯是1972年5月8日劫持比利时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的首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瓦地·哈达特及其部下；被劫飞机经过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时，又有6名恐怖分子参加，使劫机犯人数增加到10人。危机对策委员会根据以色列从来不为外来压力屈服的原则，决定不向劫机者妥协。但是，为了242名旅客的生命，尤其是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同胞，又决定竭尽全力进行营救。

以色列虽然国家小，人口少，却依靠科技力量，在几次中东战争中都屡屡获胜，对营救人质之类的“军事游戏”也并不陌生。哈达特1972年劫持人质事件，就是以色列使用特种部队而成功营救的。自那以后，以色列更坚定了决不向恐怖分子“交涉”的强硬态度。拉宾总理命令总参谋长古尔将军具体负责营救事宜。他还根据劫机犯哈达特以前的所作所为，判断他还有可能返回特拉维夫，于是命令特种部队换上便衣进驻本格里奥机场。

查明139航班的下落后，古尔将军立即与国防部长佩雷斯在国防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营救方案。由于哈达特在1972年时劫机被以色列击溃而失败，故这次劫机手段更为高明，以色列的营救十分困难。专门会议认为：乌干达距以色列的直线距离就有3000公里，沿途又没有与以色列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长途奔袭的机群一旦被阿拉伯某个国家发现，不但不能营救，甚至连营救部队也会被阻击，人、机难保；乌干达总统阿明近年与利比亚总理卡扎菲上校接近，具有明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倾向，他可以貌似公正地充当劫机犯与以色列谈判的中间人，而实际上站在劫机犯一边，面对如此棘手的难题，负责具体行动的古尔将军没有优柔寡断，他拟定了两套方案：一套是运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的A案，另一套是利用军事手段的B案。拉宾总理在肯定两套方案的同时，明确指示争取A案，但重点要落实到B案，劫机犯是不大可能妥协的，只有靠B案解决，才能制止今后重演恐怖活动。

劫机第三天，即6月29日，乌干达广播了劫机犯的要求，即：必须释放

被关押的 53 名在押犯，其中在以色列的 40 名，在联邦德国的 6 名，在肯尼亚的 5 名，在瑞士的 1 名，在法国的 1 名；必须在格林威治时间 7 月 1 日 14 时前作出答复。如不满足以上要求，将杀死人质，炸毁飞机。6 月 30 日下午，劫机犯主动释放了除犹太人以外的 47 名老人、妇女和儿童。

人质家属要求以色列政府答应劫机犯的要求，释放 40 名在押犯。拉宾总理授意古尔将军拖延时间。7 月 1 日早晨，以色列表示了原则上同意释放在押犯及和平解决劫机事件的意向，劫机犯在得到这一答复后，主动把最后期限延长了 72 小时，改为格林威治时间 7 月 4 日 14 时；又再次释放了 10 名非犹太人乘客。这样，机上还扣留包括机组人员在内的 94 名人质。

劫机犯延长最后期限的决定，为以色列探索实施强硬政策的 B 案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古尔将军立即拟定了“乌干达慈航计划”，即派遣突击队突击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作战计划，经拉宾总理、佩雷斯国防部长为首的指挥部讨论通过。拉宾任命以色列国防军空降部队司令部谢姆龙准将为营救部队指挥官，负责指挥从以空降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 269 反叛乱部队”中选拔出来的营救部队，约尼·尼坦亚胡中校担任地面突击指挥官。

以色列情报部门此时又获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从被释放后飞达巴黎的非犹太人乘客中获得了人质的分布及受监视的情况；全部人质被监禁在恩德培机场的旧候机楼内，而此楼正好是以色列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建造的，以方有详细的设计图纸。

根据这些情报，谢姆龙将军立即拟定几套以伞降、直升机降和运输机机降方式进行营救人质的方案，最后确定采用运输机机降方式，又经过电子计算机的精密计算，选定 166 人组成突击队，由尼坦亚胡中校迅速集中到维特拉夫南部沙漠中的空军基地，按作战预案进行恩德培机场营救人质的实战训练。

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在外交上采取反对以色列的立场、而在这次劫机事件中同情以色列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给予秘密协助，具体问题就是给以色列运输机加油。因为航程本已达 3000 公里，而且以色列飞机是执行营救任务，必须相当秘密，途中还要避开非友好国家，不得不在海上绕行，这样航程就达 4800 公里，无论如何往返途中必须着陆加一次油。这一请求得到了肯尼亚政府的默许，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允许以色列飞机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包机”名义经埃领空飞往肯尼亚。

一切准备就绪后，拉宾总理于 7 月 3 日下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要求内阁批准实施命名为“雷电”的营救人质作战计划。经过讨论，内阁于以色列时间 15 时 30 分，正式通过了这项议案。而营救部队为了争取时间，早已在内阁批准之前就已沿红海南下了。出发前已经约定，若内阁未能批准营救计划，将立即通知营救部队返航。

参加“雷电”作战计划的突击队员共分为 5 个组，以谢姆龙将军为首的几名军官组成作战指挥组，其余 4 个组为作战部队，由尼但亚胡中校具体指挥。作战部队的任务具体分工为：第一组以模拟成乌干达总统阿明的专车模样的奔驰牌汽车为先导，几辆运兵车紧随其后，直扑旧候机楼负责营救人质；第二组负责人力压制跑道、新候机楼和飞行管制指挥塔；第三组作预备队，主要用于候机楼方向；第四组乘装甲运兵车先向旧候机楼方向突击，而后炸毁机场雷达和米格战斗机，负责断后，确保营救部队和人质安全撤离。

除参加营救部队的 5 个组分乘 4 架 C—130E/H 运输机执行强行着陆任务

外，同行的还有 8 架 F—4 战斗机执行途中护航任务，1 架 KC - 130 加油机为战斗机空中加油，1 架 C——130 通信机专门执行无线电通讯中继任务。除此之外，另有两架波音 707 飞机：一架是指挥机，乘坐的是担任作总指挥的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阿达姆中将、空军司令佩雷德少将，已飞至乌干达边界维多利亚湖上空；一架是医疗飞机，乘坐的是以法克特尔医学博士为首的 33 名医生和护士，也已先期以“以色列航空公司包机”的名义到达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机场。

乌干达时间 7 月 3 日 23 时 01 分，满载营救突击队员及装备的以色列一号运输机从维多利亚湖一侧进入恩德培机场，并顺利在已经关闭跑道灯的主跑道上着陆。后货舱门在飞机滑跑过程中就已打开，飞机刚一停稳，脸上涂着黑色迷彩的突击队员就乘坐着奔驰车和运兵车冲下跑道，尼坦亚胡中校带领第一突击组的 35 名突击队员，仅用 3 分钟就冲进了关押人质的旧候机楼。他用只有犹太人才能听得懂的希伯来语大声喊了一声“卧倒”！“哗”的一声，所有的犹太人立即趴在地上。就在这一刹那间，几十支冲锋枪同时向候机大厦一阵扫射，火舌像出笼的毒蛇一样乱窜。4 名动机犯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栽倒了。

与此同时，第二、三、四号运输机相继以两分钟的间隔顺利着陆，分别投入了营救人质的战斗。第二组突击队员冲到新候机楼和飞行管理指挥塔前，控制了机场，防止乌干达军队介入。第三、第四组参加了旧候机楼的战斗，他们与守卫在那里的动机犯展开了枪战。突击队员一边高喊：“我们是以色列部队，快投降！”一边向候机楼扑去，守在门口的 2 名德国籍劫机犯首先被击毙，经过一阵激烈的枪战，又有 1 名劫机犯被击毙。另外 3 名劫机犯见事不妙，立即逃之夭夭。

突击队员为击毙的劫机犯拍照并进行指纹取证后，迅速组织人员撤离。在撤离过程中，与守卫指挥塔台的乌干达士兵发生了枪战，打死打伤乌军 100 余人，指挥官尼坦亚胡中校不幸中弹。

23 时 52 分，二号运输机载着尼坦亚胡等在枪战中受伤的突击队员和人质，首先起飞赶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紧接着，四号运输机和三号运输机也飞离恩德培。一号运输机最后离开，它是在突击队员为了防止乌干达空军追击而炸毁了 10 架乌干达空军的米格—17 和米格—21 战斗机后于 4 日 0 时 40 分才起飞的。一号运输机第一个在恩德培机场着陆，最后一个离开，在恩德培机场总共停留了 100 分钟。即是说，这次营救人质的“雷电”作战计划总共历时 100 分钟。

营救人质的任务顺利完成后，4 架 C——130E/H 飞机飞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机场加油，为规避乌干达方面可能的拦击，他们取道印度洋，经雅典湾、红海，采用低空飞行方式，于以色列时间 7 月 4 日 11 时 01 分在特拉维夫机场安全着陆。

这次作战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以色列突击机群犹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顺利地飞抵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上空，并在一个武装了的机场，一个堆满了炸药的机场强行着陆，依恃其突击队员的神勇，迅疾地抢走了全部被劫持的人质。此类近似荒诞的行径，却由以色列人变成了铁的事实。

以色列以武装手段袭击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抢救人质的偷袭，确为一次精心策划，令人叹为观止的军事奇迹。以色列自立国后，历来持强硬态度，从

不向外来压力屈服。在人质事件上采取“不与恐怖分子交涉”的谋略，并非不重视人质的生命，而是与恐怖分子交往的正确决策。如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在当时是深感外来压力颇重及孤立的，如果向妥协分子妥协一次，就必定会有二次、三次，则永无结束之日。只有不妥协，才能真正减少乃至杜绝这类以劫持人质进行某种要挟的事件发生。不向恐怖分子妥协，却为同胞生命而拼尽全力，精心策划的恩德培机场抢救人质行动，就是证明。这次代号为“雷电”的作战行动，从谋略上，首先是“缓兵之计”，假意许可劫机犯要求，争取了时间，才能制定作战方案并得以实施。其次是远距离奇袭。情报部门及时提供的可靠情况并据此而制定出的方案称得上是奇袭战中的杰作。再次是外交手段。肯尼亚和俄塞俄比亚当时与以色列并不友好，而以色列仅仅抓住他们不赞成劫机就能获得他们对奇袭乌干达机场的帮助，不能不认为是外交上的一次成功。

铁娘子铁将军各施铁腕 不列颠阿根廷马岛大战

当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亲自部署军队于1982年4月2日夜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时，大英帝国被震惊了！英国报纸以“可耻”一词概括了英国人对马岛陷落的心情。这一心情导致了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政府陷入空前的危机，外交大臣卡林顿、外交国务大臣阿特金斯、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政务次官卢斯均引咎辞职。可是，撒切尔夫人毕竟是“铁女人”，在下议院于4月3日这个按惯例不开会的日子而破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在一片要她“辞职”的呼喊声中，她霍地站起来，以特有的英国标准口音当众宣布：“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一支大型特遣舰队一旦准备就绪便立即出发！英国皇家海军‘无敌’号航空母舰首先起航，将于星期一离港。”她停顿了一下，“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我代表执政党向议会提出，对阿根廷宣战！我们将会取得胜利！”议会大厅鸦雀无声，一秒，两秒……，铁女人惊呆了，难道议员们不支持她的决定吗？到第四秒的时候，全场一片轰响，议员们全体起立，纷纷举起双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议会第一次全票通过的一项决议。不过，确有许多人为撒切尔捏了一把汗，“军中无戏言”，铁女人再有办法，可她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组织成庞大的舰队，何况，英国距马岛可是13000公里啊！面对已经全力备战的阿根廷，她能取得胜利吗？

1982年4月6日，在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后仅仅4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便宣布对阿根廷实行经济制裁，并禁运一切军火，派出特遣混合舰队远征南太平洋失地。当天，以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和“无敌号”为首的包括作战舰、辅助舰队以及征用民船队等三大部队共约106艘战舰连同陆战队兵力共约27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向南大西洋远征。这支部队，已抽调了英国海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撒切尔夫人可谓破釜沉舟了。

英国皇家海军作战指挥部为这次远征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特混舰队三大船队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作战艇封锁马岛周围200公里范围内作战区域，切断阿根廷同马岛的联系，并实施登陆；辅助舰队为作战舰艇提供战区前线后勤支援，进行油料、弹药、粮食、军需物资的海上补给；征用的船队则主要进行战区后方支援，包括兵员、油料、粮食、军需物资的运输，伤病员的医疗救护、战损舰艇的修理以及各类救助作业，还为鹞式飞机、直升机提供装载起降场所。

英国空军出动了举世闻名的“鹞”式飞机，这种飞机可以垂直起落或短距离起落，是英军主要的喷气式战斗机，陆军用鹞式战斗机可以在地势复杂的地方自由起落，海上舰载鹞式飞机则可以在甲板上短距离起飞，并执行对舰艇、对潜艇的攻击及侦察任务，并进行有效的空防。装备的30毫米“艾登式”机关炮每次可发100发炮弹，还配有响尾蛇式空对空导弹，并按需要配备空对舰导弹及1000磅左右的自由落体炸弹。机动灵活，轻便适宜，是典型的多功能空军机型，对400海里之内的目标进行观察、拦截、战斗、空中支援，其有效性非常强。

皇家海军作战指挥部还注意寻找了一位名叫里夫·巴顿的姑娘。她是一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曾在马岛住过很长时间，手头有岛上所有无线电爱好

者的名字。在4月2日阿军占领马岛时，加尔铁里曾封锁过消息，将阿军占领马岛这一情况首先报告伦敦的就是马岛上的英籍居民鲍博，所使用的就是自制的发报机。通过巴顿提供的名单，英方可以用无线电与马岛上英籍居民联系，从而掌握马岛上的可靠、准确的情报。

统率万里远征特遣舰队的司令，由撒切尔夫人亲自确定为49岁的海军少将约翰·伍德沃德，仅从他的绰号为“海狼”即可知他是一位善于海上作战的优秀指挥官。

撒切尔夫人在派遣三军出击的同时，又让英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控告阿根廷，既承认要与阿根廷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又反对武力解决问题。安理会于是通过决议，要求阿根廷撤出军队并同英国人坐下来谈判解决争端。英国方面利用舆论宣传大作文章，他们或公开或秘密地拉拢欧洲盟国及北大西洋盟国，造成欧洲各国几乎一致“声讨”阿根廷的形势。

恶战迫在眉睫。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也加紧调兵遣将，成立了南大西洋战区，加紧向马岛输送作战部队和军需物资，坦克和装甲车一批又一批地运上马岛，使那里的阿军人数很快增至万余人。

4月中旬以后，英国战舰陆续抵达马岛海域。在此之前的4月7日英国政府就已经宣布，从4月12日开始，马岛周围200海里内为作战区域，任何进入这个区域的阿根廷舰船都将遭到英军的攻击。4月16日，英军直升机即在南乔治亚岛击沉阿根廷“汕太飞号”潜艇。

4月22日夜晚，14名英军突击队员，悄悄地在南乔治亚岛上潜游登陆，进行侦察。发现岛上只有44个阿军士兵，说得上有威力的武器就是一个迫击炮班。25日夜，根据侦察得知的守岛阿军的阵地和火力配置，伍德沃德将军组织了对南乔治亚岛的机降作战，100多名突击队员从天而降，经过两小时激战，迫使阿根廷守岛部队投降，重占了南乔治亚岛，为特混舰队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和前进基地。这是英国人的首次胜利。伍德沃德司令高兴地举起香槟酒，表示祝贺，他下令所有舰只继续向马岛进发。

阿根廷人此时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战争。虽然他们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决心与英军拼个你死我活，可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短处：当时，阿根廷的军队已经有100年没有正式作过战了。守卫马岛的士兵中有60%是服役不到4个月的新兵，能指望他们守住马岛吗？

4月28日，英军特遣舰队开始对马岛进行封锁。这是一种立体的环形封锁：在蔚蓝色的海水底下，是核动力潜艇，随时可能发射导弹和鱼雷；海面上，是各种各样的军舰，随时处于戒备状态，火炮和导弹发射架揭开了迷彩蒙布，露出140毫米口径远程火炮和近程地空、地地导弹；在它们的上空，是日夜盘旋着的飞机，时刻准备攻击敌方目标。这样，无论是从布兰卡港还是从其他港口开出，试图进入马岛海域的阿根廷船只，大多受到拦阻。阿根廷对马岛的后勤补给计划当时并没有完成，于是，1万多名陆军官兵甚至有一大半没有帐篷可住，夜晚只得披着薄薄的毛毯御寒。

战斗还没有打响，英军仅仅是把马岛像被紧箍着的木桶一样地围困起来，就已经基本上预示了战争的结局。

撒切尔夫人注视着国际舆论。欧洲共同体已经决定对阿根廷实行禁运，包括武器禁运；西德政府宣布停止发运已经为阿根廷营造好的4艘现代化护卫舰；法国撤回他们在阿根廷的技术专家、拒绝在使用“飞鱼”导弹方面再进行合作，并停止为阿根廷建造价值3.5亿美元、可载1000人的巨型航空母

舰，同时停止制造这艘航空母舰上的 14 架飞机；荷兰方面停止出售雷达给阿根廷；美国充当了一阵调停人，而“调停”方案因有利于英国人而被加尔铁里拒绝，于是一屁股坐在英国人一边，甚至公开允许远离本上的英特遣舰队使用它的阿森松岛军事基地。有了这些后盾后，4 月 30 日，撒切尔夫人向伍德沃德发出战令。

5 月 1 日，英国特遣舰队的“鹞”式飞机向马岛的陆上目标发起攻击，水面战舰也开始炮轰这些目标。英、阿双方的飞机在马岛上空进行空战。阿军在马岛的小型机场的跑道及其他军事设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后，英军不断地轰炸马岛的机场、雷达站和仓库。

5 月 2 日，跟踪多日的英国核潜艇“征服者号”在 200 海里戒严区外捕捉到了阿根廷唯一的一艘远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打不打？不打，机会可惜了！打，阿军舰只在 200 海里戒严区外，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伍德沃德不敢作主，请示撒切尔夫人，她一挥手，“打！”为了战争的胜利，铁女人只好将公理置之度外了。随着“征服号”潜艇从海底发射的两枚鱼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这只已服役 40 年，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中险些被日本飞机炸沉，尔后转战四方，战功卓越的巡洋舰终于葬身海底，舰上 321 人全部丧生。

加尔铁里总统气急败坏，急令阿根廷海军船只一律返回本土军港，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外出。一时间，阿根廷的海军力量似乎从南大西洋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阿根廷人已经自认失败。

就在英国人举杯庆贺胜利，高兴地谈论阿根廷海军已像老鼠见到猫一样躲了起来时，加尔铁里总统实施了一项大胆的计划。

英军特遣舰队中有“谢菲尔德”型驱逐舰，阿根廷人也购买过这种舰艇，他们对这种军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仅知道它的优点，也对它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5 月 4 日，阿根廷“5 月 25 日号”航空母舰悄悄地出发了，它冒险通过了英军的封锁线，然后使用法国“超级军旗式”战斗轰炸机发射了“飞鱼式导弹”。这种导弹采用十字型弹翼和控制翼，由两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以接近音速的高速飞行，导弹内装有 85 公斤高烈性炸药，能穿过装甲，钻入船体内部爆炸。飞鱼导弹能自动捕捉目标，从而一举击沉了英国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使 20 多名英国水兵丧生。5 月 25 日，阿根廷故伎重演，飞鱼导弹又击中了英军“大西洋运送者号”运兵船。同时，阿根廷的 8 架“天之鹰式”战斗轰炸机以超低空飞行接近英舰，用数枚 500 公斤重的重磅炸弹，击沉了“考文垂号”驱逐舰。

在初期战争中，英、阿双方互有胜负。然而现代战争的消耗是巨大的，因此战争不仅是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还是经济力量的比赛。在这方面，阿根廷实在不是英国的对手。阿根廷自己没有生产先进武器的能力，经过几周的战争消耗，军火供应已十分紧张。比如在战斗中立了大功的飞鱼导弹，就已只剩下一枚。在过去的 15 年里，阿根廷都是向美国和西欧购买武器的，而现在这些美国人、欧洲人都站在英国一边，阿根廷不可能再从他们手中获得武器。而此时，武器就是生命，武器就是胜利。

无奈之下，阿根廷只好向第三世界国家求援，巴西、利比亚、秘鲁等国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可是，第三世界国家大都不能生产现代化武器，他们所能提供的，基本上也是“二手货”，而且数量有限，阿根廷于是扬言要寻求苏联的援助。

撒切尔夫人可不愿意看到苏联的力量出现在马岛。何况庞大的英国特遣舰队并未使阿根廷人望风披靡，反而使英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这已经够令人丧气了。这场战争不能再如此打下去了，撒切尔夫人考虑再三，决定对马岛发起进攻，迅速占领马岛，这是特遣舰队远航南大西洋的主要目的，她下令向马岛发起登陆战。

伍德沃德将军把登陆地点出人意料地选在圣卡洛斯地区。他认为：这里可以利用山地作屏障，掩护登陆行动，以免被大陆方向飞来的阿根廷飞机的雷达发现；这里可以切断马岛的两个主要岛屿的联系，还可以建立简易机场和前进基地；据侦察，这里不是阿根廷人防守的重点，只设置有 50 名士兵守卫的哨所。

5 月 21 日凌晨，南大西洋寒气袭人，马岛上空浓雾密布，风雪交加。英军先派出两艘航空母舰逼近斯坦利港和达尔文港，并起飞“鹞”式飞机进行袭击，给阿根廷人英军要在此登陆的错觉，真正的登陆部队却从圣卡洛斯摸了上去。阿军毫无防备，几乎没有抵抗就作了英军的俘虏。4 个小时后，首批登陆的千余名英军就在圣卡洛斯港建立了 4 处滩头阵地。上午 10 时，英军控制的陆地已经扩大到 150 平方公里。3 名穿着斑驳作战服的士兵在圣卡洛斯港的中心升起了英国米字国旗。消息传回伦敦，英国人又开始了兴奋。

加尔铁里为英国特遣舰队如此顺利控制圣卡洛斯而震惊，他要竭尽一切努力反击。陆军已经被围困在马岛，目前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有空军了，他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多索，下令对英军实行轰击。

从 5 月 22 日到 26 日，阿根廷空军在圣卡洛斯上空连续 5 天对英军发动了猛烈的空中攻击，飞机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出击。英军当然也不甘示弱，他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鹞”式飞机和“海王”式直升机，在马岛上空与阿根廷飞机空战，“轻剑”式导弹也不断飞上天空。顿时，马岛上空变成一片火海。英国人损失惨重，阿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最令加尔铁里总统恼怒不已的，是阿根廷空军历尽艰险冒死投到英军舰艇和英军阵地上的炸弹，竟有相当多的没有爆炸，原因竟是炸弹有一半超过了储存期限，成为废弹，或者未按规定装置引信。到 26 日，阿空军由于作战半径太大，航程太远，又缺乏地面的有力支持和掩护，损失太大，已成强弩之末。

5 月 25 日，英军又有 5000 人登陆成功，便从圣卡洛斯港兵分两路，开始了对马岛的横扫。南路军的主力是伞兵部队。攻击的目标是达尔文港和古斯格林。在炮兵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很快摧毁了阿军的阻击，28 日即攻占了这两个地区，31 日又占领了斯坦利港的制高点肯特山。北部军在没有道路的荒原上艰苦跋涉，28 日分别攻占了道格拉斯居民点和蒂尔湾。随后疾速南下，于 31 日与南路进攻部队在斯坦利港以西会合，形成了对斯坦利湾的合围之势。

阿根廷军队中的陆军在这次战斗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作战机动性及综合力之差，是现代战争中所罕见的。在英军地面部队已经登陆成功后，阿陆军在内部不设防，而且龟缩在斯坦利港一线的防御工事中，试图凭借西部天险及东部强有力的空军及地面炮火的掩护拼死保住斯坦利港，这样被动挨打的局面及精神状态怎么可能取得胜利呢？

由于阿根廷的斯坦利守军没有在肯特山和两姐妹山构筑工事和奋力防守，英军于 6 月 7 日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两个高地上的守军以后，又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马岛首府。而这时皇家空军的增援部队又赶到斯坦利东面、西

面和南面的海上。英军对阿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收缩在斯坦利港的阿根廷军队已无心抵抗。6月14日下午，梅嫩德斯将军代表阿方向英军正式宣布投降，14000人没有经过真正的较量就放下武器承认战败。这真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次大耻辱。

马尔维纳斯群岛又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撒切尔夫人这位铁女人在国内成为英雄，民意测验大大提高了百分点。英国人已经对以下事情忽略不计了：在这74天的战斗中，英方投入3万人，伤亡近千人；投入飞机270架，损失34架；舰只伤亡14艘；耗资达17亿美元。

而阿根廷，投入1.5万人，伤亡2000人，失踪数百人，被俘万余人；投入飞机350架，损失107架；损失舰只2艘；耗资10亿美元。加尔铁里总统对马岛的拥有得而复失，也从英雄的辉煌上跌落了下来，被迫宣布辞职，几个星期后又被逮捕，人们要追究他的责任。阿根廷人对马岛150年的梦想又开始了历史的轮回，很多阿根廷人只得把愤恨暂时压制在胸中。唯一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用价值20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击沉了大英帝国的价值两亿美元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当阿根廷军队占领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后，有“铁女人”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善罢干休。她迅速组织起浩大的特遣舰队，万里奔袭马岛。她靠的不仅是强力，也颇有谋略。她争取了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获得了美国阿森松岛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解决了万里奔袭的补给困难。在军事上，她首先采用对马岛的严密封锁，断绝马岛的补给，使马岛阿军军心自乱；她不局限于所宣布的“封锁区”外属于“安全区域”的声明，在封锁区外下令击沉阿海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迫使阿海军退出海战；她有意向阿军透露一些较低价值的情报，又果断派兵潜入阿军防备松懈的地域，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至于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在这次战争中或许有太多的失误：他低估了英军的实力，尤其是作为女人的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从而对马岛的战备不足；他拒绝了在马岛修机场的建议，也未利用在地理上有利于阿军的优势。如果他在英军特遣舰队起航至半途时，宣布撤军，以阿本土与英抗衡，那一定会使英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即使英大军来了，他若采取时而骚扰，时而封锁的谋略，远离本上的英军就很难坚持下去，那么，战争或许是另外一种结局，阿根廷150年来的梦想或许不会太快破灭。

促进国防现代化 实施百万大裁军

有关“裁军”的问题，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我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我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 1945 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尽管人人都在喊裁军，并且喊了 40 年，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已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然而，在 1985 年，由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国，却传出了一个消息：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裁军 100 万。

中国政府单方面实行百万大裁军的消息不能不震惊世界。

邓小平的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尚枪声未绝，全党正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正处于大刀阔斧改革图新、新旧更替之时，百万大裁军，势必引起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

然而，当 1986 年这个“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 100 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这一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之所以要裁军百万，主要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性能，即为了保持一支能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行动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衷心赞扬。

联邦德国的《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说：中国裁减军队 100 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单方面裁军百万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决策的伟大意义更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那么，邓小平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呢？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全局和发展方向。新中国诞生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人民军队也随之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但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因而军队的建设一直“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这虽然有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

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尽管中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年，中国的军费只有191亿人民币，折合60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0%；还不及当时苏联军费的一个零头。但是，中国军队的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中国在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人民币。

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 4.56；美国为1 6.15；联邦德国为1 10；法国为1 17。而中国是1 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锐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抓编制”、精简“消肿”作为首要任务。在以后的10年间，也进行过三次精简整编：1977年12月，中央军委确定继续贯彻精简整编方案；1978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不再列入军队定额；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但是，由于一些人头脑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总是缩了又胀，再缩再胀。

经过几次整编，中国军队的员额已减到400万。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问题的症结在于，机构臃肿，干部年龄大，与现代战争的要求差距很大。

邓小平意识到：军队的精简整编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是革命就必然会得罪人。既然用改良的方法根本行不通，那么，用革命的方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也就得罪一次。

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

1984年11月1日——距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会议厅内，聚集了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在内的中国军队主要领导人，举行中央军委座谈会。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邓小平停顿了一下，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一个缺陷……”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话深深地触及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在当时正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可是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却

由 80 岁的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中国军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的轨道。

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定。”

他肯定地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啊！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邓小平所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下这个决心是需要胆略的，而邓小平就具有这种胆略。

于是，一个将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

1985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6 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你一分析起来，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邓小平说，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它们包括 100 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近 80% 的席位。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和平斗争持续发展，成为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

中国当时有 11 亿人口，更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对稳定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邓小平所表达的战略思想，军委扩大会议认为，在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要从；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的轨道。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这个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中国军队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意义还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军队服从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正是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因而这一决策是极其正确和英明的。

军委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主席提出的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作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 100 万，总兵力由 400 万减至 300 万的决定。

6 月 8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仅仅两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问题。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军队进行改革、精简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军队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及其裁军方案出台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人民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展开。

军队的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较广。从大军区调整、部队编制、机关撤并、干部减少，到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等，都有比较大的改革。精简的重点是机关和直属单位，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大军区、军兵种机关及直属单位，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门单位等级。要淘汰陈旧落后的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要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要使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此，“百万大裁军”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是对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裁军百万，最棘手的是干部安置问题。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他们之中，少数年长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要转业到地方。想走的，部队需要，不

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多次提醒广大指战员，想问题、办事情，都不可忘记大局。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比如1985年5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10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更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在精简整编中，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的一大批老同志顾大局，识大体，主动让贤，当“开明人士”，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很高的风格，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军队的广大干部和战士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一些部队在面临整编的情况下，仍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在枪声不绝的南疆自卫还击战场上，指战员们以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延长坚守阵地的时间，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地方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努力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役战士的安置工作。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地热情欢迎，积极接收，认真培训，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工作分配上，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打过仗、立过功的，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给

予了适当的照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军民齐动员，上下共努力，到 1987 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顺利完成；共减少军以上单位 31 个，师、团级单位 4054 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了近一半；空军、海军和二炮都作了相当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 11 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 7 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 4 个军区；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 76 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由原来的 1：1.45 降为 1：3.3.....。所有这一切调整，虽然有困难，但总的说来做得利落、稳妥，非常成功。

“外科手术”重兵袭击巴拿马 布什总统全力“抓获”诺列加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美国总统布什一声令下，美军分5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了美国自越南战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巴拿马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当时称这次入侵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外科手术式”打击行动。美国仅用8个小时就击溃了巴军有组织的抵抗，仅用15个小时就摧毁了巴军所有的主要军事设施，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以铁腕人物诺列加为首的巴拿马现政权。

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遭到了中国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谴责。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出兵颠覆一个主权国家呢？说穿了，还是因为经济利益；归根到底是为了保住巴拿马运河的既得利益。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纵贯巴拿马国境中部的运河，它的开凿，使大西洋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缩短了1万多公里，因而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国际航运水道。1903年，美国强迫刚刚取得独立的巴拿马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并且永远租借运河和运河区。从那时起，美国就把运河看作是自己的生命线，当美国的陆军工兵部队去开凿运河时，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得意地说：“我把巴拿马地区弄到手啦。”1914年巴拿马运河建成后，美国一直是运河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每年运河的总收入约3亿多美元，绝大部分为美国所得，巴拿马只能得到很少的零头。美国把运河西岸16.1公里范围划为运河区，设立美军南方司令部，不许巴拿马人入内，运河区成了巴拿马的“国中之国”。

数十年来，巴拿马人民不断地为收复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而斗争。经过长期努力，在1977年，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和美国的卡特总统签订了新的运河条约，规定从1990年起，运河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应由巴拿马人担任，美国人只能担任副主任；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必须同时撤离运河区；到1999年12月31日午后，运河完全交由巴拿马管理。执行这一条约，意味着美国将完全失去对运河的控制。

对于美国来说，巴拿马运河是它的生命线，失掉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后果，将影响到占美国贸易总额10%的通过运河的贸易，使五角大楼的战略防御计划难以实施。因此，保持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利益是美国政府一直考虑的问题，认为废除运河条约和军事入侵巴拿马都不是理想的办法，有损于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巴拿马建立一个俯首听命于美国指挥的傀儡政权。

可是，当时在巴拿马主政的是坚决主张收回运河主权、实现民族独立的铁腕人物诺列加。美国的一切控制运河区的企图在诺列加为首的巴拿马政府面前都难以得逞。随着运河区管理权交接日期的临近，美国无论是里根政府还是布什政府，为了迫使诺列加下台，对巴拿马采取了经济制裁、外交诱逼、军事威胁，支持巴拿马国内反对派掀起“倒诺浪潮”等种种手段。然而这一切都未能伤害诺列加，反而使美国政府在巴拿马问题上处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

1989年，根据运河新条约的规定，巴拿马政府提出阿尔塔米拉诺·杜克为1990年1月出任运河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人选，但是美国政府却单方面任命

巴拿马人曼弗雷多为运河区的代理主任。从表面上看，美国是在履行运河条约，但实际上违背了由巴拿马方面提出入选的规定。美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巴拿马朝野的反对，认为美国制造的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正在阻碍运河国有化的进程。面对这种形势，企图迫使诺列加下台的美国政府已无其他选择办法，于是采取了以军事入侵，企图以武力压服巴拿马人。

其实，以武装干涉逼迫诺列加下台，是美国政府早已就精心策划的一种方式。

诺列加在 70 年代中期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情报机构的头目时，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打得火热。他是中央情报局拉美情报网中的成员，美国向他提供资金和枪支作为提供情报的回报。后因诺列加表示反对美国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的企图，逐渐疏远美国。于是美国就耿耿于怀，开始策划换掉诺列加的阴谋。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两个法庭于 1982 年 2 月开始指控诺列加参与国际毒品走私。此后美国政府就不断地对巴拿马施加经济、外交、军事压力，企图迫使诺列加下台，但一直未能如愿。1989 年 10 月 3 日，美国直接插手的巴拿马部分中下级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失败后，美国布什总统批准一项 300 万美元的拨款，专供中央情报局在巴拿马秘密从事推翻诺列加的活动，并授权美国驻巴拿马运河的军队捉拿诺列加。布什曾说过，只要能把诺列加搞下台，他“并不在乎是否使用武力”。与此同时，美国秘密向巴拿马增兵 4500 人，空运了大量坦克、装甲车、武器和直升飞机。美国欲直接入侵巴拿马的企图显露出来了。

针对美国的种种压力，巴拿马国民议会于 12 月 15 日任命诺列加为政府首脑，并宣布全国处于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状态”。

布什立即作出了反应。他召集副总统奎尔、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等人对早已拟订就绪的入侵巴拿马军事行动计划再一次讨论。布什告诉他们，他已下决心对诺列加采取行动。

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布什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只利用驻在巴拿马的 1.2 万人的美军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但这将使城外忠于诺列加的部队不受损失，从而使他们可能进行持久战斗，对巴拿马运河构成威胁；一种是利用得到驻巴拿马的美常规部队支持的特别作战部队发动突击式的袭击，以设法抓获诺列加，这样做可摧毁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并把诺列加送交司法部，但又可能造成老百姓伤亡，同时还要掌握诺列加下落的精确情报，而这种情报是情报机构无法提供的。布什对这两种方案比较后，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对巴拿马的入侵要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战争在巴拿马腹地展开。国防部长切尼评价说，这种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不管诺列加被抓与否，巴拿马国防军将在最短时间内失去政权。但这种做法的致命之处，是要展开猛烈战斗，并且使老百姓遭受损失。

计划制定后，美国为了遮人耳目，欺骗舆论，开始处心积虑地制造入侵巴拿马的借口。

美国找到的耸人听闻的借口之一，是“打击毒品走私”。毒品走私是 80 年代以来最容易引起公愤的国际问题。美国指责巴拿马政府首脑诺列加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活动，同哥伦比亚贩毒团伙有牵连，里根政府当时曾对诺列加提出过“正式起诉”。这次，把“贩毒犯”“捉拿归案”，就成了出兵的重要“理由”。

美国出兵的另一个借口是为了“自卫”。12月16日晚9时，4名美国军官乘车经过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所在的大街时，与巴拿马国防军的士兵发生冲突，双方拔枪射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被打死，巴拿马3人受伤。事发后，美国指责巴拿马挑起事端，巴拿马指责美国人首先开枪。美国国防部为此发表声明，扬言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要进行“自卫”。布什总统表示要对巴拿马采取“报复行动”。巴拿马外交部则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样，双方调兵遣将，处于警备状态。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美国总统布什一声令下，美军陆、海、空部队兵分5路，向只有200万人口、面积不足8万平方公里的巴拿马共和国杀来。这场非正义的入侵，是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并被堂而皇之地冠以“正义事业行动”代号。

20日凌晨，美军最先进的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在预警雷达的指导下，首先潜入巴拿马领空，轰炸了驻里奥阿托的巴军高炮阵地，并在机场跑道附近和兵营附近的一片开阔地投下两枚装有延时引信的900公斤级的炸弹。那里驻扎着巴拿巴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2000年营”的第6连和第7连。巴拿马军在这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陷入一片混乱。美军之所以把炸弹投在兵营附近而不是直接投在兵营上，目的就是要使忠于诺列加的部队“惊慌失措，晕头转向”，而不是为了摧毁兵营。

与此同时，美海军“海豹”分队的部分队员袭击了巴拿马总统诺列加的小型私人机场，炸毁了诺列加的座机；另一部分“海豹”队员袭击了守卫诺列加专用船只的士兵，并炸沉了该船，从而切断了诺列加的空中和海上逃路。

轰炸和奇袭的效果令白宫非常满意。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说，使用先进的F-117A飞机轰炸巴拿马，就是因为这种飞机的“轰炸精确度高”。而对诺列加飞机、船只的奇袭，正是为了断他逃跑之路，力求将他“抓获归案”。

入侵巴拿马的5路大军共2.4万人，其中1.3万人是原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南方司令部的部队，1.1万人是从美国本土出击的。2.4万人分为5个特遣队，分别扑向巴军的各军事要地。

第一路是由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种作战部队和一个突击队营组成的“红色特遣队”，利用“隐形”战斗轰炸机的轰炸效果，进行低空伞降，从150米高的空中跳了下来，以扇形包抄巴拿马第6连、第7连的兵营。美国首先拿巴军这两个连开刀，一是为了声东击西，掩护大部队偷袭巴拿马城的巴国防军司令部；二是因为这两个连队十分忠于诺列加。在10月3日巴军中下级军官发动的那次未遂政变中，就是这两个连击退政变军人，营救出被扣的诺列加。现在，由于寡不敌众，这两个连与美国激战后，大部分溃逃，250人被俘。与此同时，这一路的另一部分美军迅速降落在托里霍斯国际机场，包围了巴军航空队，解除了其武装，夺占了该机场，并封锁了横跨帕科拉河的大桥。

第二路是由美军第6机械化营、1个轻型坦克排、第5步兵营和海军“海豹”分队组成的“尖刀特遣队”。这路在炮火、坦克和战斗直升机的掩护下，围攻了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和巴军第5连，试图捉拿诺列加。美军很快就攻占了巴军司令部大楼，歼灭了第5连，控制了巴拿马城的交通要道。由于情报有误，美军没有抓到诺列加，遂放火烧毁了整个司令部大楼。

第三路是由美军第82空降师的1个旅和别动部队组成的“太平洋特遣队”，任务是增援帕科拉河大桥的美军别动部队，阻止巴军的“2000年营”

和其他巴军进城增援。该路美军经过激烈战斗，挫败了“2000年营”和国际机场巴军空军飞行中队的反击计划，并击溃了这些巴军。

第四路是由1个轻装步兵连、1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连和部分宪兵组成的“永远忠实特遣队”，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横跨巴拿马运河的泛美公路大桥，负责保卫运河区内的美军霍华德空军基地。

第五路是由美军第82空降师1个营和第7步兵师的1个营组成的“大西洋特遣队”。他们在特种作战部队的支援下，攻打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击败了巴军第8连和沿海警卫队，攻占了运河的麦登大坝、供电中心、水电站等许多重要设施，还攻击了位于甘博阿的监狱，释放了47名参与10月3日政变而被诺列加监禁的巴军人。

战斗开始后，巴军一直进行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使美军突袭成功。美军仅用8个小时就击溃了巴军有组织的抵抗，仅用15个小时就摧毁了巴军所有的主要军事设施，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诺列加政权。48小时内，结束了主要战斗。

但是，巴军并没有马上停止抵抗，他们展开了巷战和游击战。22日，巴“尊严营”的民兵一部突袭了驻巴美军南方司令部。布什不得不下令再增兵2000人，以迅速肃清巴抵抗力量。

美国在武装入侵巴拿马36小时之后，即21日中午，在巴拿马扶植了新政权，由美国支持的巴拿马反对党领导人吉列尔莫·恩达拉在议会大厦宣誓就任巴拿马总统。

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美国入侵巴拿马。

诺列加是美军入侵巴拿马必须“抓获”的“罪犯”，可是诺列加曾当过10多年的巴拿马军队的情报局长，有一套躲避美军追捕的办法。美军入侵后，他的海上、空中退路均被切断，就在一个隐蔽处躲了4天。当他发现美军重点包围的是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秘鲁等国驻巴拿马的大使馆，而未盯上梵蒂冈使馆时，就只身驱车，于24日进入梵蒂冈使馆要求避难。美军得知消息，立即派出500多名士兵和10多辆装甲车包围了该使馆。在美国、梵蒂冈方面和其他种种压力下，诺列加被迫于1990年1月3日晚向美军投降。至此，历时15天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行动”基本结束。

美军入侵巴拿马，是一场明目张胆地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战争爆发后，尽管布什总统在美军入侵巴拿马的当晚即花了大半夜时间给盟国和拉美国家领导人打电话，解释美国采取这次行动的理由，但美国的侵略行为还是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使美国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境地。

然而从军事上看，布什及其美国政府为实现搞垮诺列加政权，从而牢固并长期地控制巴拿马这个小国，以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及外交困境而选择动用海、陆、空大举进攻“速战速决”的第三方案，确实是成功的。当时，供布什选择的已有两套预案。这两套方案的规模都不如布什所最后确定的第三方案大，因而要达到的效果也不会有第三方案明显。既然已经采用军事手段了，何必在乎大小？性质都一样。那么，当然应该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佳的效果。所以，即使是对弹丸小国巴拿马，布什也宁可用牛刀杀鸡，不惜出动大军，分5路奇袭巴拿马的各重要部门及设施，而且一定要抓到诺列加。主要战斗仅20多个小时即告结束，美国完全实现了它发动这场不义战争的目的。

萨达姆欺骗穆巴拉克 伊拉克突袭科威特国

1990年8月2日凌晨，正在熟睡中的西亚大地，突然间被掠过天空的战斗机群和隆隆推进的机械化装甲部队的震动声所惊醒：10万伊拉克大军顷刻间越过边界直扑科威特首都。炮弹带着红光，火箭拖着火焰，铺天盖地似地砸向科威特。亚洲西部天空上的阵阵炮响，搅乱了世界以苏联、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矛盾对立日趋缓和的大背景下的短暂安宁。震惊之中的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一下子投向了海湾。人们不明白，伊拉克和科威特本属海湾友好邻国。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科威特一直坚定地站在伊拉克一边，对伊朗进行谴责。可现在，萨达姆的枪口，为什么突然调转对准了这个昔日的盟国？

伊拉克对科威特刀兵相见的公开借口是科威特属于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一下历史：

公元7世纪时，伊拉克和科威特同属阿拉伯帝国；16世纪时，伊、科两国又同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1775年，科威特开始同英国建立联系，但并未脱离奥斯曼。1899年《英科秘密协定》使英国成为科威特的宗主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划定了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三国之间的边界。伊拉克因为没有获得通往海湾的通道，同时伊、科边界的鲁迈拉油田问题悬而未决，伊拉克即对英国的划定不予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科威特于1961年摆脱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拉克对此先是不予承认，接着又陈兵伊、科边境，但迫于英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压力未敢动手。1963年，伊拉克承认了科威特国。

从历史上看，伊拉克与科威特仅仅是曾经同属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伊拉克仅凭此根本无权对科威特提出领土要求。这点连萨达姆本人也是很清楚的。伊拉克对科威特举兵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此。这场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具体说是因为石油、领土、债务诸多矛盾的交织和激化。

“两伊战争”结束后，从1989年起，世界石油供过于求，油价从1990年1月起每桶由21美元跌到14美元。伊拉克指控科威特伙同阿联酋超产石油，降低油价，使伊拉克蒙受140亿美元的损失；科威特却说它在两伊战争期间确实超产石油，但大部分盈利都用于援助伊拉克、巴解组织和阿拉伯事业。两伊停火后，科威特即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规定的定额，为限产保价作出了牺牲。

伊拉克指控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蚕食伊拉克的领土，在属于伊拉克的地方建立军事、石油设施和哨所，是对伊拉克的军事侵略。科威特反驳说，鲁迈拉油田南部延伸到科威特境内，科威特是在自己领土上打井采油。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下了巨额债务，其中仅欠科威特的即达200亿美元。伊拉克提出它与伊朗作战是保卫阿拉伯民族，因此应正式免除战争期间它欠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债务。科威特认为伊拉克未经协商，单方面提出将所有债务一笔勾销是难以接受的。

客观地说，萨达姆之所以要发动对科威特的战争，其深刻的原因是伊拉

克内政的原因。两伊战争之后，萨达姆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内外交困。一方面是国内人心不定，两伊战争并没有像政府宣称的那样给人民带来繁荣，“后遗症”很快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是8年的战争并没有从伊朗方面取得任何出海口，反而为此欠债达800亿美元，平均每个伊拉克人要负担外债5000美元。而战后的伊拉克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国家又面临着战后重建的繁重任务。伊拉克急需足够的资金，可钱从哪里来呢？萨达姆开始寻求转嫁矛盾的出路。

两伊战争虽然使伊拉克变得经济困难，却锻炼出了一支有经验的百万大军。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购置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如中程导弹、幻影式飞机等，并建立了自己的军火工业。伊拉克以海湾军事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中东的舞台上，它不甘愿于在经济上落后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于是便选择了南部经济最富有，军事上又最软弱的国家科威特作为它下手的第一站。

科威特石油储量达92.3亿吨，居世界第五位。石油收入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人年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这块“肥肉”早就引起了萨达姆的垂涎。早在1986年，他就下令制定了入侵科威特的计划“科威特行动”，不久又做了最后审定。两伊战争一结束，萨达姆即把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一面加紧与科威特国内的反对派接触、伺机下手；一面开始外交准备，极力与沙特、巴林等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要求加入海湾合作委员会。

不过，海湾国家其实对萨达姆是早就有认识的。认为他严厉、好战，惯于残酷无情的行动。他领导的复兴党时刻不忘重振当年阿拉伯帝国的雄风，他本人也时刻梦想着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把反美、反以色列的旗帜举得最高，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觉得他是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当代的撒拉丁。他一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他是既有较高的地位，又有领袖的形象。他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制定了“大阿拉伯复兴计划”，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双管齐下，扩军备战。对科威特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其“大阿拉伯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1990年7月，伊拉克以破坏石油生产限额为名，突然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进行抨击。7日，萨达姆总统在7月革命节庆祝会上，严厉批评海湾国家不负责任的石油政策造成世界油价暴跌，声称伊拉克仅上半年就因此蒙受损失达140亿美元。18日，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齐兹公开了7月15日给阿盟秘书长的一份备忘录，点名指责科威特、阿联酋肆意超过石油输出组织规定的生产限额，大量生产原油，致使世界石油市场油价下跌，使伊拉克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日，萨达姆又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讲话。阿齐兹还指责科威特自1980年以来在两国边境有争议的鲁迈拉地区偷采石油，价值达24亿美元之巨。他还说科威特在伊拉克领土上修建了军事设施。

对伊拉克的说法，科威特迅速予以反驳。科威特埃米尔专门派出特使向所有阿拉伯国家紧急通报情况，阐述科威特的立场。科威特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科、伊纠纷的真相。从此，科、伊唇枪舌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为了迅速了结这场兄弟阋墙之争，在埃及、沙特、约旦、叙利亚、也门等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紧急联系之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7月24日穿梭访问了巴格达、科威特和利雅得。穆巴拉克的调解取得了“成功”，他向全世界宣布萨达姆总统保证不对科威特动武。于是，伊、科双方停止了宣传攻击，两国高级领导人同意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会晤。为了“表示诚意”，伊拉

克 7 月 26 日凌晨将边境 10 万驻军后撤。一场海湾风波大有“夏天的乌云很快消散”的迹象，人们对原来日趋紧张的海湾局势，终于松了口气。

但这次是穆巴拉克等人大错特错了，他们根本没有认清萨达姆。萨达姆要入侵科威特之心根本未减，他早已意识到，控制科威特即使使自己的石油储量增加一倍，即占世界储量的 20%，由此可加强伊拉克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发言权及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更雄心勃勃地试图把沙特阿拉伯划归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来，控制世界 60% 的石油储量，增强国力，胁迫西方，称雄中东，傲视世界，实现“大阿拉伯复兴计划”。所以，他怎么可能会真正与科威特进行谈判呢？

7 月 31 日下午至 8 月 1 日上午，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伊札·易卜拉欣和科威特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如期在吉达市会晤。伊拉克提出了令科威特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会谈虽宣告失败，但是双方在离开吉达市之前商定，后续会谈将分别在两国首都继续举行。

伊、科会谈失败，自然给海湾危机的解决投下了一层阴影。但是，从阿拉伯世界到国际社会，几乎谁也没有料到，伊拉克的会谈目标只是一个幌子，就在易卜拉欣和萨阿德结束会谈各自回到国家后几个小时，一场骇人听闻的战争就爆发了。之所以骇人听闻，是因为交战双方不是对峙了多年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而是曾经如兄弟一般的阿拉伯人自己。

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 2 时许，白天 40 的暑气稍稍消去，190 多万科威特人刚刚进入梦乡，伊、科边境突然坦克隆隆、炮声呼啸，10 万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大军顷刻间越过伊、科边界，朝科威特席卷而来。战斗机、直升机腾空而起，装甲车、迫击炮随之出动。伊军沿科威特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直向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涌来。

科威特虽然财大气粗，富得流油，但却没有兵强马壮的国家卫士。在它 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 2 万人的军队。面对雄兵百万的伊拉克，科威特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可奈何于这个强大的对手。科威特的战斗飞机曾勇敢地起飞迎战，可是升空后才发现伊拉克的飞机几乎布满了整个天空，与其交战等于自取灭亡，只得赶快溜号，一溜烟似地飞到邻国沙特阿拉伯保存实力去了。

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就于凌晨 5 时完全占领了科威特首都，并包围了埃米尔宫、机场、电台和政府等重要部门和设施。

伊军随即以坦克、装甲车进攻科威特国王埃米尔贾比尔的达斯曼宫，并向宫中猛烈开火。科威特军队的几辆装甲车和坦克在宫内实施机动防御，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于上午 11 时被伊军消灭，王宫陷落。在王宫之战中，埃米尔贾比尔的胞弟法赫德亲王因来不及撤退到邻国，便留下来指挥士兵反击伊军。他右手握着一支小手枪，隐蔽在王宫建筑的柱子后面，一边射击一边大声地调遣着装甲车和士兵们。最后终因弹尽，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他的两个儿子也在他的身边中弹身亡。这位科威特奥委会主席、亚奥理事会主席暨国际奥委会理事和国际足协副主席，曾两次率科威特军队参加中东战争的英雄，未战死于以色列人之手，而是不幸倒在阿拉伯人的枪口下。

伊拉克在一天之内以极少的伤亡占领了科威特全国。随后，大军一转头便驶向科威特与沙特的交界处科威特一侧，摆出进攻沙特的阵式。当天，伊拉克宣布伊军是应邀前来“接管”贾比尔政府的，由 9 名非科威特人组成的

“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这样，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军事行动按萨达姆的计划已经圆满结束。

可是，在伊军发起进攻之时即迅速乘直升飞机逃往巴林，随后又飞到沙特达曼的科威特国王埃米尔贾比尔却在达曼组织起了流亡政府，呼吁科威特人民抵抗和国际社会支持。

伊拉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占是很不得人心的。即使是科威特原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哈迈德·萨敦，也严词拒绝 300 绝了伊拉克要其组织傀儡政府的要求。为此，他遭到了伊军非人的折磨，最后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伊军占领的科威特到处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科威特人不断寻机打击伊军。8月5日清晨，两架科威特“幻影”式战斗机从沙特起飞，突然袭击了在科威特城市郊的伊军指挥部；当晚，伊军占领的电视台突然播放了贾比尔在邻国主持内阁会议的情况，这极大地鼓舞了科威特人民，这是电视台工作人员智胜伊军的一个典型“战例”。在其后的几天里，不断有自发组织起来的科威特人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上街游行反对伊军占领，并不断对伊军进行袭击。一个秘密电台不断地向科威特人民播音，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对付侵略者。科威特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使伊拉克军队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

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世界的公愤。主权国家科威特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伊拉克宣布不复存在，这种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震惊了整个世界。特别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犹如挨了萨达姆的一闷棍。伊拉克“罪该万死”，“萨达姆缺乏人性”，世界一片谴责声湮没了伊拉克的嚣张气焰。联合国安理会数次通过决议，要伊拉克撤军，恢复科威特的主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对伊拉克进行警告并随后发动了“沙漠盾牌”行动，严惩了伊拉克，恢复了科威特。

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句俗语来形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是再形象不过的了。萨达姆为转移国内矛盾而采取的侵略科威特的极端荒唐手段，世人早已公论，此处不用多言。但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突然性却是成功的。战争发动的前几天，伊拉克外长还向海湾国家的调解人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保证，伊拉克不会打科威特的主意。开战前仅仅几小时，它的代表还坐在谈判桌前与科威特代表商谈石油和领土争端问题。虽然谈判以伊拉克代表拂袖而去收场，但他们又表示了要改日继续会谈。正是这种成功的外交战略的掩护，才使科威特感到伊拉克的坦克来得太突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兄弟国家背信弃义的手段过于卑劣，才使得随后发起的针对伊拉克的“沙漠盾牌”行动付诸实施时，早讲兄弟情义的阿拉伯国家，纷纷站在了伊拉克的对立面。

高技术兵器“沙漠风暴”扬威 施瓦茨科普夫“沙漠军刀”出鞘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通过了678号决议，授权已集结在海湾地区的以美国为首的70万多国部队，在1991年1月15日以后，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这是对伊拉克的一纸“最后通牒”。在此之后，美国总统、南斯拉夫外长、联合国秘书长、约旦、法国等国的世界著名政治家均对伊拉克进行了“和平的努力”，然而均未能取得成效。萨达姆愿意选择战争，多国部队不得不奉陪。当1月15日这个最后期限来临后，一场现代化的“海地空一体”立体战就在中东爆发了。这场战争是使用高科技所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其过程颇给人以许多启迪。

当1991年1月15日午夜，伊拉克仍未按联合国规定的最后期限内从科威特撤军表示，反而表明要同多国部队顽抗到底时，美国总统布什即于16日上午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签署了对伊开战的命令，决定从伊拉克时间17日凌晨零时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横扫计划。

布什和他的多国部队统帅部对于“沙漠风暴”计划是精心设计的。在进攻时间上，从海军、空军要同时从海上、空中发动攻击所要求的条件考虑，既要有月之夜又要在涨潮之日最为有利，而在1月15日之后只有1月17日至20日、2月16日至18日、3月17日至18日这三组时间可供选择。当时的情况是：在第一组时间内进攻，相当仓促，连美国的军队部署都尚未完成；第三组时间又正是穆斯林斋月，多国部队中的阿拉伯军队参战多有不便；理想的时间只能是第二组。

为了迷惑伊拉克，1月15日，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1月15日是伊拉克撤军的最后期限，但并不是多国部队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仍然希望萨达姆回心转意。这就大大松懈了伊拉克人的警惕性，他们未能感觉到多国部队即将动手，他们判断多国部队即使开战也会在2月。所以，当1月17日这个日子来临时，伊拉克首都灯火通明，毫无临战的感觉。殊不知，布什正是利用了这种战略家们的通常分析，而将战争的时间选择在最后期限的24小时后，即1月17日零时，这的确大出萨达姆的意料。

1月17日凌晨之时，伊拉克军队正在睡梦之中，值勤人员也正在疲倦之时，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统帅的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海湾战争。停泊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军舰，向伊拉克的防空阵地、雷达基地发射了100多枚舰对地“战斧”式巡航导弹。接着，从沙特、巴林和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数百架飞机，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轮番轰炸。而在此之前5小时，多国部队就进行了强烈的电子干扰，使伊拉克的通讯联络濒于中断，伊方雷达的屏幕不是白花花一片，就是显示假目标，难以发现来袭的飞机。多国部队战术上的突然性，使伊拉克的飞机几乎来不及升空迎击，便被炸毁在机场上，伊军的地对空导弹也不能发挥防御作用。空袭40分钟后，巴格达才反应过来，实行灯火管制，伊军的高射炮一齐向空中射击，使巴格达的夜空一片弹雨，炸弹爆炸的火光和高射炮射击时的火光，使夜空如同白日。战争第一天，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1200架次执行6900多小时的轰炸任务，竟无一伤亡，这是空战史上少有的奇迹。

当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空袭开始时，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向全世界宣

布：“解放科威特的行动开始了。”3个小时后，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说：多国部队的空袭“非常成功”，他们“没有”遇到伊拉克的“任何空中抵抗”。他继续说：“沙漠风暴”行动的主要任务，是摧毁伊拉克的“进攻性军事能力”，首先打击的目标是萨达姆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他解释说：“我们没有把目标对准萨达姆。”

“沙漠风暴”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针对性的重点轰炸，目的是打击伊拉克的防空雷达阵地、机场、指挥和通讯设施、核反应堆、导弹发射架、生物和化学武器工厂，以确保制空权，为最后投入地面部队整顿“战斗环境”。

经过两个星期的狂轰滥炸，利用高技术优势的多国部队基本上取得了制空权。但是伊军仍然保留了30多架导弹机动发射架，伊军的飞机、坦克，深藏在坚固的地下掩护所里，被摧毁的并不多。伊军利用保存下来的导弹机动发射架，不断地向沙特首都和以色列首都发射“飞毛腿”导弹。其目的—是表示伊拉克仍然有反击力，二是以导弹袭击激怒以色列，把以色列拖入战争，使这场战争变成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战争，从而拆散美国的反伊联盟。但是，以色列并不上当，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没有进行反击，使萨达姆的战略未能奏效。

萨达姆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以静制动，力求在—多国部队的空袭中保存军力，坚持100天，然后在地面战争中大量歼灭美军人员，促使美国国内爆发大规模的反战浪潮，从而罢战退兵。然而这种静态防御的战法是低估了—多国部队的袭击能力。伊军的导弹袭击，效果并不大，所发射的“飞毛腿”导弹基本上为美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摧毁。随着多国部队轰炸时间的延长，伊军的地下掩护所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伊拉克的飞机成批地飞向伊朗，又被伊朗扣留。

萨达姆惯使“绝招”。从1月25日起，他又下令向海湾倾泻了1100万桶原油，造成了海湾水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美国飞机使用“智能”炸弹，炸毁了输油管道和油泵，使流入海湾的原油大大减少。为引诱美军早日投入地面战争，1月29日午夜，一支2000人的伊军在坦克掩护下，越过科、沙边境，攻占了沙特的海夫吉城。两天后，多国部队进行反攻，夺回了这个只有2万人的海夫吉城。俘伊军400人。伊军则把抓获的25名多国部队的飞行员，转移到经济、科研、军事等战略设施内，作为“人体盾牌”，企图以此阻止多国部队的空袭。

从2月7日开始，多国部队开始了“沙漠风暴”的第二阶段“战术轰炸”。目的是切断伊拉克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破坏燃料补给设施和储备设施，攻击其他的后方支援设施。与此同时，对伊拉克南部和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地面部队，特别是4200辆坦克及2800辆装甲运兵车进行大规模密集空袭，切断伊拉克军队之间的联系。

2月7日这一天，停泊在海湾水域的美军“威斯康星”号战舰首次向科威特南部的伊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炮击。每发重达910公斤的炮弹划破黎明前的夜空，呼啸着飞向伊军阵地。与此同时，美军B-52重型轰炸机，将雨点似的炸弹倾泻到伊拉克南部共和国卫队的防区，地毯式的轰炸把落弹地区的地面深深地犁了一遍。

多国部队的空袭战充分体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家们对现代战争是“海地空—体”立体战的构思，利用现代电子的高科技优势，将海上、地面、

空中为体系的战争模式综合利用，使其作战手段及方式达到在全纵深内打击敌人的目的。这种构思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多国部队用“战斧式”导弹打头阵，辅之以上千架次舰载机群和空军空袭，把导弹的突击性、破坏力和密集火力同舰艇的机动性、隐蔽性有效结合起来，就由过去海军单一对海作战、陆上支援发展成为一种海上陆地一体的作战模式。其实质就是充分使用陆上、海上、空中、空间和电子作战装备，灵敏、机动、纵深、时机、协调各种攻击力量，从而对敌方纵深 800 至数千公里之内的军事战略目标进行不遗余力地打击、增加各军种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

多国部队的空袭持续了 38 天，平均每分钟出动一架次飞机，10 万架次的狂轰滥炸，使伊拉克的军队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美军公布的“最低估计”为：摧毁伊拉克坦克 1300 辆、装甲车 1000 辆、火炮 1000 门、所有的防空雷达、数以万计的士兵。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据此判断，地面进攻的条件成熟了。

此时，伊拉克在伊朗、苏联等国的劝说下，抛出了一个有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的声明。2 月 19 日，苏联提出 4 条和平建议，呼吁美国推迟地面进攻。美国坚持不停火、不谈判、不让步的立场。萨达姆则表示同意苏联的和平建议。阿齐兹再次到苏联会谈，苏联又于 22 日进一步提出了伊拉克撤军的方案：停火一天后开始撤军，在 21 天内撤完。美国认为这个撤军方案对伊拉克太宽容，不能满足多国部队的要求。于是把苏联的方案抛在了一边。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要求伊拉克在格林威治时间 23 日 17 时为撤军最后期限的“最后通牒”。

然而，萨达姆仍然不服输，还要保全面子，没有无条件快速撤军，又一次丧失了保存力量的机会。

2 月 24 日，“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三阶段地面扫荡作战开始了。这是决定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多国部队海湾军事行动中最为壮观的时刻，120 万大军将在沙漠里展开一场空前的厮杀。不过，此时的伊拉克部队经过多国部队 38 天的轰炸后，战争机器已经瘫痪，已难以阻挡多国部队的进攻了。

这天清晨 4 时许，部署在科威特东南部边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1 师、第 2 师突破伊军雷场，向伊军阵地发起进攻，一枚枚重磅炮弹从“威斯康星”和“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射出飞向伊军阵地。多国部队兵分 4 路直扑伊军：一路从海上向科威特东部实施两栖登陆；两路从陆上越过科、沙边境进入科境内；第四路从沙特越过边境进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包抄，切断伊军的退路；此外，还在伊军后方进行伞降。多国部队的进攻是非常成功的。16 小时后，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发布消息说：“多国部队第一天的进攻目标全部达到，并继续高速向北挺进，到目前为止，伊军抵抗不强，攻势进展十分顺利，多国部队的伤亡很小。”

地面进攻之所以发展顺利，这主要应归功于“沙漠军刀”战略计划的制定以及成功的战略欺骗。早在一个月前，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即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及法国三军参谋长史密特将军达成协议，由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根据他多年研究的“空地一体战”和亲自指挥巴拿马登陆作战的经验，拟定了地面作战的“沙漠军刀”计划，经多次高级军官会议论证后，布什总统未详细阅读就表示同意。当伊拉克在布什提出的最后期限超过 3 小时仍无表示时，布什总统就下令执行“沙漠军刀”计划。

“沙漠军刀”不仅砍得有力，而且砍得巧妙，成功地运用了“兵不厌诈”的战术。还在1990年12月，美第7军从德国调到沙特时，美国就不断地在沙、科边界以南地区，沿伊军防御正面进行训练和演习，并不断袭击边界北面的伊军，造成一种要从该地区进攻的态势，诱引伊军把主力集中在科威特南部防线。同时，美军在靠近科威特沿海水域不断举行联合登陆演习，并以舰炮猛轰伊军在科威特东部海岸阵地；又加强宣传攻势，故意泄漏假情报迷惑伊军。此时伊军已失去空中侦察手段，对美军真真假假的部署无法准确掌握，以为多国部队攻击的重点是科威特正面伊军，遂将主力集中于此。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此时已将多国部队主力悄悄调至伊军防守薄弱的西部翼侧。战斗一打响，多国部队迅速从伊军防守弱点突破，使伊军猝不及防，收到了声东击西的效果。

多国部队的地面攻势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扑伊军各主力部队，使伊军毫无抵抗之力，纷纷弃守溃退。这时，狡猾的萨达姆已看出继续抵抗毫无意义，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政权和一点伊军主力，他于26日宣布，伊拉克无条件接受安理会要其从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妄图以此阻止盟军的地面进攻。美国总统布什识破了萨达姆的鬼把戏，同时也想趁机消灭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就发表讲话说伊拉克的撤军声明是荒谬绝伦”的，并说多国部队将继续他们的战争行动。

27日，美第18军和第7军联手横扫科威特全境，一举解放了科威特。

28日，美国宣布停火。至此，经过100小时的空地一体联合作战，打败了伊拉克军队，从而结束了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当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停止在海湾的作战行动时，美军已兵临巴士拉城下。100小时的地面战，美第7军和第18空降军基本包围了伊军在科威特战场的50万精锐部队，击毁坦克4000余辆，伊军42个师遭到毁灭性打击，已失去战斗力。而多国部队付出的代价仅是美军死亡88人，埃及、沙特和科威特联军41人，英军16人，法军2人。

“沙漠军刀”行动是否结束得早了一点？对伊拉克实力的摧毁以及对萨达姆本人的打击是否还应该再大一点，在当时即有争论。停火实际上是由布什总统、鲍威尔将军等人确定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等人也谨慎地表示过不同意见。在海湾战争爆发的5年以后，海湾战争的阴魂不散，萨达姆还不时做出一些令世人担忧的动作，所以，布什在1995年底也惋惜地说海湾战争结束得早了一点。这或许是这场富有启示的现代战争的一点遗憾。

海湾战争集中使用了大量高技术兵器，形成了空、天、地、海、电磁环境中各种高技术和战略、战役、战术兵器的综合较量。美国凭借其高技术的明显优势，夺取了战场主动权，使伊拉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足证在现代战争中，中、低技术与高技术之间的差距，对战争的影响之大。伊拉克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拥有百万军队，现代化的装备也不少，可是与多国部队的高技术战略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从而使防空系统失灵，指挥官一筹莫展，仅短短42天，就彻底失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国部队战前高精度，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电子侦察，为实施全面、彻底的空中纵深打击提供了准确的目标数据；贯穿于战争全过程的高强度电子干扰和高效率电子欺骗，既保证了多国部队空袭的突然性、隐蔽性，以及全部空袭的安全性，又保证了在敌纵深进行大规模空降的隐蔽性和有效性；软硬结合的电子对抗

手段的综合应用，既保证了多国部队战略和战术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转，又瘫痪了伊拉克全部战略和战术系统的正常功能……这一切，有力地保证了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以近代战争史上最小的武器装备耗损率和最少的人员伤亡率夺取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可以肯定，在现代化的高技术战争中，如果不具备抗强电子干扰能力，抗反辐射能力，没有反隐形能力的战术导弹武器系统，单靠地面死守和人海战术，既没有生存能力，更没有战斗能力，在战争中必然被动挨打。

此外，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之所以取胜，还有战略决策和战略运用的正确，迅速在沙特集结部队，突出了一个“快”字；采取实力威胁与实战准备并举的先压后打的方针，突出了战略的“灵活”，让伊拉克既输理，又输人，最后只得“吃不了兜着走”。

参考文献

- 刘济昆编著：《毛泽东兵法》，巴蜀书社 1992 年版。
- 谢朝晖、罗庆旺主编：《战后世界重大军事事件始末》，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陈漫远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概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李建编：《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
- 李景峰、高文利：《出奇制胜的军事行动》，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萧 等编著：《战争走向 2000 年》，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版。
- 刘先中、罗军编著：《九十年代战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河阳等著：《拥抱共和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 年版。
- 曹建、曹军编著：《名将奇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巴山雨、阿随编：《一代奇才——中共杰出的高级将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秦忆初译：《近代西方名将评传》，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 肖石忠等编著：《耀眼将星——二战美国上将》，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4 年版。
- 王建华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顿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曹德骏等译：《将星奇才——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传》，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2 年版。
- 刘伯承：《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 苗冰舒著：《刘邓在中原前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0 年版。
- 张东、梁启谈《以血洗血——国共八大主力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 陈永芳：《驰骋南天》，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 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